拉康中文翻译项目 · 文献译丛

论越入行动的新评述

拉康与拉康派

New Remarks on the Passage to the Act
Lacan and the Lacanians

让 · 阿卢什 著
奥斯卡 · 曾特纳 英译

中文校订版 · 2026年10月4日

版本说明

本书中文译文依据用户提供的奥斯卡·曾特纳英译版 EPUB 整理；英文版由 Routledge 于2025年出版。全书16部分、1,016个分段，已完成中文翻译及本轮语义校订。

书前报告部分据阿卢什2019年公开法文核实并校正局部英译差异；具体依据见相邻译注。全书未完成整本法文版本校勘，尚未解决的原语歧义与版本疑点已明确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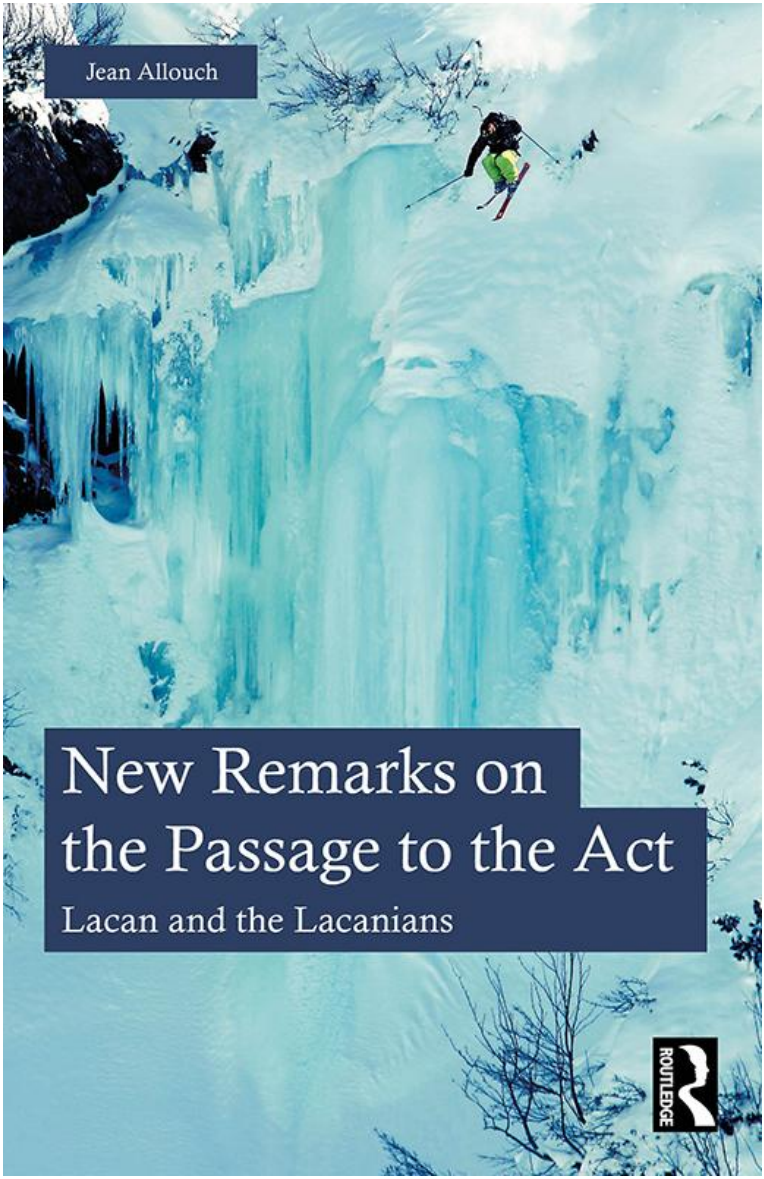
保留233条不同原注、59条中文译注以及全部原图。编号原注按篇排列；重复引用仍在所属段落旁重列，因此本书显示235个编号原注块。正文［注］对应中文译注，［注1］等对应编号原注，均置于相应段落下。

本 PDF 的阅读目录采用当前文件页码。原书目录和索引中的数字保留英文底本印刷页码，点击可跳至中文对应文字，数字本身不表示本 PDF 页码。段落ID继续保留为PDF跳转目标。

末附结论所引拉康同日法文转写的相关节选，供离线对读。学术书目及作者公开资料的外部链接继续保留。

阅读目录

封面 4
论越入行动的新评述 5
论越入行动的新评述：拉康与拉康派 6
版权页 7
目录 9
前言 让・阿卢什，谨此悼念 10
英译者说明 13
让・阿卢什关于《论越入行动的新评述》的报告[注1] 16
各篇文本的来源 36
致谢 37
导言 38
第一章｜越入行动的当下性 53
第二章　思考，行动：路易・阿尔都塞 79
第三章｜越入行动与史诗性跃迁：玛格丽特・杜拉斯 106
结论 154
索引 173
校勘参照：拉康同日法文转写 190



封面：《论越入行动的新评述：拉康与拉康派》，让・阿卢什著，奥斯卡・曾特纳英译，Routledge / 泰勒与弗朗西斯集团出版，伦敦及纽约。

论越入行动的新评述

《论越入行动的新评述》考察这样一种情形：当现代社会被无法解释的暴力所淹没，精神分析和社会科学被要求前来相助时，会发生什么。

让・阿卢什考察了若干关键事件——帕潘姐妹的罪行、拉康的艾梅病例，以及路易・阿尔都塞杀害埃莱娜・里特曼的事件——并剖析“越入行动”这一概念。本书借助当时的研究和文学作品评估这些经典案例，尤其讨论了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英国情人》（L’Amante Anglaise）。书中也考察了现代恐怖主义行为。

《论越入行动的新评述》将使临床工作者，以及精神分析、拉康研究、社会学、文化研究和哲学领域的学界人士与研究者深感兴趣，也将使正在执业及接受训练的拉康派分析家深感兴趣。

让・阿卢什（1939—2023）是国际知名的精神分析家，也是《Littoral》杂志及拉康精神分析学派（巴黎）的创办人和负责人之一。他是拉康派精神分析领域最杰出、著述最丰的作者之一。

奥斯卡・曾特纳是一位拉康派精神分析家，曾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受训练。他与玛丽亚- 伊内斯・罗特米勒・德・曾特纳于1977年将拉康的精神分析主张引入澳大利亚。

论越入行动的新评述：拉康与拉康派

让 · 阿卢什

奥斯卡 · 曾特纳 英译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LONDON AND NEW YORK

版权页

封面设计图片：自由滑雪运动员托马斯・迪耶的跳跃，2004年1月。奥地利圣安东，阿尔贝格滑雪点。图片由多米尼克・达埃提供。

英文版初版于2025年出版

由 Routledge 出版

4 Park Square,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OX14 4RN

同时由 Routledge 出版

605 Third Avenue, New York, NY 10158

Routledge 是泰勒与弗朗西斯集团旗下的出版品牌；该集团属于英富曼（informa）。

© 2025 让・阿卢什

依照1988年《版权、外观设计与专利法》第77条和第78条，让・阿卢什已主张其被确认为本作品作者的权利。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采用现有及今后发明的任何电子、机械或其他手段，包括影印与录音，以及任何信息存储或检索系统，重印、复制或使用本书的任何部分。

商标声明：产品名称或公司名称可能是商标或注册商标；此处使用这些名称仅为识别和说明，无意侵犯相关权利。

法文初版题为《论越入行动的新评述》（Nouvelles remarques sur le passage à l'acte），由 Epel 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

英国图书馆在版编目资料

英国图书馆备有本书的书目记录

ISBN：978-1-032-82361-4（精装本）

ISBN：978-1-032-82360-7（平装本）

ISBN：978-1-003-50409-2（电子书）

DOI：10.4324/9781003504092

采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排版

排版：KnowledgeWorks Global Ltd.

目录

- 前言：纪念让・阿卢什
- 英译者说明
- 让・阿卢什关于《论越入行动的新评述》的报告
- 各篇文本的来源
- 致谢
- 导言
- I 越入行动的当下性
- II 思考，行动：路易・阿尔都塞
- III 越入行动与史诗性跃迁：玛格丽特・杜拉斯
- 结论：明晰的越入行动：雅克・拉康
- 索引

前言 让·阿卢什，谨此悼念

奥斯卡·曾特纳

不幸的是，我完成这部关键著作的翻译之际，恰逢作者让·阿卢什逝世；这改变了许多原先既定的事情，尽管人们知道，没有什么可以想当然地视为既定。我无法不回到过去——交代我如何走到这本书的这一页。[注]

> [注] 英文底本 unavoidable…not go 的否定搭配与回溯往事的语境不相合；正文按这段转入过去的叙述取义。没有其他版本依据，不据孤立的双重否定强行反转段意。

我于1982年在巴黎结识让·阿卢什。当时，拉康解散巴黎弗洛伊德学派及其去世所留下的苦涩和争议仍未平息。那是一场人多而复杂的聚会，参加者主要是——但并不全是——分析家及已经解散的学派成员（这些人自身又分成了不同的小群体，“赞成或反对”拉康解散学派）。聚会在克洛德·迪梅齐尔的家中举行，围绕不同提议展开的讨论声音很大，也十分激烈。讨论中公开表达的分歧并非全然新出现的，只是在拉康在世时，它们没那么显眼。

碰巧，我与让站在同一边，也就是说，赞成解散学派。不过，如今更重要的是，经过时间的检验，我还可以补充说，我也认同他对精神分析的阐述。虽然当时我们几乎只交谈了寥寥几句，但从那次聚会起，我们设法保持联系，尽管远隔重洋，使联系不得不时常中断很长时间。他每有新书出版，便寄给我，由此显出他的友善与慷慨。也正是在那时，我养成了将他的著作读两遍的习惯：先读法文，随后读西班

牙文。与此同时，只要有可能，我也参加他的研讨班。在那些年里，我们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他欣然接受我把这本书译成英文的想法，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远距离通信中，我们逐渐习惯了各用自己的母语给对方写信：他用法语，我用西班牙语；然而，每当面对面时，我们却只说西班牙语。他的西班牙语无可挑剔，我想他知道这一点，也为此自豪。适逢有关话题，我便向他说说自己的阅读与写作计划。我记得其中一次往来，足以说明让的直截了当：我曾寄给他一篇自己写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收到了他的回信：

亲爱的奥斯卡，那少掉的一百页在哪里呢……？[注1]

[注1] 亲爱的奥斯卡，那少掉的一百页在哪里呢？

他的讽刺证明了他的友谊，因为其中包含着一种不露声色的推动，其效果既持久，又弥足珍贵。不过，在这一切之上，我想强调的是：在我看来，构成他的精神分析主张之根本的，很可能也是——正如读过此书后我告诉他的——阿卢什从他与拉康的分析及沉默中获得的东西；在我看来，这又类似于他的“我不在乎拉康（Je m’en fiche de Lacan）”。[注2]这种“我不在乎”使他不仅能够阅读、研究、质询自己的前分析家，而不受任何错置的忠诚束缚，也使他能够继续推进拉康许多命题中仍然隐晦、中断或悬而未决的想法。换句话说，成为他所成为的分析家。关于这一点，你可以读一读他自己的话：

[注2] 让·阿卢什，“我不在乎拉康”（Je m’en fiche de Lacan），第9届国际精神医学展会，索邦大学，2001年11月13日。

我的“我不在乎拉康”会在何处起作用。

> 我去找拉康，恰恰如同去找一个与之一起可以不在乎的人。这种人，你不会在每个街角都遇到。因为，不在乎某个人是一回事，和这个人一道不在乎，或者至少并非没有他而不在乎，则是另一回事。我刚刚告诉了你，我对精神分析家的定义。

阿卢什无疑是从拉康的躺椅上走出来的最重要的分析家之一（我有充分理由，避免使用“拉康派”这个形容词）。他对拉康的研讨班及其参考资料有独到而深入的了解。他富于文化修养，精通文学与哲学，并具有一种罕见的能力：以极其清晰而严谨的方式处理精神分析的难题。你即将阅读的这本书，就是一个绝佳的证明，使我不必再多言。他的去世，是精神分析的一大损失——你将会明白为什么。

让·阿卢什意外离世，使我的前言就此止步；因为我认为，它唯一可能的继续，应当是我的沉默以及阿卢什自己的话——他于2019年应巴黎 Encore 邀请，阐述自己当时新近出版的这部著作的主要命题时所说的话。我选择这份报告，作为英语读者初次接触他这部著作的最佳方式。

O.Z.，墨尔本，2024年3月

英译者说明

首先，我应当告诉读者，阿卢什既是我的挚友，也是堪称典范的分析家。简言之，向他学习意味着我们的确信受到撼动，也就是说，我们的偏见受到撼动；因此，我是以分析家及其著作读者的身份着手这项翻译的。

如今，精神分析的状况大体已沦为对观念的陈词重复：一些公式化的老生常谈，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庇护之下，催生出规模堪比巴比伦的、令人绝望的话语。

本书直面并勾画出精神分析家和精神分析陷入的许多流沙地带。它以严谨而毫不妥协的方式，揭露理论与临床上的错误观念。这本书具有一种不常见的品质：以清晰而严谨的风格处理其主题。也正是这一点，从头至尾构成我的关切：如何用英语的对应表达传达让·阿卢什的风格，包括他创造的新词，同时保留其意义。为此，我较少寄望于那句不可避免的、著名的——或者不如说臭名昭著的——“翻译者即背叛者”（traduttore　　traditore）；在这里，更具体地说，就是我们那些“假朋友（faux amis）”。[注]

> [注] 意大利语 traduttore（翻译者）与 traditore（背叛者）声音相近；此处保留原词。法语 faux amis 字面为“假朋友”，在语言学习与翻译中指形式相似而意义不同、容易使人误认的跨语言词语。

我以一种全然不同的视角展开这项工作，它直接关联于我参加阿卢什2009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研讨班的经历。问答环节中，我说了类似这样的话：“听从自己的主意而犯错，胜过听从别人的主意而犯

错。”我用一句西班牙语（克里奥尔）谚语来说明这一点：“要成为识途的向导，没有什么比迷路更好（Nada mejor que perderse para hacerse baqueano）。”（那场会议在法语和西班牙语之间自如切换。）我记得，阿卢什回应说，他喜欢这句话，而且要把它拿来用。恰巧，我认为这句谚语，既最适合这项翻译，也最适合接近精神分析。

最后一项同样重要：本书与法文版存在以下差异。这些差异均由我独自决定，因此应由我负责：

- 英文版为本书加了副标题：《拉康与拉康派》。

- 英文版收入了阿卢什应邀于2018年12月14日在巴黎 Encore 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报告涉及他当时即将出版的《论越入行动的新评述》。阿卢什从未提出要把这份报告放进书里；再次强调，将其作为一项声明收入，是我的选择。因为，当他介绍那时即将完成的著作的主要主张时，谁比阿卢什本人更适合用自己的话来引介这一主题呢？[注]

> [注] 英文底本此处写2018年12月14日，前文《前言》写2019年。作者官网的法文报告目录列为2019年12月14日。两处译文分别保留底本年份，不暗中统一。参见作者官网 Interventions（法语）。

让 · 阿卢什自己的话与解释，将使读者得到一种宝贵的提示：他如何通过就某一主题举办研讨班，为自己的许多书作最后的加工；他提出新颖的思路，回答听众提问，由此检验它们，重新加工或微调自己的许多命题。这些命题如果被证实正确，大多最终会成为一篇文章或一本书。

奥斯卡·曾特纳

2024年12月19日

澳大利亚墨尔本

让・阿卢什关于《论越入行动的新评述》的报告[注1]

[注1] 让・阿卢什，《关于〈论越入行动的新评述〉的报告》（Exposé sur Nouvelles remarques sur le passage à l'acte），2019年12月14日，第3页。我非常感谢西尔维娅・阿拉克，她应我的请求，寄来一份让・阿卢什报告的副本。Encore，巴黎，2019。

首先，感谢各位盛情邀请我来谈一个我非常愿意与你们分享的问题。我可以说，这个问题"向来"就是我的问题，至少从童年起，甚至在我出生以前就是如此：也就是疯狂的问题。我这样定位它——也许你们会同意，因为通过精神分析或精神医学实践，疯狂也在职业上关乎你们。众所周知，先是弗洛伊德，继而米歇尔・福柯和雅克・拉康，都走出了医学偏向。尤其是福柯，他在《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狂史》中引用帕斯卡："人必然如此疯狂，以至于不疯狂就等于另一种疯狂。"

读过这部决定性著作的人会知道，福柯以"这另一种疯狂"指称初生的精神医学。关于它，我要同皮内尔以及晚得多的亨利・埃一起强调：[注2]精神病学的定义包含"自由"一词。可以将这一点写作：S1 ⟶ S2。拉康也拒绝"疯"与"不疯"的区分；对他来说，不存在隔着一堵墙的两边：一边以收容精神病人为理由，将少数人扣留起来，另一边则是那些被划为健全者的其他人；根本没有我们与他们。尤其在"精神病态者"一词流行时——正如今天的"自恋性变态者""自闭症者"，以及较早的"神经衰弱者"，还有许多其他被构造出来的想象实体——拉康借"精神病态者"这个词的构成说道："我们怎么没有发现，每个人都因有一

个灵魂而受苦？”（我是凭记忆引用的。）这里，“灵魂”替代了“psyche”，如同克雷佩林所用的 Seelenstörungen——“灵魂的紊乱”，而非“精神病”。拉康特意强调：如果精神病者是一个被“强加的话语”占据的人，那么每个人也都是如此：“我们怎么没有感觉到，我们所依赖的话语，在某种意义上是强加给我们的？[注]”谈到一个呈现宇宙论妄想的妄想痴呆症患者时，他说：“嗯，是的，他是个像我一样的人，一个教条主义者。”〔英译者注：拉康在别处说过类似的话：精神病是一种力求严密的尝试。〕这是一种自我诊断吗？

> [注2] 我也曾为这一点辩护，将它置于公理的位置作为一个陈述（《拉康的场景及其魔法圈》（La Scène lacanienne et son cercle magique），巴黎，Epel，2017）。

> [注] 英文底本将 not 放入“话语被强加”的从句，造成与前文相反的意思。作者2019年法文报告第1页的否定属于外层“怎么没有感觉到”的疑问，内层肯定话语被强加；正文据此校正，英文原文仍保留供对读。

拉康的其他论述，很容易使人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一直保持神经症、变态、精神病这一三分疾病分类。[注3]然而，对我而言，使用这一精神医学—精神分析的分类体系，是某种错误，也显示他对它感到不自在。人们记得那次不幸的患者呈示：患者是一名跨性别者，拉康让听众拿患者取乐。这立刻令我感到惊骇，尤其因为我原以为这个例子是独一无二的。在那次呈示中，人们当着患者的面、以患者为代价来嘲笑他（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患者是笑话中的“第二人”）。拉康在安托南·阿尔托的问题上也错了。他说：“这个家伙再也不会写作了。”仿佛自己的知识使他能预见未来——结果完全不是这样。拉康也像其他人一样改变过诊断：玛格丽特·安齐厄最初被表述为“自我惩罚性偏执狂”，很久以后却又被视为钟情妄想——同样也不是真的。这一点并不罕见。想想所谓“狼人”：接诊过他的人，以及众多评论其病例的人，究竟给了他多少个诊断？弗洛伊德把他看作神经症者，露丝·麦克·

布伦瑞克实际上把他看作偏执狂，拉康把他看作精神病者（尽管后来放弃这个标签），塞尔日·勒克莱尔则说他经历过“一次精神病性发作”。

> [注3] 见我的批评“对 pernepsy 的扰动”（Perturbation in pernepsy），收入《拉康之爱：墨尔本研讨及其他著作》（Lacan love, Melbourne seminars and other works），玛丽亚-伊内斯·罗特米勒·德·曾特纳与奥斯卡·曾特纳编并作前言（墨尔本，Lituraterre，2007）。

总之，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摇摆，使我们能够肯定：将患者视为与自己不同的人，这种对待方式使拉康感到不自在。我由此推论，放弃这类划分并不会造成任何损失；至少在弗洛伊德领域，结果恰恰相反；精神病理学也可以一并放弃。[注]排除精神病理学时，我没有顾及这样一种可能：它曾与疾病分类相对立，被提出为精神医学的另一种新范式（朗泰里-洛拉）。当然，弗洛伊德曾将“精神病理学”用于一部著作的标题〔《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其革新意义不可低估。〔英译者注：阿卢什提及此书，是因为该书没有划分他们（精神病人）与我们（精神健全者）。〕然而，我们注意到，弗洛伊德将这一词用于那些不被认作精神病人的人的日常生活；他的定义与玛丽-克洛德·朗博特在《忧郁话语：从现象学到元心理学》（Le Discours mélancolique: de la phénoménologie à la métapsychologie）中的定义之间，隔着一道深渊。除了“精神病理学”一词的歧义外，两部著作毫无共同之处。

> [注] 英文底本把“也放弃精神病理学”变成“在精神病理学中”，改变了句法关系。正文据作者2019年法文报告第2页校正。

作为背景，我们不应忘记乔治·朗泰里-洛拉指出的一点：[注4]精神医学史上有三个相继出现、又时而彼此交叠的范式。[注5]其一，是从皮内尔到法尔雷的精神异化范式；[注6]其二，是精神疾病范式：19世

纪中叶，法尔雷提出精神疾病的多样性，拒绝皮内尔所主张的精神异化的统一性；其三，是精神病理结构范式：1926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30届精神病医师大会上，布洛伊勒提出精神分裂症群的概念，从而开创这一范式。据朗泰里-洛拉说，1977年亨利·埃去世，标志着第三个范式开始走向终结。二十年前，朗泰里-洛拉又说道："除非滥用知识，我们对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以来精神医学可能有怎样的范式，一无所知。终归，我们不妨说：那就算我们倒霉吧。"[注7]

[注4] 乔治·朗泰里-洛拉，《现代精神医学范式论》（Essai sur les paradigmes de la psychiatrie moderne）（巴黎，Éditions du Temps，1998，第53页）。关于这一出处，我还要感谢居伊·卡萨达蒙的提醒，他在一部正在撰写的关于维奥莱特·诺齐埃尔的著作中提到了它。

[注5] 因此，蒂埃里·奥斯滕与热雷米·辛泽尔在其很有价值的介绍文章"埃米尔·克雷佩林"中写道："20世纪中叶，克雷佩林的'范畴式'临床实体模型受到质疑。随后，精神障碍的统一性进路逐渐占据主导，与对精神病机构和精神医学疾病概念的批评一道兴起。于是，在美国，克雷佩林的旗号之下出现了推动'医学'模型复兴的趋势，与生物精神医学的扩展同时发生。"（我能读到这篇文章，要感谢帕特里克·朗德曼。）

[注6] 法尔雷问："当我们支持单狂症学说时，我们在做什么〔……〕？"并回答："我们使激情与疯狂之间任何严格的分界线都成为不可能。"（引自马克·勒内维尔，《犯罪与疯狂：两个世纪的医学与司法调查》（Crime et folie. Deux siècles d'enquêtes médicales et judiciaires），巴黎，Fayard，2003。）莫雷尔也拒绝单狂症学说，称其为一种"人为制造的实体"。由此为他的退化学说清出了道路，而某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后来将拒绝这一学说。

[注7] 乔治·朗泰里-洛拉，《现代精神医学范式论》（Essai sur les paradigmes de la psychiatrie moderne）（巴黎，Éditions du Temps，1998，第22页）。

北美统计范式在全世界被采用，印证了戴高乐的这句话："权力不是夺取来的，而是捡起来的。"于是，我们这些精神科医师成了一片荒漠的居民，新的统计范式轻易便在其中建立起来；如今，神经科学又在大

脑里寻找高尔和颅相学曾经寻找之物的对应物：犯罪或疯狂的隆起。[注8]那么，走到精神医学一旁的精神分析呢？它固然拒绝最新的统计范式，却并未与此前三个范式撇清关系，或多或少都参与其中。因此，每当精神分析试图提出一种统一的疯狂观时，它便显出皮内尔式的面貌，因为它的“心理装置”（弗洛伊德）或“主体结构”概念就是在此被引入的。弗洛伊德那里没有两套心理装置，拉康那里也没有两种主体结构。精神分析以神经症 / 精神病 / 变态的临床三分为基础时，也属于法尔雷一系；而当它展开一种精神病理化的话语时，则参与了第三个范式。

> [注8] 马克·勒内维尔，《犯罪与疯狂：两个世纪的医学与司法调查》（巴黎，Fayard，2003）。此书资料极为丰富，通过考察精神医学与司法制度的关系来叙述精神医学史。

在这部《论越入行动的新评述》（Nouvelles remarques sur le passage à l’acte）出版以后回头来看，我想可以说，这部著作开辟了一个区域——这是从 ZAD 运动参与者到玛耶特·维尔塔尔、帕特里夏·雅诺迪都珍视的用语——一种新的越入行动观可以在其中被写入。写作此书时，我在理论上紧密依托拉康，在临床上则紧密依托费蒂·本斯拉马近来发现的“史诗性跃迁”。

要清出一片区域，为越入行动的新问题化提供位置，需要推开几下——有点像从拥挤的人群中开路。必须从三个不同方面，推开一些关于越入行动的评论。

I

首先是拉康派，甚至包括从前的同道。我在书中批评的那些人，完全取消了越入行动，将其重新吸纳到一种他们自称从拉康那里继承的行动观之中。他们将自己的著作题为“转入行动”（To pass to the act），这显然是在影射越入行动。然而，这一措辞似乎完全不包含越入行动，因为越入行动的人，并不像他们那样，打算“转入行动”。奇怪的是，拉康曾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精神分析家交战（IPA，洛里·洛费尔将这一缩写读作“当下精神分析产业”，Industrie Psychanalytique Actuelle），这些人到头来却与一位〔IPA的〕精神分析家持相同立场；我在书中也反驳了后者的著作。他们将越入行动淹没在一个湿软含混的行动概念之中；而来自 IPA 的分析家玛丽- 克洛德·朗博特，则不自觉地显示出：他们团体为自己规定的整套伦理规则与实践，目的无非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越入行动，尤其是精神分析家自身的越入行动。法语“避免”（éviter）与“邀请”（inviter）相近；倘若以“再也不做那事”（性事）为出发点，往往会转为“比以往更甚”（拉康），那么“避免”就发出了邀请。上述拉康派通过使越入行动从自己的领域消失，来避免越入行动。在他们的著作中，你找不到对那些确曾占据拉康注意力的越入行动的分析：帕潘姐妹、玛格丽特·安齐厄以及“年轻女同性恋者”的越入行动。[注]它们是否确如拉康所说，属于越入行动，仍有待评估。他们的著作也没有提到伊里斯·卡贝苏多或教师瓦格纳的越入行动——对于这两例，我们同样应当追问，它们是否其实属于史诗性跃迁。另一方面，Epel 目前出版的卡洛斯·布斯克德的著

作《里卡多·梅洛尼奥的四起罪行》，清楚地记述了若干相似得出奇的越入行动。小说家与罪犯交谈，除了为出版而与之交谈，没有别的意图；他得到的东西，与治疗者会使罪犯说出的东西大不相同。

> [注] 正文三例及紧接问句据作者2019年法文报告第4—5页校正为“越入行动”；英文底本改作 acting outs，改变了概念分类。éviter / inviter 词音相近，原语借此让“避免”转成“邀请”；“再也不 / 比以往更甚”的对照把拒绝与反复加剧连接起来，中文不能重现这组声音关联，故保留法词。

通过这本书，我提议与越入行动建立另一种不同的关系：少一点恐惧，少一点怯懦，也不以悖论的方式怂恿人们越入行动；不再把它看作必须首先避免的东西、最坏的东西。因为，确实存在对越入行动的恐惧。[注9]这种恐惧尤其使我们忘记：如果“疯狂是自由的一种疾病”（亨利·埃），那么，以一个自由的存在者、而非一个精神错乱者来对疯人说话，才能帮助他认识到，即使在疯狂之中，他也在行使自己的自由。这种恐惧使我们无法在细小的动作中看见越入行动，例如摔碎一摞盘子、烧掉报纸〔克莱尔·拉纳〕，或者摔门离开房间。因为，只要一提“越入行动”这个词组，我们首先想到的表现就是谋杀或自杀。[注]

> [注9] 关于这一点，可以观看帕特里克·朗德曼发起的讨论：“精神药物是心理痛苦的解药吗？”https://youtu.be/o6SUa6ubegI。让·阿卢什，《关于〈论越入行动的新评述〉的报告》，2019年12月14日，第5页。

> [注] 据作者2019年法文报告第5页校正两处：作者并未以悖论方式鼓励越入行动；末句特指谋杀与自杀。英文将前者的否定拆散，又将谋杀泛化为死亡。

这种挥之不去的念头，是一种畏惧死亡的关系的征兆。菲利普·阿里耶斯首先指出：1914—1918年的“大屠杀”以后，西方转过身去避开死亡，使死亡无法成为问题，因而让它变得野蛮，或者按我的说法，变得“干枯”。[注10]这样一来，仿佛死亡是个禁忌，我们便失去了“驯服

它”、懂得如何与之相处的方式——在可能的限度内，如果死亡如拉康所说，是“绝对的主人”。这种干枯状态，也见于人们普遍对越入行动的回避。

> [注10]《干枯死亡时代的哀悼情色学》（Érotique du deuil au temps de la mort sèche）（巴黎，Epel，1997）。火化使尸体干枯。

如果说挥之不去的执念从来不是好顾问，那么我们便会同意：这种回避死亡的做法——这种拒绝死亡驱力的做法，拉康曾想通过将死亡驱力与象征相联来终结它——给实践者造成了问题，而实践者自己甚至毫不知情。这使他的立场僵硬，不给他自主的余地，也不让他能够自由介入。他只有对那古老的名称（见于《圣经》、古印度）“两次死亡之间”有所觉察，才能获得这种自由。[注11]请原谅我这样说，那里正是疯狂发生的地方。如果认同一种普遍信念，认为对每个人来说，生命都是最珍贵的东西，那么自杀和谋杀就仍然不可接近。据说，如今西方的自杀如此众多，恰好证明实际情形并非如此。

> [注11] 见让·阿卢什，“疯狂、第一次与第二次死亡”（Folie, première et seconde mort），《精神医学演进》（L’Évolution psychiatrique），第81卷第1期，2016年1—3月。

II

还必须摒弃媒体传播的越入行动的通俗观念；媒体为专家、社会学家、精神科医师和精神分析家开放专栏。他们反复说、反复写，圣战者的谋杀是越入行动，但它并不是。为什么？因为它属于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恰恰使两次死亡之间成为肉身死亡以外的一个处所。它在这一点上不同于帕潘姐妹的罪行：后者始终无法解释，以至于文学、电影和戏剧很早就接替了这次暴烈的越入行动当即引发的激烈精神医学

讨论，而始终没有人能够一锤定音。是否以一个故事为依托，区分了越入行动与史诗性跃迁。史诗性跃迁认识到、有时还宣告自己的动机，并且是在知道缘由的情况下实施的，尽管并非完全知道其缘由。

III

还必须搁置拉康的一些评论。它们给人一种印象：某种东西，有时是一个词、一句话，会在行动中显现，代替被说出或讲出。对他而言，弗洛伊德患者“年轻女同性恋者”——即玛格丽特・琼卡——那所谓的[注12]“越入行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按照拉康最初的表述，她的越入行动表现的是分娩，其中运用了 niederkommen 的两个意思（“让落下”与“分娩”）；因此，据这一表述，她从跨过铁路的一座桥的栏杆上投身下去时，就被认为是在分娩；分娩会是越入行动所是的东西，会是这次越入行动所意味着的东西。这个假定的话语（拉康依托弗洛伊德假定出来的），就这样被转入了行动，或者更确切地说，被转入行动之中：“我也像如今怀孕的母亲一样，想生下父亲的孩子。”这种所谓的解释让我发笑。她为什么不直接说出这句话？她如此自由，十四岁时便爱上了一个与贵族有些关系的妓女，让家人极其不安。[注13]我们不知道！然而，我们通常就是以这种“精神分析”理论来接近越入行动：假定越入行动承载着一个无法用话语表达的言说。细究起来，这

个理论无非是一种被20世纪50年代的拉康强化了的成见。而且，这种成见为寄托于言语的希望大开方便之门；倘若希望确实仍是通向自杀的康庄大道，那么这种希望便可以被视为令人绝望。[注14]

[注12] 让·阿卢什：我说“所谓的”（Ledit），因为我已证明，它并非一次越入行动；见《你的狗的影子：精神分析话语、女同性恋话语》（Ombre de ton chien. Discours psychanalytique, discours lesbien）（巴黎，Epel，2004）。

[注13] 伊内斯·里德尔、迪亚娜·福格特，《弗洛伊德那里的女同性恋者，世纪中的女同性恋者》（Homosexuelle chez Freud, lesbienne dans le siècle）（巴黎，Epel，2003）。

[注14] 多米尼克·西莫内经常到法庭旁听，在《鸭鸣报》（Le Canard enchaîné）中报道所见，因此也追随了安德烈·纪德的脚步。2019年11月27日，他的一篇文章以一个名叫阿德里安的人的话作标题。此人29岁，因杀害同龄的加埃唐而在兰斯重罪法庭受审：他隔着一道玻璃门，开了两枪猎枪。我们等着听动机、解释。“我向门开枪，是因为我向门开枪。”他弟弟此前曾叫他来帮忙。人们问他：“为了这个，你能够一直走到杀人的地步？”我提及此例，只为了他的回答（值得想一想）：“不，是事情的展开〔我强调〕把我带到了这里。”

上述厘定，使一种新的越入行动概念成为可能，它将一种既平常又普遍的经验纳入其中。本书封面上的自由滑雪者托马斯·迪耶，曾跃下令人眩晕的岩壁。他用一句话、自己的座右铭概括了这一点：“思考就是投降。”其他运动也是如此……在网球场上回球时，如果我想：“我要把球回到对手的正手还是反手？”那么每次球都会落到网上。我们即将付诸实施的任何决定，同样如此。

我们一群人去躺拉康的分析榻的那段时间，[注15]有个朋友告诉我们，他在会谈中一直琢磨，要给即将出生的女儿起什么名字。每想到一个名字，他就在会谈中发现自己即将强加给女儿的种种可怕之处，于是

放弃那个名字。我不知道他的问题怎么解决的。也许拜分析所赐，这个女孩从来没有得到一个名字。思考、按他自己的方式分析——也就是说，只要他是在思考——最终就会造成他自己的抑制。

> [注15] 澄清一下：不是我们五六个人同时躺在拉康的分析榻上。我们从远郊一家CMPP（Centre medico-psycho-pedagogique，医学心理教育中心）回来，挤在同一辆车里，同时来到他诊室门前。

在拉丁美洲，阿根廷人是笑话的对象，有点像法国人拿比利时人开玩笑，但理由相反：他们太聪明，口才太好，胆子太大。他们的拉美朋友[注16]就是这样看他们的。一个住在墨西哥的朋友的妻子，给我讲过这个笑话。她笑着说，在阿根廷，一个男人亲吻一个女人时，女人会挥手打断他，把他推开，说："等等，这事我得想一想。"同一位墨西哥朋友告诉我，墨西哥女人的反应则不同，用今天的说法，她会说："酷，太棒了，继续！真好！"……思考抑制行动：只要举一个强迫症状，就不会对此有疑问。[注17]拉康用一个拆解笛卡尔我思的公式固定了这一点；它以自己的方式，与我的自由滑雪冠军朋友的座右铭说着同一件事："我思考之处，我不在；我在之处，我不思考。"分析家并不邀请分析者说他所思考的东西，而是说来到脑中的东西……你会同意，这大不相同。一边是掌控（人们以为如此，其实是一种勃起），另一边则是放手。[注]当一个人以"我想……"开头时，你可以确信，他

在一个不同于他所说之物的地方。如果有人对你说“我想我爱你”，你会认作爱的宣言吗？不会，你会让他或她留在他或她的思绪里。拉康指出：“爱不思考，自恋的一个效应。”[注18]

> [注16] 一个很有名的笑话表明了这一点：“阿根廷人怎么自杀？”答：“他爬上自己的自我，然后跳下去。”

> [注17] 一个典型例子（弗洛伊德讲的）：司机在路上绕过一块石头。不久，他停下来，想到应该把它从这里、从这条路上移走，因为它可能引发事故。他清理了道路，回到车上，随后又想，自己的行动反而可能引发事故，因为赶时间的司机不再会被这块石头迫使减慢过快的车速。他第二次下车，把石头放回路上。于是我们……

> [注18] 雅克·拉康，《幻想的逻辑》，1967年1月25日。让·阿卢什，《关于〈论越入行动的新评述〉的报告》，2019年12月14日，第8页。

> [注] 据作者2019年法文报告第7—8页校正：笑话前列举的是智力、口才与胆量，并非神经质；后文说的是掌控（maîtrise），而非一个主人。括号用 bandaison（勃起）把自以为的掌控转入性的身体状态，英文“僵硬”弱化了这层双关；正文保留其直接含义。

以此为基础，我重新考察越入行动的问题，采用我认为唯一与分析方法一致的方式：细致、广泛、详尽地研究病例，而非使用误导人的临床小片段。拉康称赞弗洛伊德发表某些病例的方式：以弗洛伊德报告的材料为基础，人们能够提出另一种不同于弗洛伊德的解释。我认为，这一标准具有决定性。病例如同梦一样，呈现出一个极其密集的加密资料网络，迫使分析它的人避免迷失在不合时宜的思虑之中。评论一个梦并不等于解释它——尽管评论者无论愿不愿意，都在联想。

因此，本书有一章讨论路易·阿尔都塞杀害妻子的事件；这一事件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在那个圈子里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另一章涉及玛格丽特·杜拉斯小说《英国情人》的女主人公。克莱尔·拉纳杀死了

那个与她同住、却并不为她所爱的男人的侄女，并将尸体肢解。[注]尤其是对这一极其暴烈的动作的分析：它表现为越入行动与史诗性跃迁的结合，并显现为一种哀悼的方式。人们可以跟随弗洛伊德，把它叫作“哀悼工作”。然而，不：哀悼归根结底不是工作，爱也一样，不存在什么“爱的工作”。阿兰·巴迪欧留下了这个煞有介事的说法，指一种延续已久、失去活力的恋爱关系，在其中，两个伴侣开始彼此厌倦（这还是说得轻的）。哀悼和爱与行动有关，也与分离有关；为此，拉康发明了“分离分割”（sépartition）这个概念，几乎人人都不在意它。

> [注] 英文底本此处作 niece（侄女 / 外甥女），故保留“侄女”。本书第三章对亲属关系的记述不同；此处不静默统一。Landerneau 在法语惯用语中表示特定圈子里引起骚动，故译为“那个圈子”。

如今，人们依循弗洛伊德思考哀悼，所使用的坐标，与思考越入行动时同样不合适。[注19]在疯狂中，哀悼也试图发生，正如在分析中一样。自1914—1918年战争以来，每个哀悼者都发明了一种独特的哀悼方式。[注]因此，像克莱尔·拉纳那样暴烈的史诗性跃迁，可以被接纳为一种有效的哀悼方式——她自己的方式。然而，必须将其与越入行动区分开来；本书通过这两起谋杀，揭示的正是这一点。

> [注19] 我曾在《干枯死亡时代的哀悼情色学》（巴黎，Epel，1997）中解释这一点。让·阿卢什，《关于〈论越入行动的新评述〉的报告》，2019年12月14日，第9页。

> [注] 英文底本将十四至十八解释成年龄。作者2019年法文报告第9页使用的是1914—1918年战争的简称，并与前文谈战争后的死亡及哀悼相接；正文据此校正。

不管怎样，在座各位读过《精神分析行动》，因此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强调一个特征。在我的《论越入行动的新评述》中，这一点特别指向分析家，指向他的实践最为有效之处。这里涉及一个可能被当作

怪异产物的概念，因为拉康说“明晰的越入行动”，甚至说“知情的”越入行动，所指究竟是什么，仍然难以设想。这种奇特的越入行动，对分析家而言将意味着不思考，因为“他正是通过不思考来操作的”。[注20]对此，我可以作证：与他进行分析的那些年中，拉康一次也没有向我谈过他对我的某个想法。

> [注20] 雅克·拉康，“研讨班《精神分析行动》概要”，1967—1968年；这一陈述即写在其中。

这对我好得多……对我好得多，但也……对他好得多。我与他一道分析我自己。[注21][注]西班牙语承载着这个“我自己”：“Yo me analizo con”；而不像法语或英语那样说：“我过去或现在与某人处于分析之中。”有时，一个孩子自行决定做一件事，例如第一次骑上自行车，而大人准备帮助他时，孩子也会对大人说出这样的“我自己”。“不，我自己来！”孩子一边回答，一边挥手把大人打发走。如果大人意识到，孩子的这一决定多么严肃，甚至在主体上至关重要，他就会接受。让另一个人、这个被爱的人独自一人（在某些场合），非但不违背爱，反而可以被视为爱的一个举动。[注22]

> [注21] 让-吕克·戈达尔拍摄过一个场景：一对男女在咖啡馆里交谈。年轻女子郑重告诉伴侣：“我不依赖你，”她说，“我是与你一道算。”

> [注22] 我曾在让·阿卢什《拉康之爱》（L’Amour Lacan）（巴黎，Epel，2009）中解释这一点。

> [注] 原注21据作者2019年法文报告第10页校正：counting on you 被英文重复两次，抹去了法文 sur（依靠）与 avec（与……一起）的区别。法语同一动词兼有关乎依靠、算数的不同搭配；“与你一道算”刻意保留后一搭配，使独自进行分析而与另一人同在的论述不被改成依赖对方。

沿着“明晰的越入行动”这条线索，拉康进而将分析定义为：“一种偶然发现自己开启了人与人之间截然不同的行动方式的实践。”[注23][注]通过这个定义，我们与思考相距千里。如果不再同布洛伊勒一道，将“精神分裂症”这一实体视为“思维障碍”，它会变成什么？他举出的这种“障碍”的例子，至少可以说是滑稽的。他问一位他认作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人：“埃及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在亚述与刚果国之间。”他评论道：

[注23] 这一引文，在这部《论越入行动的新评述》（Nouvelles remarques sur le passage à l’acte）第125页有更详细的展开。

[注] 原注23据作者2019年法文报告第10页校正为本书书名；英文底本作 New Remarks on Acting Out，误将越入行动换成行动展示。保留英文原文供核对，不据错题混同两术语。

> 仅仅是将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与最现代的国家之一在思想中相联，就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能：时间概念在患者那里失效，而在正常人那里，它在无意识中从不停止发挥作用（可是，无意识中能有包括时间在内的概念吗？）。但从地理角度来看，把它们与埃及这一概念（又是概念？）拉近，就更奇怪了。“非洲东北部”这类最相关的观念[注]，在患者那里没有出现；反倒出现一个属于另一大陆、边界不与埃及接壤的国家，然后他又联想到另一个只有通过苏丹才与埃及间接相关的国家。然而，患者的回答却证明，他很清楚埃及的地理位置。[注24]

[注24] 欧根·布洛伊勒，“精神分裂症”，1926年8月2—7日第30届法国及法语国家精神病医师与神经科医师大会上的精神医学报告（巴黎，Masson，1926）。

[注] 正文引文据作者2019年法文报告第10页校正为非洲东北部；英文只作 North Africa，遗漏了“东”。这里仍是作者所引布洛伊勒的话，不另作译者地理判断。

我们很高兴在此得知，欧根·布洛伊勒很懂非洲地理。但布洛伊勒又说，患者具有一种被认为不健康的时空观念；就在收集到这个“有缺陷的”回答以后，他便看出一种“联想障碍”、一种“联想松弛”（也就是观念之间的联想）。据精神科医师的判断，这种松弛据说使思维变得不正常。“联想”在这里的含义，与弗洛伊德那里并不相同。在弗洛伊德那里，什么与什么相联无关紧要，一切都可以，没有一个预期的正确答案；而布洛伊勒那里，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却有一个。[注25]你们可以从这里看到，这位第一次提出自闭症的人，对患者抱持怎样一种规范性且不友善的立场。

> [注25] “亚述”是这样一个不受欢迎的联想吗？如果“埃及”唤起金字塔、法老和其他古老的东西，将它与“亚述”相联，并没有什么不合适。

父亲、母亲、孩子，或者我们所能想到的任何东西，其观念、甚至概念，真的在无意识中吗？当我们同弗洛伊德一道认为存在“无意识的思想”时，就会不知不觉地被引向对这一点的承认。

保证自己的思想保持沉默，不被它们拖累——这应当成为分析家的一个问题。它将成为他在操作中的修炼，也就是说，对分析者产生某种效应。我们有一个反例。塞尔日·勒克莱尔（愿他安息）的一部著作，当时在出版界取得过一些成功，尤其因为它出自拉康主持的一套丛书，也因为开篇就写了分析家（他自己）在听某人说话时所想的东西。[注26][注]而且，这一页文字的文学品质无可置疑。在《进行精神分析：论无意识的秩序与字母的实践》开篇，[注27]勒克莱尔揭示并叙

述了一个秘密——就像一个魔术师，宣布将揭露自己的戏法秘密，弄得观众晕头转向，从而为下一轮做更好的准备，并且已经在完成下一轮了。勒克莱尔写道：

> [注26] 勒克莱尔的这一做法，被安妮·弗兰克近作《交织》（Entrelacs）（巴黎，Éditions des Crépuscules，2019）当作范例。作者在左页呈现治疗的故事，在右页呈现自己的思想。两组页面之间的折线，清楚显示了左页使用元语言的情况。与书名相反，这里并没有交织。

> [注27] 《弗洛伊德领域》（Le champ freudien）丛书，由雅克·拉康主持（巴黎，瑟伊出版社，1968，第9页）。让·阿卢什，《关于〈论越入行动的新评述〉的报告》，2019年12月14日，第11页。

> [注] 原注27据作者2019年法文报告第11页校正："弗洛伊德领域"是出版勒克莱尔这部著作的丛书名，拉康为主持人，并非此处所引一部书的作者。原注26末尾的"左页"在法文也如此，与前文叙述、思想的左右页分配存在疑问，仍保留并标明。

> 趁患者讲述自己的幻想之前片刻的沉默，让我们坐进扶手椅，进入精神分析家思想的隐秘之处。他立刻在这里认出一个典型的强迫性幻想，同时无法摆脱一种由熟悉感〔作者强调〕带来的轻微不适。这再次印证了他对于患者的诊断观点，于是，我们的〔原文如此〕精神分析家便任由自己思考这个幻想的种种变体。

在这些思想中，一个执业的（"拉康派"）精神分析家，从"患者的话语"中找回自己惯常的标记。于是，我们等着拉康出现……很快，这位正在思考的精神分析家就把"拉康精神分析知识"的整套行头召来："认同的问题""雅克·拉康关于作为我之形成者的镜像阶段的奠基之作"。好吧，拉康邀请分析家不思考、从而进行操作，要防止的事情之一就在这里。但怎样让他停止思考？分析家的沉默有不同方式。勒克莱尔觉得，自己的思想照亮了患者的话语。他以怎样的方式离开了自己作为分析家的位置和功能？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这些思想对于分析者所

说之物是否准确、是否切题[注]，而是更根本的一点：那些累赘的思想没有沉默下来，没有给某种沉默让出位置；这种沉默并非退缩，而是在其中，分析家的沉默在场唤起了大他者的不完备。[注28]

> [注28] 雅克·拉康，《文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第430页）。

> [注] 据作者2019年法文报告第12页校正：原语讨论的是这些思想相对于分析者所说之物的准确性、切题性；英文将分析者换成分析家，并模糊了被评议的是“思想”这一关系。

维特根斯坦懂得如何保持这种沉默。他谈到伦理时，说自己发现自己“站在通向解决之道的门前，却看不够清楚该怎样打开它”。佩索阿的一位异名作者持有同样的维特根斯坦式态度：“他观察到，要完全清晰而有道德，就得有点笨。”“要在智性上达到彻底，就得有点不道德。”[注29]我正尝试与你们一道接近的这种分析家的沉默，或许显得有点不道德：他像一个放弃备受推崇的关怀的人；而且，他“去慈善”（décharite）。[注30]站在一扇门前，没有打开它的可能，尽管希望走到另一边去，这并不容易。尤其因为分析者也想穿过这扇门，期待分析家提供手段，因而暂时停下了自己的分析。维特根斯坦、有时拉康，懂得不逃离保持沉默这一令人不快的考验，懂得留在门前，尽管有许多逃避的办法；勒克莱尔在揭露自己的秘密时的不自在，就证明

了这一点。抬出知识来并不难，哪怕人们怀疑自己实际上并不拥有它；无论如何，它都会给说出者和听到者一种有所突破的印象、一种幻觉。

> [注29] 费尔南多·佩索阿，《不安之书》（Livre(s) de l'inquiétude），玛丽-埃莱娜·皮夫尼克由葡萄牙语译出（巴黎，Bourgeois，第233页）。

> [注30] 这个由拉康创造的新词，等待着获得形状，或者更确切地说，获得肉身。在《拉康的场景及其魔法圈》（巴黎，Epel，2017）中，我为此依托的是埃里·德·卢卡，再次运用了疯狂与文学的邻近关系；米歇尔·福柯对这种关系有如此清楚的认识和说明。

分析家这种极为独特的沉默，介入分析者的分析，它可能把分析者引向大他者的不存在：在这个处所，找不到预期的解决之道，却会找到另一种解决之道，起初颇令人失望，乃至具有创伤性（拉康）。在我看来，分析家——去掉"psy"的分析家——的修炼正是这样起作用的；[注31]因为"psy"想得太多，以至于喋喋不休。[注]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说了一句话；当然，他不知道，有一天它会关乎分析，关乎分析家这种沉默在分析者那里产生的效应：说话的人放弃自己的魔法。这种保持沉默——我同拉康一道，将它称作分析家的沉默——为这一放弃的实现留下了位置，而这一放弃仅仅由于说话这件事而发生。

> [注31] 由此，我提出，将"psychoanalysis"（精神分析）改称"spichanalysis"（《精神分析是一种精神修炼吗？答米歇尔·福柯》（Is psychoanalysis a spiritual exercise? Response to Michel Foucault），巴黎，Epel，2007）。

> [注] 英文底本作 accesses；作者2019年法文报告第13页实为 ascèse（修炼），正文据此保留"修炼"，不再仅以语境推测。psy 是精神医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等职业称谓共有的前缀；保留原词，以呈现作者的删减。

这是怎样一种放弃？猜想：在分析者的言语中，持续存在于心智与肉身、被设想为关系的性，遭到了罢黜；只要分析家不以自己的思想寄生于这言语，这一罢黜就会在其中发生。

再次感谢各位邀请我，与你们谈论这一切。我借用福柯曾向一群听众说话的方式：

> 我想，我们在这里主要是为了讨论：也就是说，我根本不该说话。但无论如何，我想，为了让你们能够行使提问的权利——这将是一种审查的权利、批评的权利——我必须把自己暴露在你们的攻击之下。因此，我将提出一些稍显凌乱的评论，希望你们由此获得表达自己的机会。

这段话于1967年2月4日在突尼斯说出，刚刚收入一部对分析而言重要性不容忽视的著作：《疯狂、语言、文学》（Folie, langage, littérature），巴黎，Vrin，2019，第170页。

各篇文本的来源

导言中关于历史叙事在精神分析中的位置与功能的评述，最初于2018年7月28—29日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举行的一次研讨班上提出。本书结论中关于明晰的越入行动的讨论，也在同一研讨班上提出。

第一章的部分内容是在2018年4月21—22日于阿根廷罗萨里奥举行的一次研讨班之后写成的。

第二章及第三章的若干要素，曾在题为“史诗性跃迁与越入行动”（Saut épique et passage à l’acte）的会议上作报告；该会议由拉康精神分析学派于2018年2月3日在巴黎举办，费蒂·本斯拉马亦作了发言。

第二章“思考，行动：路易·阿尔都塞”，最初于2018年7月1日在题为“路易·阿尔都塞：政治、哲学”（Louis Althusser: politique, philosophie）的学术会议上提出。会议由贝特朗·奥吉尔维和朱莉娅·克里斯特主持，在瑟里西- 拉- 萨勒国际文化中心举行。

致谢

事实是，友谊丝毫不会削弱批评的敏锐。伊莎贝尔·沙特莱、居伊·勒·戈弗雷、蒂埃里·马尔谢斯和玛耶特·维尔塔尔，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为此，我向他们致谢。

导言

DOI：10.4324/9781003504092-1

稍等，等一等，已经开始读我的文字的你……先别继续翻阅这几页，到网上去，花几分钟就好。一段舞蹈编排正等着你：它会把你投入一池水中，和这本书是同一个池子。这要归功于克莱芒·科吉托。他与三位编舞者——宾图·登贝莱、伊戈尔·卡鲁日和布拉希姆·拉希基——一道，邀请了一群 Krump 舞者，让他们在拉莫歌剧《风流印第安人》的“野蛮人之曲”（Air de Sauvages）中展现才艺。Krump 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末洛杉矶的贫困地区。“Krump”是“Kingdom Radically Uplifted Mighty Praise”的首字母缩写，是一种起而反抗的舞蹈。[注1]

> [注1] 网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h9HP-VOJv4。另见 YouTube 上对克莱芒·科吉托的访谈，以及 M.-Ch. 韦尔奈发表于《解放报》2013年5月14日的文章。

作为开场，我们不要止步于此。舞蹈之后，还有体育表现。它能为这一点提供可贵的启示：行动发生之时，思想——或者不如说，“思考”——只能缺席。托马斯·迪耶曾是自由滑雪的世界亚军；在这项运动中，速度有一个美妙的名称：“流畅性”。他的座右铭“思考就是投降”[注2]解释了他在纵身出发的那一刻所做的事情，以及随之完成的下滑：他跃下令人惊叹的岩壁，冒着重伤乃至丧命的危险。不再思考，不思考：这是他成功完成下滑的必要条件。当然，此前他会细致地研究地形，考察下滑途中将遇到的各种条件——雪况、冲势的路线、陡直的岩壁、柔软的落地点。这叫“阅读下滑路线”，就像冲浪者“阅读”海浪一样。然而，“行动”本身却要求所有思考的缺席，在个人项目中尤

其如此。按照亨利·基辛格的说法，谁征服了权力——“那终极的春药”——谁就不再思考。这一课对分析家是有价值的；在下文中，我们将考察分析家，而不允许思考——哪怕是无意识的思考——占满质询和分析实践的全部空间。

[注2] 托马斯·迪耶于2019年3月16日在一次车祸中丧生。网络杂志《Skieur Magazine》重新发表了一篇2005年的访谈，向他致敬；其中交代了他的座右铭“思考就是投降”的背景。

在所有作为精神医学话语与实践对象的现象中，有一种可以因其处在至少四个不同领域的交汇点上而被区分出来。在这一点上，不同于症状、抑制和焦虑（弗洛伊德的三项组），越入行动涉及精神医学、司法、政治[注3]，以及姑且称为社会文化的领域。

[注3] 例如，格勒诺布尔一名学生被一名所谓精神科患者杀害后不久，尼古拉·萨科齐推出一项扼杀自由的法律，将安全置于照护之上。

只要想一想帕潘姐妹，便不会再对此存有疑问。[注4]而且，毫无疑问，与其把它视作一个病例，不如把它视为“帕潘事件”——那永不熄灭的罪行，一团白热的火焰。一次越入行动关乎整个社会。媒体最鲜明地显示了这一点：在社会领域中，它是疯狂与精神医学最突出的涌现点。被迫离开自身范围后，精神医学话语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些困难；比起其内部所处理的困难，这些困难更有理由被提出。困扰它的问题变得引人注目，我们也不再知道，谁有能力解决它们。难道是要公众——不再只是专家——来应付这些问题，尽管公众并不具备相应的手段？

[注4] 雅克·拉康关于帕潘姐妹的文章，发表在一本超现实主义杂志上。见弗朗西斯·迪普雷，《越入行动的“解决”：帕潘姐妹的双重杀人案》（La “Solution” du passage à l’acte. Le double crime des sœurs Papin）（图卢兹，Érès，1984）。

在这一背景下，值得关注的是观看过雷蒙・德帕东电影《十二日》的观众。这部电影既扣人心弦，也富有启发。它涉及法国法律对一名遭到非自愿精神科住院的患者所规定的法定期限。患者必须到自由与羁押法官面前，由法官决定患者应继续住院，还是可以自由离开。德帕东记录并拍摄了里昂维纳蒂耶精神病院所进行的若干这样的案件。在许多值得注意的细节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精神医学专家、继而法官的决定，受到一种围绕那九名接受裁决的被拘留者的执念所影响。这种执念，就是对越入行动的恐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它发生。然而，这样的恐惧，是否可能促成接近越入行动的最佳方式？我对此表示怀疑。

出自马塞尔・莫斯的“总体社会事实”这一概念[注5]，似乎很适合越入行动。或许说得更简单些，可以把越入行动称为一种并不“合用”（fait l'affaire），却又“惹出一桩事”（fait affaire）的事件。[注]由这一地位，也就产生了我们在此提出的处理越入行动的方式：与其置于精神医学或精神分析的实践与理论的庇护之下，不如参照若干表达手段——电影、文学、媒体等等。尤其将涉及下列行动：圣战者的行动、路易・阿尔都塞的行动，以及玛格丽特・杜拉斯小说《英国情人》主人公克莱尔・拉纳的行动。

> [注5] 马塞尔・莫斯，“论馈赠：原始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Essai sur le don. Forme et raison de l'échange dans les sociétés primitives），《社会学年鉴》（第二辑），1923—1924年（收入《社会学与人类学》，法国大学出版社，“Quadrige”丛书，1968及1973年）。

> [注] 法语 faire l'affaire 意为合适、管用，faire affaire 则保留构成或形成一桩事情的关系。英文底本分别译作“do the trick”“do the job”；中文用“合用 / 惹出一桩事”提示作者借 affaire 将事件与社会性案件联系起来的双关，不将两者一概译作“起作用”。

来看看“事件”这一通称。有些事件能够轻易地被写入我们所谓的历史中；就分析实践而言，是生命史。这样的事件在这一历史中并不怎么离奇：它们在其中占有自己的位置（至少，我们起初是这样想的）；从行动者的角度如此（我们还会回到这一点），从那些受到事件袭击、对事件感兴趣、为事件触动或困扰的人的角度，也是如此。然而，另一些事件却无法融入一段历史、一个故事。我们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指向什么，或者是什么引发了它们。它们似乎无所从来，也无所归往。它们无意义，也无法被置入某种语境。人们立刻想到的，就是被精神分析重新界定的症状。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呈现为两个极端的事件：一边，是帕潘姐妹无法理解的罪行；另一边，是具有意义的跨性别者的性别重置手术、圣战袭击，乃至在丈夫火葬柴堆上自焚的殉夫寡妇的行为。不过，她并非不留下痕迹——在夫妻住所入口留下的手印[注6]；正如2001年9月11日的圣战者，以一篇署名文本的形式留下痕迹，而《世界报》在不久之后报道了这篇文本（见第一章）。

> [注6] 卡特琳·温贝尔热-托马斯，《不朽的灰烬：印度寡妇的焚烧》（Cendres d’immortalité. La crémation des veuves en Inde）（巴黎，瑟伊出版社，1996）。

这一划分标准并不新鲜，而是一件拉康遗存。这里的新意，是将由此展开的运用，尤其是从费蒂·本斯拉马近来提出的事实——“史诗性跃迁”——出发。他将其明确规定、命名并加以描述：这是一种特定的“诉诸暴力”的方式，它使“精神疾病范式”遭遇障碍（《解放报》，2017年10月12日）。本斯拉马于2018年2月3日应拉康精神分析学派邀请，比在日报媒体平台所容许的范围内，更清楚地勾画了他这项发现的广度。由此我们得知，“史诗性跃迁”这一用语，是他2011年身处突尼斯、目睹人民起而反抗之时想到的。我近来使用“起而反抗”这个用语，所指却不同于“史诗性跃迁”；我从米歇尔·福柯那里取得它，而福柯曾如此刻画另一场“革命”：伊朗革命。[注7]尽管如此，这些不同的选择

并没有阻止我欢迎史诗性跃迁的发现，并且使用它，正如这本著作所显示的。本斯拉马让人注意到史诗（《摩诃婆罗多》、《奥德赛》、《埃涅阿斯纪》、《吉尔伽美什》、《历代传说》），以及它与西方其他故事形式——悲剧、戏剧和喜剧——的关联。他也指出，史诗通过奥托·兰克进入弗洛伊德领域[注8]，并且不露声色地出现在拉康那里：第一次，拉康把史诗等同于言语化；第二次，他把神话变成一种史诗叙说（epos）的客体化呈现，其功能与神经症者的经验相重合。[注9]

> [注7] 让·阿卢什，《拉康的场景及其魔法圈：疯人起而反抗》（La Scène lacanienne et son cercle magique. Des fous se soulèvent）（巴黎，Epel，2017）。

> [注8] 奥托·兰克，《英雄诞生的神话》（Le Mythe de la naissance du héros）〔1909〕（巴黎，Payot，2000）。

> [注9] 分别见1953年的“精神分析中言语与语言的功能和领域”（雅克·拉康，《文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第237页），以及“神经症者的个人神话”（Le mythe individuel du névrosé，见https://www.freud-lacan.com/）。

这里，我们将依据本斯拉马于2019年2月3日提出的两个定义之一，来考察史诗性跃迁；这两个定义仍然是相互关联的。[注]第一个、更宽泛的定义，把史诗性跃迁定位为这样一个时刻：“某人从其过去所是之物中分离出来的运动，使其生存轨迹发生断裂或分岔；从这一断裂起，他采用一种竞斗性的方式来现身、说话和行动。”[注10]我们可以引用本斯拉马所提及的一名准备成为殉道者的圣战候选人的遗嘱，来接近第二个、较受限定的定义：“我的弟兄们，我已发誓，只有当我成为细碎的残片，没有头，也没有手，才会将自己呈到上帝及我的主人伊玛目侯赛因面前，以便在万王之王及伊玛目侯赛因面前拥有真正的功德。”[注11]这种史诗性跃迁方式虽与第一个定义相符，却仍可以与之区分；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大数的保罗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转而投

入一场与先前所进行的战争截然相反的新战争），也发生在十字军的行动中：他们前往巴勒斯坦，屠杀那些不愿皈依的“不信者”。本斯拉马指出这两种史诗性跃迁方式的差别，立即且有理由地拒绝在那种使某人变得暴力并投入圣战主义的断裂中，辨认出一次越入行动：这种变化丝毫不会使他成为废弃物。尽管本斯拉马承认，那个读过其遗嘱的人在牺牲中“让自己的身体像废弃物一样坠落”，这仍然会是一次越入行动吗？我们宁愿把这一举动看作“史诗性跃迁”，因为它能够轻易地被写入一个史诗故事，一个有意义的故事。人们曾说、也仍在说：圣战者“越入行动”。在刚刚描述的限定意义上，史诗性跃迁这一可喜的发现，促使我们重新考察所谓“越入行动”。

> [注10] 费蒂·本斯拉马，“史诗性跃迁”（Le saut épique），拉康精神分析学派（巴黎，2018年2月3日）。未发表。斜体为本斯拉马所加。

> [注11] 费蒂·本斯拉马最初在《伊斯兰中的主体性战争》（La Guerre des subjectivités en islam）（巴黎，Lignes出版社，2014，第86页）中提到这篇文本。

> [注] 英文 whoever has read his testament 中，read 未限定为“宣读”；whoever 与 his 的指代也不够明晰，不能仅据此确定读者就是遗嘱撰写者。保罗与十字军所在的比较句结构不完备：上文已区分较宽泛的皈依式跃迁与较受限定的殉道方式，但此句尚不能确定两例各自归属及比较范围，须待阿卢什法文原句核实。正文的2019年2月3日与前段及原注10的2018年不一致；主办机构的法文会议页面列2018年，此处保留底本年份并标明差异。

在后来修正自己的说法之前，拉康曾有力地提出这一标准：什么有意义，什么没有意义。1953年，他把无意识界定为“我的历史中由一处空白签署、或被一个谎言占据的那一章：它是被删禁的那一章”。[注12] 我们也读到：

> [注12] 雅克·拉康，“言语与语言的功能和领域”〔1953〕，收入《文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第257页）。

> 确实，主体承担自己的历史——就这一历史由向他者说出的话语构成而言[注13]——奠定了弗洛伊德称为精神分析的东西的基础。

[注13] 这里我们本会预期写作“l’Autre”（大他者）。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一陈述中，写作“otre”（同时指“autre”与“Autre”）会更恰当——这是我当时提出的写法。

而四年后：

> 这是欲望在其历史中曾经所是之物的真理：主体借其症状呼喊，正如基督说，如果以色列的孩子没有使石头发声，那么石头就会呼喊。[注14]

[注14] 雅克·拉康，“无意识中文字的运作，或自弗洛伊德以来的理性”，收入《文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第519页）。

这种诉诸意义与历史——确切说，诉诸一段历史的意义——的做法，遭遇了两次意外。尽管拉康对它表达过严肃的保留，当今话语却仍然采用了它。

这里，于是出现了历史化的意义（一个意指、一个方向）这一标准；它尤其用来区分史诗性跃迁（承载意义）与越入行动（在意义之外）。这种区分，也出现在别处。症状、失误行动和梦也涉及行动，就行动无法被意义、在意义中重新吸收而言。一种症状、一个梦、一次失误行动，发生于历史之外，显现出来的样子，更像禅宗庭园里的一张电子表格，或者犹太会堂里的一头猪。[注15]拉康的一则临床笔记，在这方面堪称典范。某个人每晚就寝之前，总要把自己的鞋子仔细地放在完全相同的位置；倘若忘记向鞋子献上这一夜间致敬，他就

会焦虑而无法入睡。一天，他对此感到惊讶。拉康指出，只有在那一刻，症状才充分构成，因为它这时看起来既与他的历史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任何意义。

> [注15] 马坦·亚伊尔电影《阿舍尔的命运》（Les Destinées d'Asher）（2017）中呈现过一个骇人的画面。

人们作出许多努力（有时会接受精神分析），试图用一段文字涂写这一页——它的白色由症状使之显现——并试图把这种非历史性的事件，重新带回历史叙事的中心，使其显得连贯。然而，解释对行动本身却依然无从着手；正是这一行动，以不同的方式构成了症状、梦或失误行动。因此，回到刚才描述的症状：这个人的任何熟人，难道不会把这一行为看成古怪乃至无法接近的吗？症状已经使他化为一个陌生人。症状之行动的一个侧面，任何解释都无法消解，与它在他者身上产生效果这一点有关。

拉康如此明确地强调他者性，本应使人不再追问：在那个被症状寄生的主体身上，是什么引起了症状；而是追问：症状对这个人的周围人产生了什么效果——分析一经开始，分析家便属于这个周围人群，不是吗？拉康的另一项临床观察在这方面堪称典范：所谓忧郁，是一种道德过失。有谁会一刻怀疑，忧郁的哀叹和其他自杀想法，会对那个焦虑不断外溢的人周围的人产生负面效果？有谁会怀疑抑制的有害后果？或者爱欲上的挫折，无论它们属于哪一类冲动？不再通过追查抑制、焦虑和症状在分析者身上的起源（这正是心理学的偏见、"心理职能"的偏见）来考察它们，而是通过它们在他者身上产生的效果来考察：这恰恰是转移所邀请的，也是它开启的路径。例如，焦虑使焦虑者身边的人也感到焦虑时，分析家——他本人也会对这种溢出敏感，因为他自身也能够被穿透——将不同于周围的其他人，知道如何把它

擦净；至少是在这一意义上：他会在分析中，让自己由此被唤起的焦虑保持沉默。沿着马尔科·德科尔佩利亚达的工作[注16]继续，有一项美妙的工作值得开展：以讽刺的方式，重新接手整个所谓精神病理学，并重写它——不再从其自身的视点出发，这一视点把患者同时视为行动者和对象；而是根据患者的症状、抑制和焦虑，对其周围人所产生的效果来写。转移难道不是症状最终走向消退的王道吗？而它的消失，甚至直到发生之后才被察觉。先指出一点：二十年后，拉康已经不会照原样，重新采用自己通过参照历史来定位无意识的做法。历史后来甚至令他觉得刺耳。然而，历史远非不存在于分析者的话语中；在这一点上，分析家也不能证明分析者错了。不过，这是否意味着——正如今日仍有人写的那样——一次分析以向分析者提供其生命的连贯叙事而结束，正如拉康在20世纪50年代所说的？[注17]

> [注16] 马尔科·德科尔佩利亚达，《分裂测量仪：精神医学环境中的生存小手册》（Schizomètre. Petit manuel de survie en milieu psychiatrique）（巴黎，Epel，2010）；伯努瓦·维达尔，《分裂测量仪的效果》（L'Effet schizomètre）（巴黎，Epel，2018）。

> [注17]“主体承担自己的历史，就这段历史由向他者说出的话语所构成而言，奠定了弗洛伊德命名为精神分析的新方法的基础”（雅克·拉康，“言语与语言的功能和领域”，《文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第257页）。在前一页，他提到“话语的主体间连续性，主体的历史就在其中构成”。

对此，作两点说明。（1）在分析中，行动给若干概念打上了印记：越入行动、失误行动、行动展示、性行动和精神分析行动。至今，我还没有遇到任何对行动的这种分散进行研究的工作，没有遇到任何研究追问：在这些不同的实现形式中，“行动”一词是否仍带有同一特征——唯有这种特征，才能使其在各处的使用有理据。这样的特征，可

以叫作“当下性”。或者，恰恰相反，在所有这些不同用法中，“行动”是否呈现出如此不同的意义，以至于这种多样的使用，除了造成混淆之外，没有其他效果？

（2）每一种“无意识的诸形成物”（拉康给它们的名称）都指向行动——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在这些形成物的显现之外，就不存在行动。这里值得提到弗洛伊德的一番话。被排斥出维也纳后，著名的弗洛伊德来到伦敦生活。BBC 联系他，希望做一次采访。要求很具体：他们想知道，他如何看待近期的事件，以及到底发生了什么，使纳粹迫使他离开自己深爱的城市维也纳。弗洛伊德回答：他不会谈那些事情；不过，如果采访者只向他询问精神分析，他会接受采访。齐内丁·齐达内在自己的职业生涯达到顶峰时，也有同样的情形。有人向他询问某个政治事件。他回答：“问我足球吧。”在这两种情境中，切断的行动划定了一个领域；没有这一切断行动，这个领域就会消融在当下的一般话语那流动的沙地之中。在这方面，我们想起米歇尔·福柯采取过的一个立场，有些人可能认为这纯粹就是无礼。20世纪60年代初，他应邀前往蒙特利尔大学犯罪学学院，该院由德尼·萨博主持（以下故事正是从萨博那里得知的[注18]）。学院希望确保福柯拥有尽可能好的条件，以完成《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注19]萨博顾及待客之道，带着妻子，邀请客人出去吃饭、聊天……不过两三次而已。总之，按照萨博的引述，福柯以下列方式结束了这些聚会：

> [注18] 我〔阿卢什〕是从居伊·卡萨达蒙那里听来这一故事的。他在“《肉身的告白》之后：米歇尔·福柯那里的主体谱系、精神分析谱系”学术会议上谈及此事（巴黎第七大学- 狄德罗大学，Parisles，2019年1月18—19日）。

> [注19]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巴黎，伽利玛，1975）。

> “听着，听您说话、与您交谈，我很愉快；不过，如果您允许，我们就到此为止吧。我到这里，是为了写完一本书。我的时间极其有限；尤其是，我要证明一个论题。”他就是这样对我说的。“听您这么说，我永远也写不完，因为有这个，还有那个，还有其他事情。我没有时间去追所有这些兔子；我没有时间核实这一切。”而他最后的话，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想留在一种创造性的无知状态中。而和您一起，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是不可能的。”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在别处，对无知的激情可能得到滋养；而在这里，切断的行动容许“创造性的无知”，甚至似乎是它得以可能的条件。

现在，来考虑失误行动（parapraxis）的情形：拉康问自己，它是否构成一个“行动的侧面”。[注20]的确如此；也正因此，弗洛伊德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某些动作的笨拙，而是提出他的 Fehlleistung，即失误行动。它在法语中译为“l’acte manqué”，强调这个“行动的侧面”；西班牙语译法（acto fallido）、意大利语译法（atto mancato）、葡萄牙语译法（ato falho 或 perturbado）也是如此。相较之下，英语使用 parapraxis 这个词，却多少抹去了行动，尽管 praxis 在希腊语中意为“行动”。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托马斯・埃尔塞瑟，在近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德语中，复合词 Fehlleistung 是矛盾的，因为 fehl 意为‘失败的’或‘缺席的’，而 Leistung 意为‘表现’。”[注21]相反，分析恰恰看重这一表面的“矛盾”，因为它承认，失败的表现是成功的。

[注20] 雅克・拉康，研讨班《精神分析行动》，1967年11月22日。

[注21] 托马斯・埃尔塞瑟，“十万种偶然，事后我们称之为命运”（Cent mille hasards qu’après coup on appelle destin），塞琳・勒塔韦由德语译出，《日耳曼研究笔记》（Cahiers d’études germaniques），第69期，2015年（2017年12月17日在线查阅）。

设想某个人应朋友之邀去吃晚饭。一个笨拙的动作，使他打碎了主人递给他的酒杯。任何弗洛伊德派人士都会认为，这个不幸的行动带着一条讯息；它在聚会中制造出片刻的纷扰或尴尬，而讯息可能、也可能不在当时当地或后来被解读。比如，主人或许说了什么，令打碎杯子的人不赞成；这种不赞成并未被说出来，却以打碎杯子的形式显现。一只警觉的耳朵，会听到这样一句话："我们就在这里打住吧"，也就是结束一次交谈的方式（在这里，我们的确可以说，未说出口的不赞成，并非"越入行动"，而是经由行动而通过）。然而，尽管这一失误行动将被解释，酒杯却仍然是碎的，主人也必须另买一只。这里，我们见到了失误行动之行动的一个面向。作为行动，它无法再回到自身：它不能被撤销、补偿或取消。不同于被构想为痕迹之抹除的能指[注22]，行动无法被抹除。它可以反弹，引发一个再行动、一个反应；但这一反应不会取消那一行动。

> [注22] 关于这一抹除，见我在让·阿卢什《一字换一字：转录、翻译、音译》（Lettre pour lettre. Transcrire, traduire, translittérer）（图卢兹，Érès，1984，第165、232及317页）中的论述。

口误涉及言语。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弗洛伊德从成千上万的例子中，区分出"通过口误而自我出卖"的情形。[注23]这里是一位解剖学家的自我出卖："就女性生殖器官而言，尽管我们有过许多诱惑（tentations）……对不起，许多尝试（tentatives）……"[注24]还有弗洛伊德的一名患者；他刚向她指出，她对自己的家庭感到羞耻，并对父亲有所责备，"其内容我们[注25]还不知道"。患者立刻表示，弗洛伊德这一说法不大可能成立，却又接着说："不过，对于他们，有一点还是必须承认：他们的确是出众的人。他们都有一种非凡的心智钱财（finance d'esprit）……我是说，非凡的心智细腻（finesse

d'esprit）。"[注26]这两个例子中，都已经开了枪——如此过早地喷射 / 射精般地射出了话语（(e)jaculation）。[注]尽管这并非本意，它却已经被说了出来，没有任何返回的余地。

[注2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日常生活心理学》（Psychologie de la vie quotidienne），德尼·梅西耶由德语译出，洛朗斯·卡恩作序（巴黎，伽利玛，1977，第163页）。

[注2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日常生活心理学》，德尼·梅西耶由德语译出，洛朗斯·卡恩作序（巴黎，伽利玛，1977，第149页）。请注意，这一版本指出，德语中的能指相近性并不逊色：Versuchungen（"诱惑"）与 Versuche（"尝试"）。

[注25] 那么，这个"我们"是谁？是君主式的"朕"吗？还是指所谓"与患者的治疗联盟"——那种已被拉康从分析实践中去除的偏向？这个"我们"，无疑显示出：有些人并不属于那一家庭、民族、群体或共同体，而我们将其称为"他们"。关于它，可参看菲利普·罗斯小说《人性的污秽》（The Human Stain）中的两页〔《La Tache》，若塞·卡蒙由英语译出，巴黎，伽利玛，2000，第139—140页〕。他在其中强调"我们"的隔离意义，以及它将一切独异性同化的强制性质。"我们"是一堵墙。"我们"安抚并固定了每一个躲在这堵墙后生活的人的自恋。沿着弗洛伊德所说"我"的理想具有社会性的一面，诺贝特·埃利亚斯发明了"我们的理想"这一概念，将它构想为"我的理想"的一个特定层次：一个说"我们"的"我"的理想化状态（诺贝特·埃利亚斯，《排斥的逻辑》（Logiques de l'exclusion），巴黎，Fayard，1997）。一次简单的牙痛，就足以使"我们"不再占上风。

[注2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日常生活心理学》（巴黎，伽利玛，1977，第149页）。Der Geist："心智"；der Geiz："贪婪"。

[注] 英文底本将 jaculation 与 ejaculation 叠写为"(e)jaculation"，把突然射出口的言语与射精相连。中文保留"喷射 / 射精"及原词，以免只译作"脱口而出"而丢失这一声音和性意味。

在失误行动和口误之后，我们承认，梦也是一种具有行动地位的事件。最好的证明，就是弗洛伊德那句简短的评述：最成功的梦，是人没有任何记忆的梦。在这里，弗洛伊德与《塔木德》拉开了距离，后者说，"未经解释的梦，就像一封未读的信"。此外，梦的脐这一发

现，也明确标示出梦之行动的那个侧面：它始终被排除在解释、Deutung、意义和叙事之外。梦抵达这个脐点——解释在此遭遇其界限——就具有事件的意义。

若干历史情势，使拉康（由于他对历史的拒绝），及随后一些拉康派人士（由于他们迷恋能指），把叙事遗弃在保罗·利科手中——甚至并不知道自己这样做了。我们至今仍未估量，这种忽视在何种程度上构成了一场灾难。在被唤作越入行动的地方发现史诗性跃迁，与叙事完全相连，迫使我们重新着手研究：对于越入行动，我们此前究竟知道些什么。

这就是本书的任务。〔英译者注：芬坦·奥图尔近来的著作《莎士比亚很难，生活也是》，出版于2024年，在文学领域处理的问题与困难，与阿卢什在本书中于精神分析领域所面对的问题与困难相似。按照奥图尔的说法，两个领域都充斥着误导性的简化与无用的道德规则，就像那些标准化的莎士比亚研究一样。〕在这里，我们将看到，越入行动这一概念如何逐渐被打破，让位于并转变为：不仅是史诗性跃迁，也是这种新界定的越入行动与史诗性跃迁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两者彼此“活动”、彼此具有余隙的意义而言）。在杀害埃莱娜·里特曼的路易·阿尔都塞这里（见第二章），我们将不再把他的行动视为一个整块。若无法清楚地区分一次史诗性跃迁和一次越入行动的共同在场，就无法整体理解后者；因为有两个“来吧”并存：第一个指向埃莱娜，只有作为死者，她才可能被呈现为在场并且爱着他；第二个，在其中她是一种支撑，却是徒劳地试图使性关系、大他者，乃至上帝存在。

相比之下，在克莱尔·拉纳杀害玛丽-泰蕾兹·布斯凯的事件中，越入行动与史诗性跃迁的区分清楚地显现出来（见讨论《英国情人》的第三章）。这里的越入行动，凝结在一个词里："吐"，吐出玛丽-泰蕾兹已变成的那份浇酱肉；而伴随它的史诗性跃迁，则呈现为一封信，写给一位凶手从未停止爱过的旧日恋人。他也同样是一种支撑，可能使大他者与性关系存在，并使上帝与它们一同存在。在这里，拉康的这一陈述两度得到了证实："无神论的真正公式，是上帝是无意识的。"[注27]

> [注27] 雅克·拉康，《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巴黎，瑟伊出版社，1973，第58页）。

由此，我们更有能力——即使尚未把握——至少更近地察觉（在结论中）：当雅克·拉康邀请分析家遵循越入行动所特有的"我不思考"时，他可能想的是什么。这是一次相当奇特、甚至畸形的越入行动；至少乍看如此，一旦它被称为"有所知悉的"或"明晰的"，就会这样。因此，分析终点的关键问题，以及分析者过渡为分析家的另一个问题，必须重新考虑。我们将表明，在这一位置，越入行动与史诗性跃迁的区分具有启发作用。一次分析，是通过史诗性跃迁而结束的；这一史诗性跃迁，使分析者处于一种准备就绪的位置，得以实现那明晰的越入行动，由此将他或她确立为能够不思考的分析家。

"不思考"：这句话，适合做这篇导言的最后一句。

第一章｜越入行动的当下性

DOI：10.4324/9781003504092-2

专家

2017年5月12日，《世界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试图为越入行动提供一种清晰的逻辑是徒劳的”的文章。文章涉及两位精神医学专家，他们就所谓“尚贝里投毒者”提出了意见：这是一名护士，她在自己工作的养老院杀死了几名老人，因为，按她所说，她想“为他们做好事”。报纸所报道的事件细节，以及“投毒者”的人格细节，在这里并不重要。我们更应考察《世界报》所报道的专家意见，因为它们代表了人们通常思考越入行动的方式。

据我们所读到的报道，这位女性虽然承认了事实，却似乎“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然而，这是否就是应当向被告提出的问题？科学可以尝试澄清“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这个问题，却不去追问“这件事为什么发生？”设想一下，有人突然问你，你为什么作出了某项重要决定——比如生一个孩子。你能回答吗？就我而言，尽管我曾探寻过对类似问题的成千上万个回答，却不得不承认：它们全都像街头艺人吹向空中的无数泡泡一样消失了。因此，我发现自己无法作答，即使经过了多年的分析……或者不如说，正因为经过了多年的分析。

这些专家用什么措辞谈论被告？他们使用一套自有的词汇，全然不顾所听到话语的字面形式；这些话语仅仅被用来指向意义，而这些意义被认为可以被接收，毫无损失，也毫不变形。这种转置被认为顾及了所读到或听到的东西。他们把“投毒者”描述为一种“脆弱”“不成熟”“分裂”的人格，具有“受损的判断力”，“依赖于一位过度保护的母亲”；他们说，这种人格在母亲去世后“崩溃”了；他们使用“否认”这个词；他们把越入行动看成“冲动性的释放”。曾到庭旁听的《世界报》记者亨利·塞凯尔写道：

> 这概括了这样的一天：行话和若干深奥难懂的解释，常常让听众陷入深深的困惑。在这些陪审员（以及法官、民事当事人和记者）中，有多少人曾经听说过“依靠性关系”“内摄”或“破坏性”这样的概念？这一切完全不清楚，也没有提供任何答案。

这与弗洛伊德的话语形成了极其悬殊的对照；所谓“有识之士”能够听懂和读懂弗洛伊德。最后，这些专家声称自己无法“为越入行动提供一种清晰的逻辑”，从而把自己从亲自陷入的泥潭中救了出来。然而，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使用这些行话？人们越不知道自己在这样做，就越会满口行话吗？

在这里，如同在若干精神分析出版物中一样，有一种特殊的知识使用方式；而在其他领域，这种方式已被有理由地抛弃了。比如，“神话”这个概念是在近来出现的，它并不对应古希腊人所说的“mûthos”，反而歪曲了它的含义。“logos”也一样；人们还把它与 mûtho 人为地对立起来，相信两者本来就是对立的。多年以来，已经兴起了一整股运动，它认识到：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将某些范畴投射到了他们所研究的文本（梵语、希腊语等等）上，而文本本身并没有与

这些范畴相当的东西。我们摆脱了一种思想殖民主义，这是一项可喜而富有成果的事业；约翰·温克勒、爱德华·萨义德、马塞尔·德蒂安，以及较近的克洛德·卡拉姆、菲利普·德斯科拉、桑德拉·伯林格和米歇尔·昂戈[注1]，都对此有所贡献。（这份名单是随意列出的，并无穷尽之意。）然而，大多数精神分析家似乎并未投入这项事业。

> [注1] 米歇尔·昂戈的书《印度诸神话》（Les Mythes des Indes）（巴黎，瑟伊出版社，2019）的导言，为上文匆匆勾勒的问题提供了宽广得多的视角。

五个月后（2017年10月20日），《世界报》给一篇对哲学家与精神分析家的访谈加上了标题："有一种新的恨之享乐"（"Il y a une jouissance nouvelle de la haine"）。"新的"，是相对于先前的哪一种或哪几种享乐？"新的"，又是什么意思？这个有冲击力的标题，立即使人震惊——也使人困惑。问题："您是否在患者身上见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恨的出现？"回答丝毫不容怀疑："完全如此。有一种新的恨之享乐，这成了问题，因为它以某种方式使越入行动正当化。"[注2]再往下，无论谁越入行动，都会倾覆到"恶的一边，破坏的一边"。受访者接着说："在这类转变中，被消灭的是主体性。"竟然如此！去向那些摧毁双子塔的人说说看吧（我们还会谈到这一点）。主体不再存在，但仍有善的一边和恶的一边。这是一种精神分析的思考方式吗？越入行动能够被安置在几百年来所谓"恶"或"魔鬼"的领域中吗？越入行动便是恶。

> [注2] 许多东西取决于"以某种方式"这几个字；《世界报》的读者很少会注意到它，其他读者则会等待更加精确的说明。

下面这件事使我确认了这一点。2001年6月9日，维也纳举办了雅克·拉康专题研讨会（当年他应满100岁），选定的主题是越入行动。我给自己的报告起了标题："命名不当的越入行动"（Le mal nommé passage

à l'acte）。我的德语译者读成了什么？他没有察觉，便在“le mal”和“nommé”之间添入了——甚至可以说幻觉出了——一个逗号，于是把我的报告宣布为“Le mal, nommé passage à l'acte”（“恶，名为越入行动”）；而我所要指出的，是“越入行动”这个命名并不适合它的对象（理由将在下文说明）。这位译者只是承接了人们对越入行动最常见的想法，所以我实在无法因此责怪他。

按照《世界报》所咨询的那位越入行动专家的说法，善能够抵消这种恶。她接着说：“必须在语言这一边编织某种东西”，“它将使行动能够被悬置，使充满恨意的冲动受到压抑”。从她赋予编织和语言的那种力量中，可以看出她的解决办法是“拉康派”的。恨被认为会摧毁话语。仿佛并不存在恨的话语（安德烈·纪德：“家庭，我恨你们！紧闭的家宅，紧闭的门户；对幸福妒意重重的占有”），人们应当通过说话把恨重新纳入语言之中，这将使语言“彰显自身的权利”——那么，语言本身也有权利吗？这些说法离越入行动有十万八千里；如果它们并不传递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越入行动观念，我是不会对它们感兴趣的。究竟是哪一种观念？

“越入行动”这个表达本身，不合宜地放大了这一观念。“越入”暗示：以某种形式，某个断言已经存在于某人那里，仿佛在四乘一百米接力赛中由手传到手的接力棒；这个人没有把它带入话语，而是把它带入行动。因此，这一行动原本可以不被实施。

拉康最初重新考察“年轻的同性恋女性”的病例〔弗洛伊德的病例，“一例女性同性恋的心理成因”〕时，提出的就是这种越入行动观念。niederkommen 的双关（既指“坠落”，又指“分娩”）起初让拉康对越入行动的构想狠狠地受了捉弄。在1956—1957年，这个能指双关促使拉康

把她翻过一道墙、沿着铁路路堑的一侧跳到铁轨上的举动描述为一种“象征性行动”：这位年轻女性让自己坠落，被认为是在表现她想生下父亲的孩子的欲望。延续拉康已经开启的一个运动，我彻底击破了这一部分公然错误的版本。弗洛伊德早已给玛格丽特・琼卡（Margarethe Csonka）[注3]提供了许多理由，让她嘲笑和鄙视他。[注]

> [注3] 参见伊内斯・里德尔、迪亚娜・福格特，《西多妮・齐拉格：弗洛伊德的女同性恋病例，世纪中的女同性恋者》（Sidonie Csillag, Homosexuelle chez Freud, lesbienne dans le siècle），托马・金德勒译自德文（巴黎，Epel，2003）。这部著作出版时，决定不公开 Magarethe Csonka 的姓名。

> [注] niederkommen 在本段同时牵连“向下坠落”与“分娩”，中文两个词不能重现同一能指的双关。by her father 指孩子的父系来源是她的父亲，分娩者仍是这位年轻女性；正文是在转述拉康当时的解释，阿卢什随后对它提出批评。原注3中的 Magarethe Csonka 与正文 Margarethe Csonka 拼写不一致；中文均译“玛格丽特・琼卡”，保留原注拼写供核对。

这一版本后来更加受到接受，因为弗洛伊德指出：一种属于语言秩序的要素，无法在言语中出现（被“修通”），却能够在他当时所称的 agieren 中表现出来。在1914年发表的“记忆、重复与修通”中，他写道：

> 分析者不记得他所遗忘和压抑的任何东西，而是**行动**（agiere）。他不是把它作为记忆而再现（reproduziert），恰恰相反，是把它作为行动（**Tat**）而再现；他重复它，而当然不知道自己在重复它。[注4]

> [注4] 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技术》（La Technique psychanalytique），安娜・贝尔曼译自德文（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3；2002年再版，第108页）（下划线为弗洛伊德所加）。

这里确实存在这两个层面（记忆的层面和行动的层面）之间的差异；维特根斯坦如此清楚地揭示了这种差异（对他而言，是说与做之间的差异）。然而，弗洛伊德的术语并不是“越入行动”，而是 agieren，英译为“acting-out”，而拉康又将其看作“野蛮的转移”，或“没有分析的转移”。行动展示（acting-out）与转移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个特征规定了两者：行动展示旨在成为一种诉诸解释的展示。[注5]如果某种文本（主体并不记得的文本）没有进入行动展示的场景，解释便无从可能。在《对象关系》研讨班（1956—1957）中如此讨论越入行动之后，拉康把这位年轻同性恋女性的越入行动构想为有别于“象征性行动”的东西。[注6]再后来，当他提出精神分析行动时（在其1967—1968年中断的研讨班中），他使行动与象征之物不可通约。不同于弗洛伊德所描述的（agieren），越入行动根本不是一种越入，而是一个僵局的可触知的表现，以及解决这个僵局的尝试。

> [注5] 研讨班《焦虑》（L’Angoisse），1963年1月23日课次；在该课次中，拉康用他自己的术语“montrage”，强化了“monstration”（展示）。

> [注6] 我在《她的狗的影子：精神分析话语，女同性恋话语》（Ombre de son chien. Discours psychanalytique, discours lesbian）（巴黎，Epel，2004）中讨论了这一点。

淹没、拆散与谴责越入行动

2013年，国际期刊《拉康临床》（La Clinique lacanienne）[注7]围绕“越入行动”（Passer à l’acte）这一选定主题编成了一辑文章（11篇）。读过这115页后，引人注意的是：除了一处没有展开的提及外，拉康所研究的那些越入行动，完全没有成为任何评述的对象：没有帕潘姐妹的，没有玛格丽特·安齐厄的，也没有所谓“年轻的同性恋女性”的。至于其他在精神医学中广为人知、受到讨论的越入行动，同样全无涉

及。当人读到封底提出的问题“如何管理患者的越入行动？”时，便开始瞥见导致这一僵局的动机之一。这里，拉康派精神分析家成了管理者，而被拉康称作分析者[注8]的人，又被赋予了从前作为患者的地位。于是人们会想：除了拉康所处的时代尚无人“管理自己的关系”这一点，雅克·拉康是否也应对那些声称来自他、却一边说着拉康式语言、一边背离他的东西，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

[注7] 《拉康临床》（La Clinique lacanienne），第23期，图卢兹，Érès。除主编和副主编外，这本期刊还有法国编辑委员会、阅读委员会和科学委员会，各委员会总共约60人（来自若干国家）。由此可以推断，《拉康临床》代表了我们可以称为雅克·拉康在一些人（虽不是所有人）心中之存在的当前状态。因此，我认为不能忽略这一期关于越入行动的专辑。

[注8] 分析者一词在拉康那里意味着一个主动的主体（$），而不是一个被动的患者。（编者注。）

“管理”：这里首先所指的是“避免”，因为在本章开头针对专家话语所指出的忧虑，在这里仍然占主导地位。这里也有这样的观念：通过说话，就有可能让“患者”——为了他自己更大的好处——不去越入行动（例如，第79、86和89页[注9]，以及第109[注10]、111、114和116页[注11]）。此外，这里还存在一种与此观念相连的想法：某种东西改变了层面，“越入”了行动，而它本不应该如此（例如，第51页）。

[注9] 这位作者毫不犹豫地提到了“一位来自过去好时光的老派神经症者”，同他“工作起来非常愉快”（第84页）。另一位撰稿人也毫不犹豫地说（第105页），到了越入行动时，“主体却仍然陷在施虐受虐的曲折路径之中”。当同一文本谈到的是“带着其全部悲惨现实的同性恋调情”时，这一陈述还能获得任何可信性吗？

[注10] 我们读到：“这是对‘越入行动’的精神分析定义；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它就是‘不记忆而行动’。”作者大概曾怀疑自己在写什么愚蠢的东西，因为他给越入行动加上了引号。事实上，弗洛伊德从未写过这句话。你在他的著作中根本找不到任何

> 提及“越入行动”这个概念的地方。他的 agieren，与“修通”相对，早已无数次被确认为“行动展示（acting-out）”。（如我们将看到的，拉康派圈子以外的人也持有这一错误。）

> [注11] 这里毫无论证地陈述了“是幻想越入行动”这一想法——而这在拉康那里是毫无意义的。

在这辑文章中，那些已被区分出来并被规定为越入行动的特定事件之所以缺席，并非简单的疏忽。各位撰稿人的评论服务于一种意图；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这一意图，但它可以被表述如下：把越入行动这条被视作毒物（“poison”）的鱼淹没（noyer le poisson）。〔英译者注：谚语 noyer le poisson 的意思类似于回避问题，或绕开问题。〕然而，要淹死一条鱼并不那么容易。列出大量能够证明这种淹没的引文实在太容易，所以我们宁愿只举三处。说“越入行动的概念”就是《分析行动》（L’Acte analytique）研讨班的标题（第35页），造成了混淆。[注12]把越入行动与说话行动混在一起（第111页），形成“越入普通的说话行动”这一表述，也造成了混淆。普通的？谁不知道，一个人开始说话时，其中根本没有什么普通的东西？[注13]这位同一撰稿人认为性行为中存在一次越入行动（第115页），并在同一页明确宣告越入行动的特殊性消失了：“如我们所见，越入行动因此具有一个极为广大的延伸领域。”

> [注12] 在同一篇文章中，我们读到（第40页），“性关系包含一个洞”；而拉康说过、并重复过上百次的是：构成一个洞的，是他所认识到的性关系之不可书写。

> [注13] 《精神分析家的日常》（L’Ordinaire du psychanalyste），是当时一些反对拉康解散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人为一本期刊选定的名称；他们甚至诉诸法律，试图阻止学派解散，好让它按照历史使之形成的样子继续存在，无疑要持续到永远。

这样把越入行动排空，使两种断言得以出现，甚至得以被提出——而且两者彼此关联：一种宣称，以及一种谴责。可以称为“宣称”的，是对精神分析行动的抬高；它直接来自拉康，却被呈现为一种与此处采用的调子完全不同的调子。“新政”式的拉康派精神分析家，一个表演者、一个冠军，被描述为这样的人：一方面，知道越入行动是什么（第106页，也见第93和96页）；同时，又可能依照“越入行动”这一口号来开展他的工作。他的行动被宣告为既有风险，又有尊严：[注14]他要把“受隐伏而有害的享乐支配的个体，提升到一个主体的维度；这个主体作为重新加工的享乐的行动者，承担全部责任”，并由此从一种虚幻的满足转到另一种满足（第9—10页）。在许诺周日礼拜中歌唱的灿烂明天这件事上，还有谁能做得更好？

> [注14] 这位撰稿人多次谈到精神分析家的尊严（第9、101和105页）。这种自称的尊严，与 dignus est intrare〔值得进入〕形成对照；拉康说，当资格评审团把一名 passant〔通过者〕命名为“学派分析家”时，宣告的就是这个。这样的认可甚至不是直接的：它省去了评审团与候选人的面对面会见，而是经由 passeurs〔传递候选人证言的人〕的证言这条途径（雅克·拉康，1972年10月14日，比利时精神分析学派的课次，见 Pas-tout Lacan，https://ecole-lacanienne.net）。

就分析行动而言，拉康的调子绝不是如此。他曾疑惑：宣布分析的终点对分析者而言是一种“主体性罢黜”，是否会使潜在的分析者逃走？他也没有在分析家一侧相应产生的东西中看见任何尊严：他称之为“去存在”（“désêtre”）。我们再进一步考察他说过的东西吧？他的术语“去慈善”（décharitер）[注15]〔由 déchet 和 charité 组合而来，即废弃物与慈善〕，就是用来规定分析家位置的；这个位置毫无尊严，也没有任何许诺。

> [注15] 在《他性》（L’Autresexe）（巴黎，Epel，2015）的结论中，我呈现了这种“décharitер”（去慈善）可能具有的若干具体体现。

我们刚刚提到的拉康派牧灵话语，一边评论拉康，一边执意不去从事贺拉斯所谓的 labor limae，“缓慢的锉磨工作”[注]。这种倾向，已经可以在“越入行动”这个动词性说法中发现。把“越入行动”构想为一个事件时，幸运的是，它仍未回答以下问题：这里是否有一个行动者介入，它又可能是谁？[注16]但“去越入行动”的说法，却暗示有人在行动，而且（如我们所见），他这样做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某种去存在开始在分析终点栖居于分析家身上，这并不是因为他曾寻求它，更不是因为他曾想要它，或欲求它。[注17]我们只是承认，分析家没有阻碍所发生的事情——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去慈善也一样。去存在和去慈善，都属于所谓中性。在拉康对所谓“伊尔玛的注射”之梦的解释中，可以找到中性的一个精彩例证。[注18]

> [注16] 见下文第二章和第三章。

> [注17] 鉴于随之而来的自我推销，我们不免遗憾，拉康曾提出一种“精神分析家的欲望”。

> [注18] 我在《一字换一字：转录、翻译、音译》（Lettre pour lettre. Transcrire, traduire, translittérer）（图卢兹，Érès，1984，第253—254页）中讨论过这一解释，并借助利希滕贝格的一则格言强调它的要点：“一个人会梦到那么多疯狂的事情，并不令我惊讶；令我惊讶的是，人们相信自己就是做出和想到这一切事情的那个人。”

> [注] 拉丁语 labor limae 指锉磨、推敲之工。英文底本将其释为“the slow work of the lime”；lime 在此有歧义，中文据所保留的拉丁词 limae 译作“锉磨”，不据此增补作者论证。

对精神分析行动的抬高，与越入行动混在一起，并非没有与之相应的另一面。只有把这一行动同它阴暗的反面——精神分析家的“越入性行为”——联系起来，人们才会忙着把这一行动赋予如此奇妙的尊严。[注19]前者受到颂扬的程度，正是后者受到谴责的程度；前者越受到推崇，后者便越受到严厉声讨。我们等待着“越界”这个词，而它果然出

现了:“越界的越入性行为”（第92页）。道德及其善恶二分虽不声张，却同样在场，并在这里强势地公开登场。那么，被越过的是什么法则？我们知道，在西方，一个居于权力位置的人，同一个服从这种权力、并已接受其示好的人发生性行为[注20]，总是受到更加严厉的谴责。近来（2018年），一所北美大学分发了一份备忘录，明确要求讲师不得同他或她所教授的任何人胡搞（这类备忘录里很可能不会出现这个词）。人们可能会想：这只是一次提醒。是的，但这是否意味着，从今往后，校园里任何随意的性关系都遭到禁止，即使其中一方并不属于行政部门所设想的潜在诱惑者所在的系？人们谴责越界的精神分析家时，想到的是这种社会法则的秩序吗？极有可能如此。至于拉康所说的是否也是这同一法则，以便把它同欲望联系得更加紧密——这是有理由怀疑的……

> [注19] 那么，难道存在无性的越入行动吗？

> [注20] 我们是否希望把情欲从同权力的一切关系中移除（金钱、名望、美貌、社会地位、性等等的权力）？那就还需要许多其他规章。

然而，这个社会法则在这里被赋予了具体规定。我们读到，精神分析家是“分析设置的守护者”（第92页）：作为守护者，他或她必须“保持航向”，而其倾听必须服务于使分析者去情欲化（第96页）。我们读到：“当分析家的欲望不再履行其作为享乐屏障的功能时，就出现了对分析规程的偏离”（第93页）。守护者、分析设置、航向、屏障、规程：这些都是投入战争的小兵[注21]，对抗着一种被构想为可能发生、又被尽可能戏剧化地看待的情欲配置。我们等待着“创伤”这个词，而它果然在第93页出现了。这类话语如此可预料，如此便利，又如此顺

应现代社会对“卫生专业人员”[注22]的要求，因而如此循规蹈矩，以致在这里援引它并无别的意义，只是让我们能够指出它所传递的那些糟糕的“技术”指示，以及它赖以成立的同样虚妄的理论基础。

> [注21] 在第92页，作者提到了“治疗的敌人”。

> [注22] 他们难道不如说是疾病专业人员吗?

一个技术问题：如果一位分析家坚持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分析设置”，他将无法开展实践。理由是，分析中的许多转折点，不是在分析设置内部上演的，而是在跨越分析设置所谓边界时上演的。有时，让边界保持浮动，能够使分析者到那里去寻找分析家，质询他在转移中的位置。我们对弗洛伊德、费伦齐、拉康[注23]以及许多其他人的实践所知的东西，提供了许多生动的见证。我说“所谓”边界，是因为拉康在分析实践中实行的变革（除去最广为人知的所谓“短”时段会谈）之一，是分析家与未来的分析者之间没有任何契约；这种契约据说能够一劳永逸地界定分析的设置。完全可以确定费用、会谈次数与时间，而无须任何最初由分析家与分析者共同签署、从此双方在一切情境中都必须遵守的契约。契约与最初决定极其暂时且脆弱的性质相违背；这些决定随后可以修改，而不构成对某项“契约”的违反。只有经过律师、民事登记官，乃至一个歹徒确认的东西，才是契约。

> [注23] 关于拉康，请参见我的著作：让·阿卢什，《拉康即兴：让·阿卢什辑录的543则妙语》（Les impromptus de Lacan. 543 bons mots recueillis par Jean Allouch）（巴黎，Mille et une Nuits，2009）。

一个理论问题：什么会使上述契约对精神分析家而言有用、有价值、甚至必要？这种契约会保证什么？首先，作为“分析设置的守护者”，他自己便不能走出它；然而，作为守护者，他又像一名监狱看守，既在内部，又在外部。只有当分析者与分析家构成一对——“分析家- 分

析者之对”（第96页）——时，这种离开的危险（也就是因此被格外突出的一种危险：越界的越入性行为）才显得巨大。一对人，加上一份契约……那么，他们即使没有结婚，也至少成了民事伴侣。这里援引的是被认为构成“两种欲望的相遇”（第100页）的一对。谁曾见过这样的东西？谁曾见过（同一页）“两个主人公，他们的能指交会可能引发灾祸”？

总的来说，这种道德以相信性关系存在为起点（“分析家- 分析者之对”中的连字符清楚地标示了这一点）。摆脱这一信念后，分析家可以不再需要这种道德；而这种道德此刻显现为针对性关系之不存在所设置的一道防御。

如果读过所有这些“拉康派”的胡言乱语之后，你没有屈服于自杀的冲动，便可以重新拾起在导言中略见的线索，回到严肃的事情上：那是在圣战行动中呈现出来的史诗性跃迁，而这些行动被过于仓促地命名为“越入行动”。看来，圣战行动反而是一种史诗性跃迁（本斯拉马[注24]）；而且，这种行动和越入行动一样，只有被置于两次死亡之间的空间〔entre-deux　也指间隔〕，才能得到分析。[注25]把所谓“灵性”看

成一种脱离身体整个维度，或更确切地说，脱离肉身的理想性，是错误的。[注26]我们就说到这里，但并不否认圣战主义还有其他维度；它们不在我应当讨论的范围内，此外，我也没有阐述它们的能力。

> [注24] 费蒂·本斯拉马是一位突尼斯精神分析家。更多信息见https://fr.wikipedia.org/wiki/Fethi_Benslama。

> [注25] 我近来在《拉康的场景及其魔法圈：疯人起而反抗》（La Scène lacanienne et son cercle magique. Des fous se soulèvent）（巴黎，Epel，2017）的第二章中对此作了讨论。

> [注26] 是否应当回想起基督的血；成为废弃物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者；从阿兹特克金字塔上抛下的身体；拒绝欲望的佛教僧人；在神庙中饮用湿婆之乳的印度教徒；等等？

约旦河西岸

下面是阿莫斯·吉泰的纪录片《约旦河西岸》（West of the Jordan River）中的一段简短而清晰的场景。阿莫斯·吉泰和一个孩子坐在希伯伦的一条长凳上，平静地交谈——那里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最紧张的地点之一。我们并不确知孩子几岁：也许十岁？或者十二岁？他叫阿里，我们得知他在上学，学习很好。两人的交谈由一名叫穆萨的译者居间传达，因为阿里不说英语，而阿莫斯·吉泰正是用英语对他说话的。

阿莫斯·吉泰：穆萨，问问阿里，他对希伯伦有什么梦想。

穆萨：你的梦想，你在生活中的愿望是什么？

阿里（微笑着，直视阿莫斯）：我的梦想是作为殉道者死去。

阿莫斯（他一定听懂了所说的某些内容）：哇……

穆萨：他笑着说，他的目标是成为殉道者。

阿莫斯：真的？他想死？（这个问题没有问到点上，立即被纠正了。）

穆萨：他想成为殉道者，而不只是死去。

阿莫斯：为什么？

（有人走过，阿里礼貌地向他打招呼。）

阿里：因为。

阿莫斯：可如果你死了，就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穆萨（阿里仍然微笑着）：他说，那样更好。

阿莫斯：可你只能死一次。（这句话忽略了第二次死亡。）

阿里：那又怎样？

阿莫斯：（调整自己的问题）你对死后有什么期待？

穆萨：他说，他会在上帝身旁。

阿莫斯：你会对上帝说什么？

穆萨（阿里认真起来，不再微笑）：他会说，我作为殉道者死去了。

阿莫斯：那他希望上帝对他说什么？

穆萨：说他做得好。

根据我们所听到的，能够断定阿里是一个正在养成中的恐怖分子吗？已经是一个恐怖分子了吗？他把自己的一生视作献身于散播恐怖吗？提出这个问题，让我们得以瞥见答案。那些进行其圣战（jihad）的人，只有被恐怖击中的人，才把他们叫作“恐怖分子”。他们虽使人恐惧，却把自己的一生、往往杀人的行为、自己的死亡与永恒，献给了别的东西，献给了我们听阿里说出的东西：上帝应当告诉他们，他们做得好。使人恐惧，并不是决定性地引导他们一生的东西。

1962年，雷蒙·阿隆如此定义恐怖主义行动：“一种暴力行动，当其心理效应与其纯粹物质结果不成比例时，便被称为恐怖主义行动。”[注27]根据一个事件的效应来定义它，并非不合适——但仍然只是部分的定义。今天在法国，每当我们说“恐怖分子”而不说“圣战者”时，我们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若把圣战的灵性维度考虑在内，就应当选择后一个词。出于恐惧，以及一种排斥灵性的政治倾向，一旦我们遭到攻击、伤害、杀害，西方对“恐怖分子”这个术语的使用，便忽略了所需的分析。把敌人命名错了，就会危及对所发生之事的认识，乃至危及所期待的战斗结果。法国在官方说法中不把阿尔及利亚的情况称为“战争”，而称为“事件”时，就发生了这种事。[注28]费蒂·本斯拉马多次指出过这种视角上的错误。[注29]jihad 的词根 j-h-d 意为“努力”，指的是追求道德完善的信徒。不再使用“恐怖分子”这个名称，不应令人惊讶。这一问题的专家之一，马克·塞奇曼[注30]，说他不喜欢

这个术语：维希政权曾用它来指那些自称“抵抗者”的人（而他们仍然保有这个称号：历史再一次是胜利者的历史）。塞奇曼明确指出，他们是 mujahidin，是士兵：他们在作战，他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恐怖分子”这个称谓虽包含它的那一部分真理，却很可能正落入巴勒斯坦裔美国作家爱德华·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评之中：其知识是被建构出来的；它发明他者，实际上忽视并否认他者。[注31]针对日本人的 kamikaze 一词[注32]，也可以作同样的评论。[注]

[注27] 雷蒙·阿隆，《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Paix et guerre entre nations）（巴黎，Calman-Lévy，1962，第176页）。这条参照来自后文提及的纪尧姆·莫诺著作中的一段。

[注28] 法国于1999年10月18日正式采用“阿尔及利亚战争”这一名称，在敌对行动结束27年之后。

[注29] 费蒂·本斯拉马，《狂烈的牺牲欲望：超穆斯林》（Un furieux désir de sacrifice, le surmusulman）（巴黎，瑟伊出版社，2016）。米里亚姆·本拉德指出，“圣战”的军事化，部分来自欧洲东方主义，随后在20世纪初被政治宗教整合主义接纳。圣战者曾在阿富汗同苏联人作战。这场冲突是本·拉登于1998年宣告“全球圣

> 战”的起源（米里亚姆·本拉德，《圣战：从宗教起源到意识形态》（Jihad: des origins religieuses à l’idéologie），巴黎，Le Cavalier bleu，2017；以及《解放报》，2018年2月1日）。

> [注30] 听于法国文化电台（La matinale），2017年11月10日。

> [注31] 爱德华·萨义德，《西方创造的东方主义》（L’Orientalisme créé par l’Occident）（巴黎，瑟伊出版社，1980）。另见维克多·雨果“Lui”〔“他”〕，一首关于拿破仑荣耀的诗：“Sublime, il apparut aux tribus éblouies / Tel un Mahomet d’Occident”〔按底本所附英译：崇高的他，出现在眩目的部族面前 / 仿佛一个东方的穆罕默德〕。

> [注32] kamikaze 的字面含义是“神风”；这个词起源于13世纪的日本，当时忽必烈率领的蒙古入侵舰队被台风摧毁。（编者注。）

> [注] 原注28的“27年”按英文底本保留，不改作另一数字。原注31所引法文 d’Occident 意为“西方的”，而底本所附英译为 of the East（“东方的”）；中文原注保留这一英译关系，在此注明其与法文的方向不一致。

就“恐怖分子”这个术语而言，情况也许正在改变。《世界报》的一篇文章（2017年10月13日）引述了罗歇-波尔·德鲁瓦的一句话；他在文章中讨论雅各布·罗戈津斯基的著作《圣战主义》（Djihadisme）[注33]：“那种妨碍人们觉察恐怖主义宗教维度的盲目性，已逐渐让位于对这一维度的承认。”这使我们看见了一个迹象。然而，我们仍然持怀疑态度，因为仅仅几行之后，作者便仍坚持把恐怖和恐怖主义本身当作未来研究的对象。

> [注33] 雅各布·罗戈津斯基，《圣战主义：牺牲的回归》（Djihadisme: le retour du sacrifice）（巴黎，Desclée De Brouwer，2017）。

就在不久前（2018年4月5日），《解放报》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一部著作；它反对一部分社会学的“盲目性”，这些社会学试图借助“恐怖分子”所遭受的歧视与排斥，来解释他们的“激进主义”，认为这些东西导致他们激进化。这个术语〔在法语中〕具有种族主义的含意。我们在其

中听到了“rat”〔底本标示法语发音为 /rʌ/〕这个词；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常用它，把阿拉伯人看成“老鼠”，而警察和军队对他们施加的暴行则被称为“ratonnade”〔英译常作“种族主义袭击”〕。《激进的诱惑》（La Tentation radicale）[注34]表明，导致某些人投入圣战主义的最重要因素，既不是经济因素，也不是社会因素，而是宗教因素。这一点得到了一位曾任摩萨德局长14年的人的证实；他无疑是了解这一情况的人。2018年4月22日，《世界报》发表了一篇访谈，其中，埃弗拉伊姆·哈勒维（当时84岁）宣称：“阿拉伯世界存在着一种非常强烈的宗教投入。”他接着说：

[注34] 安娜·穆克塞尔与奥利维耶·加朗，《激进的诱惑》（La Tentation radicale）（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18）。

> 哈马斯的领导人——我很不愿承认这一点——对以色列发生的事情，了解得比我们对他们的了解更深；他们的领导人在我们的监狱中待过多年：他们研究过我们，学会了我们的语言。我们宣称不与杀人的恐怖分子对话，这使我们成了自身宣传的受害者。他们也是会思考的人。[注35]

[注35] 这里呼应了弗洛伊德于1930年2月26日致 Keren HaYesod 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们的教友们不切实际的狂热，对于阿拉伯人反抗的兴起负有某种责任”（引自埃兰·罗尔尼克，《弗洛伊德在耶路撒冷：面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分析》（Freud à Jérusalem. Psychanalyse face au sionisme），论著，亚伯拉罕·B. 约书亚作序，吉尔·罗齐耶译自希伯来文，巴黎，L’Antilope，2017）。

2001年9月11日——决意让西方明白

我并不是说，所有圣战者都达到了年轻的阿里所展现的高度灵性。[注36]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人类学家，对所有圣战者一无所知。另一方面，我在档案中保留了《世界报》的一页（2002年10月2日），题为“Le dernier soir avant le 11 Septembre”〔“九一一之前的最后一夜”〕。在这里，某种特定的灵性同样存在，噢，存在得如此鲜明。《世界报》取得了联邦调查局的许可，得以翻译并发表这些文件。[注37]

[注36] 人们可能会反对说，阿里非但没有证明任何东西，反而是被操纵了，被身边的激进分子、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乃至电子游戏所影响。因此，他说出的话并不是他自己的。这一反对意见站不住脚，因为它自身也可以被归入它所陈述的情形，于是自我摧毁了。

[注37] 这是从阿拉伯语译成英语，再译为法语的翻译。



四页密集而有条理的手写文字。

图1.1　在穆罕默德·阿塔的行李、五角大楼的废墟，以及一辆遗弃在机场停车场的汽车中发现的文件副本。

联邦调查局并不需要费多少力气就能找到这篇文本。三份副本就出现在上面明确列出的地点。一种签名。西方由此被点醒了。

《世界报》把这四页描述为“越入行动前的一组宗教与实践指示”，并选取了其中一段，放进方框以示强调：要“恐吓那些不信者的心”。被针对的是不信者，针对的是他的心，而不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年轻的西方狂欢者、某个国家的政治，或其他无论什么人们可能加进去、却只能处于次要位置的东西。

行动的准备姿态已经属于行动本身，它们具有极强的灵性：照料身体（剃毛、清洁）；祝福身体——“为此，他们对着某人的双手诵读经文，然后在他们想要祝福的人上方搓动双手”；诵读神圣的《古兰经》；清晨共同祈祷；净化灵魂；忘却尘世生活；记诵有关神圣意志的句子；离开之前立即净身；前往机场途中以及抵达机场之后的祈求——“主啊，我向你求取这地方最好的东西，并求你护我免受它的恶”；应当说出、因而是“强加的”话语，但并不完全是在拉康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上，比如“上帝是我们所缺少的一切”，“除上帝外别无上帝”；记起只有上帝值得畏惧，而这种畏惧是一种“无比的崇拜”（这里为所谓“恐怖症”的症状投下了一道可贵的光）；登机时、以及随后坐上飞行员座位时，再次祈求；求上帝赐予殉道；撞击的一刻高喊“Allah Akbar”；而且，更奇怪、在西方人眼里也更加突兀的是，记起“如果你杀人，不要使被你杀的人遭受任何痛苦〔着重为我所加[注38]〕，因为这是先知的惯行之一”；摒弃一切复仇意愿，换句话说，确保行动只为上帝而作。所举的例子是阿里·本·塔利卜，先知穆罕默德的同伴和近亲：他在同不信者战斗时被对方吐了一口唾沫，却没有以击打作为回报，而是等战斗结束时再杀死对方；他始终处于战斗之中，拒绝对侮辱作出反应。最后，完整引用这一句：“这是美的〔着重为我所加[注39]〕，一个人诵读上帝的这些话：‘那些宁愿选择这个世界之后的生活

的人，必须为上帝之爱而战。’”此外，还有这些话，谈的是那些寻求圣战战争的人（如果只想到“恐怖主义”，就无法理解）：“不要以为那些为上帝之爱而杀人的人已经死了；他们活着……”

> [注38] 在《善心女神》（Les Bienvienveillantes）中，乔纳森·利特尔讲述道，那些以施加痛苦或杀人为乐的人，会被党卫军清除（巴黎，Le Grand Livre du Mois，2006）。

> [注39] 请参见拉康在《精神分析的伦理》（L’É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研讨班中所呈现的美的功能（见 Pas-tout Lacan，https://ecole-lacanienne.net）。

因此，问题不在于杀死身体，而在于必须攻击不信者的心，即使他们的心已停止跳动。所以，除了在两次死亡之间的空间，我们看不出能把那些永受祝福的心安置在哪里；这个空间的一侧，可能就是永恒死亡的一侧。我们难道不该请穆斯林神学家为惊惶的心灵阐明这个问题吗？

然而，这种盲目性有时也会让位于几个可能明晰的短暂时刻。2019年2月26日，《世界报》用了两页刊载一位来自萨赫勒的圣战者阿尔-穆拉比通（Al-Mourbitoune）的话，并把它介绍为“一份罕见而完整的证言”。他最初投身伊斯兰，完全不是因为圣战。他离开“努瓦克肖特贫瘠的沙地”，是因为那里可能有“酒和不健康的话语”。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使他向上帝发问：是他命令这么做的吗？随后便是他的投入，可以概括在以下宣告中；他仍是他当初成为的那个圣战者：“我绝不后悔自己的行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

纪尧姆·莫诺在他的书《狱中圣战者的言语》（En prison, les paroles de djihadistes）[注40]中，用一章讨论“伊斯兰国”（ISIS）所据为己有的神学思想；这种思想围绕污秽及其反面——纯洁——展开。作为监狱

精神科医生，莫诺同许多圣战者谈过话；其中一些希望定期见他，持续了几个月。他恢复了自己职业的荣誉；如我们所见，这个职业曾遭到他某些同事的不当处置。他拒绝沿着那条常见的滑坡走下去，不接受“恐怖分子”同任何西方人都毫无共同之处的说法；相反，他尽可能地努力打破这种隔离，从而把人性还给圣战者——却并不因此使他们杀人的行为正当化。作为精神科医生，他不断舍弃那些其职业可能提供给他的参照，因为他认为它们并不合适。变态不能解释越入行动（第95页）；拥抱死亡并不以杀人的快乐为基础，也不是“一个未经教化的野蛮人，只是为了变态的兴奋而爱死亡”的特征（第134—135页）；“对死亡的脱敏不是变态运作的症状”（第146页）；而且，“对暴力的迷恋不一定是一种病理性表现”（第139页）。

> [注40] 纪尧姆·莫诺，《狱中圣战者的言语》（En prison, les paroles de djihadistes）（巴黎，伽利玛出版社，2018）。

莫诺避开了包括精神医学知识在内的种种知识向他设置的陷阱，从而给自己以采用其他参照的自由。这些参照使圣战者成为我们每个人的邻人，虽不是亲近的邻人。基督教难道从未进行过灵性十字军征战，甚至今天也没有吗（第29页）？希望属于一个信徒共同体，甚至居住在尘世的一座上帝之城，难道那么奇怪吗（第31—32页）？莫诺一面承认这种共同体的“原教旨主义”性质，一面把它比作在同一时期诞生的美国原教旨主义（第87页）。他指出，不愿区分道德、宗教、法律与政治，这呼应了比利·格雷厄姆和杰里·福尔韦尔所坚持的立场（我们知道，他们取得了成功）（第123页），并让人记起美国在1956年把“我们信赖上帝”（In God We Trust）定为官方格言（第88页）。对于向作为殉道者死去的人许诺他会在天堂得到70名（或72名）处女一

事，莫诺没有将其轻易解释为“一个不成熟少年的性幻想”（第137页）。他指出，这是对“一种纯洁的性”的许诺，正如使用面纱为性行为带来的那种纯洁一样（第111页）。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我蔑视构成我并向你说话的尘土”：圣茹斯特的这些话（引于第91页），与圣战者的话一样；莫诺还把圣战者比作安提戈涅，那个“最能体现圣战主义中所押上的东西的人物”（第106页），因为她不放弃神圣法则中的任何东西。正如我们所说，这种知晓促使我们把圣战行动定位为史诗性跃迁，而不是越入行动。在莫诺的这些篇页中，“史诗”和“传奇”这两个术语多次出现；因此，他与本斯拉马的临床发现相遇了，尽管就所谓“去激进化”而言，他显然不同意后者（第163页）。

虽然书中提到普罗提诺为“伊斯兰国”的神学思想提供的支持（第70页），但其他一些较近的参照也很说明问题。于是，他指出：那些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反对巴沙尔·阿萨德的战斗的人，其“入门”旅程的描述，也可以在《星球大战》、《指环王》或《哈利·波特》这样著名的传奇中找到（第103页）。还可以参照菲利普·罗斯的《美国牧歌》：西摩·利沃夫的女儿引爆炸弹，杀死四人，随后一头投入耆那教（梵语 jina 意为“胜利的”）。这个故事的核心叙事，同支配圣战投入的叙事一样。一个圣战者抵达叙利亚后，便被赋予一个新名字；直到今天，基督徒进入修会时也仍然如此。莫诺并没有把这看成某种精神病理层面的现象的表现，而是提醒我们（第110页）：当上帝想同亚伯兰（Abram，Abou Ram 的缩合，意为至高的父亲）确立盟约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从此他被称为亚伯拉罕（Abraham，Abou Raham，意为众人之父、万民之父）。

如我们刚刚所确认的，在把人性重新还给圣战者[注41]之后（“重新还给”当然并不是从圣战者的角度说的，因为他从未失去过人性），莫诺用一段乔治·斯坦纳的引文结束了他的著作（第160页）。对这段话，至少可以说，它提出了一个无人能够回避的问题：因此，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尽管回答或不作回答的方式各不相同：

[注41] “人的”在这里不与“非人的”相对，而是包含后者——本应如此。

> 既无天堂又无地狱，就是发现自己在一个绝对平坦的世界中，被剥夺了一切，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在两者之间，地狱显得更容易重建。我们必须承认，对地狱的描述向来要详尽得多。在我们当下的野蛮状态中（这一论点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之后提出的），有一种已死的神学正在运作，有一系列指向超越的参照；它们在缓慢的死亡中，让位于戏仿的形式，让位于替代物。信仰的终结、宗教信仰转为虚空的惯例，正显示出这是一个比哲学家所预见的更加危险的过程。[注42]

[注42] 乔治·斯坦纳，《在蓝胡子的城堡中》（Dans le château de Barbe-Bleue）（巴黎，伽利玛出版社，“Folio essais”丛书，2008，第67页）。

这里，我们再次“遇见”拉康；对他而言，“欲望是地狱”。哪一种地狱？肯定不是那种人永远在其中焚烧、同时哭求一种确已失去的天堂享乐的地狱。更切合拉康可能想到的，是另一种地狱，安格鲁斯·西莱修斯的地狱，一种“生活在地狱中而没有地狱”[注43]；因为同一种否定神

学进路，同时规定着这位西里西亚人与地狱的联系，以及主体与不存在的大他者的联系。或者，往更平常的层面说，难道是图书馆的地狱？无疑是另一种地狱，位于两个地狱之间。

> [注43]《基路伯朝圣者》（Le Pèlerin chérubinique），双行诗 I，39（由雅克·勒布伦引用），《上帝，一个纯粹的无：安格鲁斯·西莱修斯——诗歌、形而上学与神秘主义》（Dieu un pur rien. Angelus Silesius. Poésie, métaphysique et mystique）（巴黎，瑟伊出版社，2019，第166页）。

第二章　思考，行动：路易·阿尔都塞

DOI：10.4324/9781003504092-3

可是，当我说想做某件事时，

这不像是想去剧院。

如果你困了，并不是你想要

睡觉……你就睡着了。

〔……〕

这是一回事。我并不想杀人：只是

碰巧有某种自然而然的东西

随之发生〔……〕某种到来的东西，

而你控制不了它。

里卡多·梅洛尼奥[注1][注]

[注1] 如同玛格丽特·杜拉斯与玛农交谈那样（见下文第000页），卡洛斯·布斯克德对里卡多·梅洛尼奥作了长时间的访谈；后者犯下四起极为相似的杀人案后，被关进精神病院。由此产生了一本书：《磁化：与里卡多·梅洛尼奥的对话》（Magnetizado. Una conversación con Ricardo Melogno），出版于巴塞罗那

（Anagrama 出版社，2018，尚无法译本）。这类书提供了一种看待疯狂的无比珍贵的视角，尤其是在涉及杀人的情形中，当作家与受访者的关系不带有任何治疗目的时。实际发生的是，作家（杜拉斯、布斯克德）收集到的，是不同于向医务人员说出的那些话。

[注] 原注保留底本中的"第000页"占位，不能据此确定页码。其所指杜拉斯与玛农交谈，见本书第三章。

2018年3月，《来日方长》（L'Avenir dure longtemps）[注2]的舞台版在巴黎上演。我去看了这出戏，这件事在此原本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除了文本本身那些选取得如此恰当的片段——要不是米歇尔·贝尔纳的舞台调度和安杰洛·比松的表演，让我们清楚地感知到一个仅仅读作品时可能漏掉的特点。

[注2]《来日方长》，副题《阿尔都塞的遗嘱》（L'Avenir dure longtemps. Le testament d'Althusser）（巴黎，Maison des Métallos，2018年3月20—25日）。路易·阿尔都塞，《来日方长》（L'Avenir dure longtemps）〔1992〕，奥利维耶·科尔佩与扬·穆利耶-布唐介绍的版本（巴黎，Flammarion，2013）。

这种呈现方式关乎对戏剧空间的一种极为独特的运用：即使没有在实物层面实现，也能让人觉察到。[注3]观众被置于阿尔都塞这个人物的见证者位置，与他面对面（在一种召唤之中），于是成了戏的一部分。他就在这里，这位同胞：观众被移到了舞台上。从此，一旦到了那里，他们又能向哪里报告自己的证词呢？观众席本身是空的——那个位置本应由另一群完全不同的观众占据：路易·阿尔都塞已经绝望于自己能否向他们说话；他们能够就那场让所有人哑口无言的杀人行动作出正当的裁断，而至少最初〔dans un premier temps〕，路易·阿

尔都塞本人就是哑口无言者中的第一个。[注4]这场戏使这一缺席变得可感。没有任何东西会来填补这个洞；一个转喻指示着它：未曾发生的审判。

> [注3] 这可以构成一项再演的提议。

> [注4] 这群〔观众〕曾经〔un temps〕可能以雅克·拉康的形式出现，倘若路易·阿尔都塞选择他作为自己的精神分析家。我们知道，这没有发生，尽管几乎毫无疑问：如果说有人对阿尔都塞而言体现了分析家，那正是雅克·拉康，他的“analyste d'élection”（“选中的分析家”，这是康拉德·斯坦一个非常敏锐的命名；他观察到，一些分析要求避免向某个人提出，尽管这个人仍被提出要求者认作分析家，甚至是卓越的分析家）。我在《路易·阿尔都塞：叙述，躺椅》（Louis Althusser récit divan）（巴黎，Epel，1992）中呈现并讨论过这一特点。

被拉来作见证，被“带进来”：在这个肯定没有人来接受报告的地方，观众受邀报告的是什么呢？人们还要求这些见证者，使标题这句话“来日方长”（L'Avenir dure longtemps）在自身以外的别处产生回响。于是，由于这一特殊装置的作用，戏剧使这句话能够被听见；这一装置与阿尔都塞在杀人之际及其后所陷入的言说情境相契合。这句话与其说是一项陈述，不如说是一声呼喊：一个消失了的人的呼喊。一个人没有死去，却消失了，就被判定要面对一段延续得太久的未来。这个未来从未停止延续——延续并不是时间，时间有时流逝，却不留下任何时间。延续中没有契机（kairos），没有事件。延续夺走了一件无比珍贵的东西：也就是人们可以平常地称作“死去”的东西。延续那不可忍受的坚硬（Intolérable dureté du durer）。

现在，请允许我讲述一段童年记忆。那是1944年，我五岁。军方告知一位年轻的邻居：她的未婚夫，我们那支败军中的一个士兵，已被列为失踪者。多年以来〔des années durant〕，我都能观察到她，每当她

横过马路，就想知道他会不会从左边或右边重新出现。玛丽娜·科斯特始终没有从中恢复过来。她始终既不相信、也不知道她的爱人是否死了……与克尔凯郭尔所要的那种不同的另一种永恒的未婚妻。

这种“不朽”，不是声名给予少数被选中者的那一种——至少一时如此，因为这些名人最终甚至会从网络中消失，于是遭逢等待着每一个人的东西：不仅是身体的死亡，还有第二次死亡。第二次死亡之后，那个曾经活过的人不再留下任何痕迹，任何人的心中也都不再存留对这个人的记忆。印度教知道第二次死亡给予每一个人的那种安宁。一种信仰认为，死后每一个人都要一次又一次地转世，永无止境；这实在令人恐怖。印度教用一个名字，解脱（moksha），来指称那种带来解放的第二次死亡，它终结接连不断、无限期的转世。《圣经》也未忽略第二次死亡：“有份于第一次复活的人是有福的，是圣洁的。第二次死亡对他们没有权柄。”[注5]这个永远延续的未来，这种永恒，剥夺了主体的第二次死亡。在杀人及其后的不起诉之后，阿尔都塞，这个消失了的人，知道自己被判定永远不能死去。消失的人不会死：还有比这更糟的判决吗？[注6]

> [注5] 《启示录》，第二十章，第14节。

> [注6] 这一点，那些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被法国军队投入大海的“失踪者”的家属再清楚不过。当阿根廷的政治体制是独裁政权时，这种新的消失方法随后被传授给阿根廷军队。

由此，让- 克洛德·米尔纳最近用来讨论阿尔都塞的两页文字[注7]便清楚了。米尔纳在其中讨论接连发生的“禁闭”：战俘营、乌尔姆街、疾病、罪行。[注8]米尔纳写道，阿尔都塞以这些禁闭“标出了自己的一生”；进一步说，禁闭“让他逃脱旁观者的诅咒”——仿佛他得为此负责。在这里，阿尔都塞被当作的不是主体，而是这些禁闭的行动者。

（自拉康以来，如今又有阿兰·德·利贝拉的著作，我们已不能再无视这一区分。[注9]）为了逃脱旁观者，阿尔都塞似乎曾以某种方式想要这些被发动并落实的禁闭。[注]我们只保留米尔纳清单上的“罪行”，同时排除任何断言阿尔都塞是其行动者的说法。如果存在一种禁闭——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它只能定位在杀人之后的事情中，杀人立即确立了它（我们将谈到这一点）：也就是他作为消失了的人的地位。

[注7]“文本中心，一次旅行（Au centre du texte, un voyage）”，在路易·阿尔都塞诞辰百年之际（他生于1918年）发表于 IMEC 网站的文字：www.imec.archives.com.fr。

[注8] 这份杂驳的清单把地点、一种状态（委婉地称为“疾病”）以及一个行为聚在一起，精神病院却不在其中。

[注9] 特别参见阿兰·德·利贝拉，《现代主体的发明》（L’Invention du sujet modern）（巴黎，Vrin，2015）。

[注] 此句承接对米尔纳观点的复述和批评；would have 保留推测，which were instigated and put in place 是被动表达，未明确是谁实施这些禁闭。不能据此断言阿卢什自己认定阿尔都塞主动制造了清单中的所有处境。

这封由一位高师生（normalien，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的学生）写给自己昔日老师的告别信，出自一个没有承认对心理学的彻底拒绝的人；这种拒绝在安德烈·纪德和乔治·康吉莱姆那里如此鲜明，而后由许多人延续，包括米歇尔·福柯和雅克·拉康。心理学把主体变成行动者——而不是像拉康那里那样，一项纯粹的假定——因而给主体压上一份严格说来并不应由其承担的责任。然而，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以及仍悬而未决的事情，我们还可以有不同的考虑：在这种悬

置中，毫无保证说有一天，它那无尽的存在能够结束。本文以下部分将着力考虑这一点，试图就阿尔都塞而言，澄清思考与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显现于越入行动及其周围。

精神分析的有益效果如此强烈地被归于“言说”、“解释”、“象征”，以致看来有必要——但并不排除上述效果——呈现雅克·拉康实践的一种活生生的版本，它拨动另一根弦：行动的弦。流传于巴黎弗洛伊德学派成员之间的、有关拉康即兴妙语的传闻，为此作了见证；我曾收集并出版这些妙语。[注10]此处我只拾取其中一则，题为“做梦要紧”（Rêver compte）：

> [注10] 第三版包含543则bons mots〔妙语，机智的评述〕：《拉康即兴录》（Les impromptus de Lacan）（巴黎，Fayard，2009）。

分析者：我梦见……

拉康，打断他：很好。明天见。

若因这次极为简短且无疑价格不菲的会谈而愤愤不平，就忽视了转移的情境；不过，我们可以想象这一情境，它使这种切断和简短成为有根据的。分析者并没有被阻止言说：恰恰相反。他一直把自己的梦倾泻给分析家，假定这就是分析家对他的期待：“这是你想要的，好，那就给你！”几乎以身体的方式阻止他继续下去，等于让他明白：他远非在言说，而是在把鱼淹死（这里的鱼就是分析家）；分析家并非特别喜欢他的梦；分析家也不会被这个要求套进去，而这一要求凭借某种假定的弗洛伊德式默契被付诸行为。[注11]分析者正在表演这一转移，只有一个行动能够既考虑到它，又给他提供以不同方式构成自身的可能性。而且，实际发生的就是如此：分析者欣喜地立刻跑去，笑着向

朋友们讲述自己那次难忘的会谈。若认为这种转移的变动可以通过解释达成，那就错了：既然解释在这里就是问题所在，它便无法提供解决办法。[注]

> [注11] 拉康几乎不觉得自己有义务说明短时会谈的理由。他至少这样做过一次，提到一位以谈论新闻、电影和文学来占据会谈的分析者。

> [注] “把鱼淹死”（drowning the fish）保留底本的形象及“鱼 = 分析家”的置换；该法语习语有搅混问题、回避要点的含义。

如果我们与拉康一道承认以下两点，就将回到这一问题的根源：一方面，分析中的主体就是那个笛卡尔主体，寻求的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确定性；另一方面，他又与笛卡尔主体有所不同，因为笛卡尔所瞄准的是“在〔他的〕行动中看得清楚”[注12]（主人的话语），而在分析中，如同在生活中，思想既可能引导行为，也可能误导行为。此外，自由联想规则打破了那种虚假的权威：有人以“我认为……”或者“确实……”（像戈特洛布·弗雷格那样）作为陈述的开头，便把这种权威授予自己。

> [注12] “我始终极其渴望学会区分真与假，在我的行动中看得清楚，并且有把握地走过此生”（《方法谈》，第一部分）。

行动或解释（更一般地说，思想）：我们将保留这两个层面的区分，以便不仅询问阿尔都塞的杀人行动，而且询问与之密切相连的、随后的行动缺席；此前我们指出，这种缺席立即就已发生。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提供了一个精确的陈述：不应就事件本身作判断，而应依据它的结果。1980年11月16日杀死埃莱娜，就是这样的事件。我不说“杀死他的妻子”，因为这样说就意味着封闭了一个问题：谁被杀了，或者不如说，什么被终结了。在这里，“埃莱娜”没有别的价值，只是系于阿尔都塞的呼喊：“我掐死了埃莱娜！”在这一事件之后，是审判这一非

行动——非行动……我们很快就会被引向从阿尔都塞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杀人没有在另一个行动中产生回弹，而是搁浅了，是船搁浅的那个意思——不是拉康所说任何行动都以失误（d'être manqué）〔错失行为，parapraxis〕为特征的那个意思。

为了澄清在阿尔都塞那里，行为与随后的行动缺席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必要再谈一谈这一点。

于是，我们有了这一公式："或者我不思考，或者我不在"。拉康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加以扩展、拆解，提取了这个公式——直至锻造出一个二择式：所谓"异化之或（alienating vel）"，它同时被规定为"必要的"、"强制的"和"不可避免的"，要求只能在二择式的两个分支中选择一个或另一个。[注13]

> [注13] 有关这个或（vel）的更详细讨论，请参阅本书第三章。

拉康于1957年5月9日在索邦大学作报告时，首次提到这个或（vel）。[注14]在那里，因为说出"我不在之处，我思考；因此，我不思考之处，我在"，他发现自己"一时间遭到〔他〕的听众的突袭"。[注15]然而，这一陈述并不是在那一天之后立即受到质疑的，而是在十年后。[注16]这段延宕（从1957年5月9日到1967年1月11日[注17]）可能还要更长，倘若承认拉康读过他于1936年与亚历山大·科耶夫共同署名的一篇文章的手稿，题为"黑格尔与弗洛伊德：一次解释性对照的尝试（Hegel et Freud. Essai d'une confrontation interpretative）"。[注18]科耶夫提出，笛卡尔式的事实"必然是双重的……既是被揭示的存在，也是进行揭示的存在：它既是存在，也是思想（揭示存在者的存在的思想）"（第204页）。那么，潜伏期便不是十年，而是三十年。中间点（1962年6月27日）应当用一块白〔blanche〕石头来标记，或者更好，

用一块“blanchote”石头（双关：见下文，莫里斯・布朗肖之石）。那一天，拉康在研讨班中谈到《隐晦的托马》（Thomas l’Obscur）。他在布朗肖身上认出一个人：此人通过《死刑判决》（L’Arrêt de mort；底本在此释为“死亡的停止”），向他提供了“对〔他〕在伦理研讨班中整年所说的关于第二次死亡的东西的确认”。[注19]然而，他并未提到这部作品中的一页；在那里，布朗肖让读者注意到“这些甜蜜的话：‘我思，因此我不在。’”[注20][注]

[注14] 雅克・拉康，“无意识中文字的运作（L’instance de la lettre dans l’inconscient）”，巴黎，索邦大学，1957年5月9日。

[注15] 收入雅克・拉康，《文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第517页）。细心的读者完全可以像伊内斯・克雷斯波那样指出：我把逻辑算子“ou, ou”〔“或，或”〕与表示地点 / 时间的副词“où, où”〔“何处，何处”；法语中唯一的差别，是后者的u上有一个重音符〕全都当作相同的东西，以至于人们可能设想，上文先后引用的是两个不同句子的同一项陈述。同音词邀请我们这样做，拉康在接连两期研讨班——《幻想的逻辑》（La Logique du fantasme），1996—1997年，以及《精神分析行动》（L’Acte psychanalytique），1967—1968年——中发明和运用的众多图式的构型，也邀请我们这样做。当位置把一个选择插入一张网络（一个图式的整体）中，

而这张网络规定并排序每个选择的价值与意义时，位置（拓扑学的）与选择（逻辑学的）就无法被彼此独立地设想。两个不同的位置要求“ou bien, ou bien”〔“或者，或者”〕“只能相互排斥。

[注16] 雅克·拉康，《幻想的逻辑》，研讨班，1967年1月11日。

[注17] 1964年5月27日的课次（《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详细呈现了称为“异化之或（vel）”的构型。当时的二择式涉及存在与意义。

[注18] 由胡安·巴勃罗·卢凯利发表于其著作《拉康：从瓦隆到科耶夫》（Lacan, De Wallon à Kojève）（巴黎，Éditions Michele，2017）。

[注19] 雅克·拉康，《认同》（L’Identification），Roussan 版本（迄今最可信赖的版本）。〔英译者注：拉康的一些研讨班曾被录音，产生了录音位置不同、换磁带时点不同的不同录音。因此，同一期研讨班可以有不同的资料来源。〕

[注20] 莫里斯·布朗肖，《隐晦的托马》（Thomas l’Obscur）（新版，巴黎，Gallimard，1950，第109—116页）。我应感谢阿尔弗雷多·洛佩斯提醒我这一出处，在此向他致谢。

[注] L’Arrêt de mort 中 arrêt 既可表示裁决，也可表示停止；固定书名《死刑判决》保留前者，但底本在此采用后者“死亡的停止”，与第二次死亡的论述相接。白石 / “布朗肖之石”还牵连 blanche 与 Blanchot 的声音游戏。原注15将《幻想的逻辑》的年份写为1996—1997，与正文1967年1月11日及后继研讨班1967—1968不一致；保留其底本数字并标明疑点。

凭借这两处指涉——一处关于第二次死亡，另一处关于对我思（cogito）所联结的思考与存在的拆散[注21]——我们几乎没有离开阿尔都塞。如果回想起拉康把“我不思考”定为越入行动的一项主要特征，我们便会更加靠近他。沿着我思的展开，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主体在行动中发现自己没有思想时，其存在的问题。

[注21] 笛卡尔研究者一致认为，我思（cogito）具有显著的瞬时性。只有当某人以某种方式以自己的名义重复它的那个瞬间，它才是真的。换言之，不能从“我思故我在”推导出“我是一个思考的存在者”。因此，拉康能够在这个瞬时的时刻中看到越入行动：在这个时刻，主体由于观察到自己在思考，便认出自己在。

请回想，我们区分了行动的两种方式，但并不因此排除其他方式。不同于越入行动，史诗性跃迁是思想本身的实现，这种思想是清楚地表述出来、并且意识到自身的。它立即就有意义；它被写入一段历史。这两种行动方式（越入行动、史诗性跃迁）可以很容易地放入异化之或（vel）所构成的二择式中：我思考之处，我不在（史诗性跃迁）；我在之处，我不思考（越入行动）。我与米歇尔·福柯一道，把那一初始选择的出发点称为“起而反抗”；这一选择将选取二择式的一个或另一个分支，而且无法逃避它。在本书结论中，我们将回到这一点。

在没有思考，甚至没有思想——即使是无意识思想——的情况下发生的杀死埃莱娜这件事，呈现出越入行动的许多特征。我们可以把一句关于《英国情人》主人公克莱尔·拉纳的话，与这一行为联系起来：“也可能就在杀她前一分钟，她还没想到自己会杀她”[注22]（见第三章）。行为从按摩（阿尔都塞在这样做，人们如此认为[注23]）转向扼颈（没有思想）的表面连续性，掩盖着一道深渊、一个间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从一边越过它到达另一边，从被付诸行为的思想到没有思想的行动，而“越入行动”正是在这里发生。于是，这是一个不适当的名称，因为当时发生的事情——杀人——绝不是一种潜在的象征性言说，绝不是一种仅由于疏忽、以及由于千百种难以明确指出的原因，而被实现（越入行动）的言说。《鸭鸣报》在1992年5月6日那一期

中，把一篇文章题为“Massage à l’acte”：从语言看，这是个漂亮的说法，但如果把越入行动理解为按摩行为简单而最终的强化，这个说法便不合时宜。[注]

> [注22] 玛格丽特·杜拉斯，《英国情人》（L’Amante anglaise）（巴黎，Gallimard，1967，第115页）。

> [注23] 在这一语境中，大写字母 V 的形象充当行为的媒介。参见居伊·卡萨达蒙，“Althusser derrière là le V en masse”，《Quid pro quo》，第4期（巴黎，Epel，2009）。

> [注] Massage à l’acte 以 massage（按摩）置换 passage à l’acte 中的 passage，保留这一题名以显示声音与字形游戏。

帕潘姐妹的越入行动也是如此。它引出了如此众多的评论和艺术创作，而这些产物中没有任何一种曾被普遍认可；这一事实表明思想（精神医学的、精神分析的、文学的、艺术的，以及常人的思想）的不足，甚至不可能。它同样不可预见，冒出来却无人知道从哪里来……它也以我们所规定的方式搁浅了：克里斯蒂娜·帕潘坚决拒绝按照人们的要求申请总统赦免，任凭自己死于恶病质，没有人能够阻止她。[注24]在杀人行为十年后，1990年被安置进养老院的阿尔都塞，也拒绝进食和饮水。不久之后（10月22日），他在精神医学教学医院拉韦里耶尔诊所去世。

> [注24] 弗朗西斯·迪普雷，《越入行动的“解决”：帕潘姐妹的双重杀人案》（La “Solution” du passage à l’acte. Le double crime des sœurs Papin）（图卢兹，Érès，1984）。最近，人们对帕潘姐妹又产生了兴趣。2018年12月15日和16日，法国文化电台的两个节目专门讨论她们，这表明这一问题尚未结束。

失败伴随着回弹，而搁浅则完全不同；我们可以把搁浅看作越入行动的后续：它不构成终结的结果。如果每一次搁浅或搁滩（如海上的船）都是失败，并非每一次失败都是搁浅。如前所述，消失不是结束，也不是终结：毋宁说，是不结束。“在纤夫被钉上彩色木桩之后，醉舟如今失去方向，便这样停在那里，像一个跪着的女人”：

冰川，银色的太阳，珍珠般的浪，炭火般的天！

褐色海湾深处丑陋的搁浅，

在那里，被臭虫啃噬的巨蛇

从扭曲的树上坠下，带着黑色的芳香！[注25]

[注25] 阿蒂尔·兰波，《醉舟》（Le Bateau Ivre）〔写于1871年；译文参见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5，第129页）。

诗歌能够思考没有思想的行动吗？或者，我们是否更应当得出结论：当死亡已经起作用，只有某种沉默，才能准确地、尽管不善于如此地，回应这种不召唤后续或回答的搁浅？任何有关的话语都只是无益的闲聊吗？面对越入行动，我们遭遇的情形，与面对哀悼时相同：两者都把象征整体逐出。没有什么比葬礼之后向死者家属表达的慰问更尴尬、更单薄、更徒劳了。那些响亮的空话，既掩饰又揭示了“所有能指要素的不足：它们无法面对能指系统围绕着哪怕最微小的哀悼的运作，在存在中造成的洞”。[注26]路易·阿尔都塞——从他消失之后栖居的、永远无法定位之处——不会觉得这份沉默的邀请脱离了语境：它放逐任何向他说出的话语。他本人也这样说过，尽管说法有问题：“他们能在我写的东西上再添什么？评论吗？可那正是我自己正在做

的！”[注27]说它“有问题”，是因为完全清楚，《来日方长》的出版不会达到所期望的效果——恰恰相反。路易·阿尔都塞把这种所期望的效果表述如下：

> [注26] 雅克·拉康，《欲望及其解释》（Le Désir et son interpretation），1959年4月22日。（见《并非全部拉康》（Pas-tout Lacan），https://ecole-lacanienne.net/bibliolacan/pas-tout-lacan/。）

> [注27] 路易·阿尔都塞，《来日方长》（L’Avenir dure longtemps）〔1992〕（巴黎，Flammarion，2013，第242页）。

> 如今，我把这本极为私人的书交给愿意阅读它的公众，仍是出于这种悖论性的偏向：为了最终进入匿名，不是通过无处所（non-lieu）的墓石，而是通过把关于我的一切可知之事都公布出来；这样，我便能够永远安然面对那些刺探隐私的要求。[注28][注]

> [注28] 路易·阿尔都塞，《来日方长》（L’Avenir dure longtemps）〔1992〕（巴黎，Flammarion，2013，着重为阿尔都塞所加）。

> [注] 底本 non-place 对应作者的法语 non-lieu：既指司法上的撤案 / 不起诉，又保留“无处所”的字面意义，与消失者无从定位的处境相联。此处及下文保留这层双关。

为了使传闻沉寂而喂养它，是一厢情愿：徒劳的努力。流言还会有；它永远不会停歇。它部分地偏离事件，从而背叛事件。我们不妨承认，这里正在展开的东西具有一种失调言说的地位：不是在真 / 假二项组的意义上，而是在乐手演奏走调的意义上。

这种走调的言说，这种没有可能自称准确的言说，这种对于越入行动所唤起的特殊沉默而言无意间说出的话，越过了一种比死亡所强加的沉默还更彻底的沉默。因为，如前所述，消失不是死去（这一点阿尔都塞再清楚不过！）；它给予主体一段时间，让他留在两次死亡之间的空间〔间隔〕中，而这个空间不向他提供任何匿名。与死去相反，

消失剥夺了主体的第二次死亡，让他居住在一个空间里（米尔纳会说，被禁闭在其中）：在那里，未来确实延续得非常久——甚至无限期地延续。

上面的引文就是见证：这种走调的言说也属于阿尔都塞，因为我们收到了他的某些讯息（他，是谁？），尽管他是一个消失了的人。我们不能装作这些话从未被写下。这涉及什么？在上面描述的情境中，这些话能够让我们知道这一情境中的什么，又能让我们知道关于这一情境的什么？它们希望获得什么？又是从谁那里获得？

人们可能会惊讶，问题竟以这种方式被考虑。消失了的人不会写作；[注29]只要有来自他的一个字，他就不再是消失了的人。然而，尽管试图写作，阿尔都塞也在《来日方长》中描述完自己版本的杀人场景之后，立即提供了据他自己说促成此举的理由。他指出，有人“代替他”说了话（这值得怀疑）；他认为，重要的是“亲自而且公开地介入，让〔他〕自己的证词被听见”。[注30]他打算不让事情就这样下去：既不放任当时的情境，也更广泛地不放任自己被判定要“活到〔他〕的生命结束”——而我会加上一点：远远超出他生命的结束，超出他第一次死亡的终点。前言的最后几行极具洞察力。他写道：“我的命运就是相信：我只能以无限地招致其他忧虑，来处理一个忧虑。”所以，写作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安宁。问题在于不无视传闻，也不让它们散布：通

过在它们的位置介入（如我们所读到的，代之以一个“我自己”），而不是从他的位置出发、而是自从他的位置以来（“depuis”既意为“从……出发”，又意为“自从……以来”），来抵抗它们的发展。

> [注29] 想象一下，玛丽娜（见第42页）如果收到失踪未婚夫的一句话，会多么欢喜……为了把她观察得这么仔细，我在仅仅五岁时想必就已迷恋玛丽娜了（谨以这句话惠赠给坚信俄狄浦斯情结具有核心性质的精神分析家）。

> [注30] 着重为阿尔都塞所加。

没有人能控制任何关于自己生活的传闻、“据说”〔on-dit〕；没有人能知道整个故事。我们知道，玛格丽特·杜拉斯突出指出了“据说”从一种无法通过任何其他途径接近的真理中所携带的东西。试图控制这个“据说”、想要掌握它，就是抛弃一种真理：中性（罗兰·巴特[注31]）的真理，贝克特“谁说话又有什么要紧？”的真理；拉康认出它正是精神分析起源的真理。按照拉康的说法，弗洛伊德如此被自己的“伊尔玛打针”之梦占据，以致他对伊尔玛持续患病的罪责感消退了。那么，使他卸下一切责任的声音就是：

> [注31] 罗兰·巴特，《中性：法兰西学院课程（1977—1978）》（Le Neutr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 – 1978)）（巴黎，瑟伊出版社 / Imec，2002）。

……那庄严的声音

它一响起，便使人知晓

它已不再是任何人的声音。

如波浪与森林的声音。[注32]

[注32] 保罗·瓦莱里，“皮提亚”（La pythie），收入《魅力》（Charmes）〔1922〕（巴黎，Gallimard，1953）。我第一次引用这首诗，是在研究拉康对伊尔玛打针之梦的看法时（《干枯死亡时代的哀悼情色学》（Érotique du deuil au temps de la mort sèche）〔1995〕，第二版，巴黎，Epel，1997，第102—107页）。

介入并取代这传闻，这中性，这据说……在这声音的位置介入，是一种否定的忧虑。然而，并没有真正解决什么。阿尔都塞在杀死埃莱娜之后所写的东西，没有触及中性之点，而此处我们所试图做的无非是指出：只有越入行动能够触及这个点；只有它具有触及这个点的能力。

行动之后所写的话的效果，将在于一个忧虑让位于好几个忧虑。我们是否必须从这种变化得出结论：阿尔都塞——作为一个作家，已经写了东西——不再是一个消失了的人，那么问题迄今的呈现方式便没有意义？

我们本该这样做，要不是《来日方长》的写作，继而其死后出版，使某种移位，甚至某种障眼法成为可能，从而重复了忧虑。阿尔都塞把自己被放在“沉默的墓石”下，归因于“无处所的命运”：这是我们不能纯粹而简单地赞同的东西。正是越入行动最终确立了他作为消失了的人的地位，而“无处所”只是为这一状态盖上封印。在他所写的两行之间，便是他消失于其中的深渊：[注]

[注]“无处所”承接司法撤案与无可定位之处的双关。随后51—54段与55—58段分别对应底本先列的法语引文及其英语对译；保留两组段落的原有映射，均译为中文。

他正在给仰面躺着的埃莱娜按摩脖子。

埃莱娜的脸静止而安详，她睁着的眼睛注视着天花板。

……

突然，我被恐怖击中：她的眼睛无尽地凝定着，而最要紧的是，一小截舌头奇异而平静地搁在她的牙齿与嘴唇之间。[注33]

[注33] 路易·阿尔都塞，《来日方长》（L'Avenir dure longtemps）〔1992〕（巴黎，Flammarion，2013，第34页）。

她仰面躺着，他正在给埃莱娜按摩脖子。

她的脸静止而安详，她睁着的眼睛凝视天花板。

……

突然，我被恐怖击中。她的眼睛永远凝定着，而最要紧的是，一小截舌头奇异而平静地搁在她的牙齿与嘴唇之间。

埃莱娜安详……继而平静：这里有一道奇异的间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几乎如此。阿尔都塞从未见过被掐死者的脸，却写道，他"知道她被掐死了。但是怎么会呢？""怎么"这个词含有两种意义："他怎么知道？"或者"她是怎么被掐死的？"惊慌中，他喊道："我掐死了埃莱娜！"是的，他知道这一点：可是，不是通过回忆它，仅仅是从看见她的脸、推断行动已经发生而知道。杀人行动本身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的知道（在事后）来自他的看见：某种意义上，是依据结果作出的推论。这一结果在埃莱娜身上向他显示了一个被掐死的女人；然而，除了这一事后的观察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向他保证，曾经有过一个掐人者。

人们曾想在某些暴力的、往往是杀人的行为中看到这种越入行动；这些行为发生时足够重大，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例如恩斯特·瓦格纳就是如此：因为流传着他是同性恋的传闻，他在自己任教的那个小镇杀了好几个人。[注34]既然他知道是什么推动了自己的行动，我们难道不该把它称作“史诗性跃迁”吗？瓦格纳思考并反省了自己的行动。他在自己的疯狂中十分认真，先杀了妻子和孩子，好让他们不必一生背负一个身为杀人者的丈夫和父亲。我们是否还应在伊里斯·卡贝苏多的行为中认出史诗性跃迁？她杀了自己的父亲，认为父亲（部分属实地）不断虐待他的妻子——直到在杀人和撤案之后不久才意识到，驱使她这样做的与其说是父亲的暴力，不如说是母亲无休止的抱怨。[注35]

> [注34] 参见安娜-玛丽·万德拉斯，《罗伯特·高普：一个怪物及其精神科医生》（Robert Gaupp, un monster et son psychiatre）（巴黎，Epel，1996）。又见《依恩斯特·瓦格纳这位偏执狂剧作家所见的巴伐利亚路德维希二世》（Louis II de Bavière selon Ernst Wagner paranoïque dramturge）（巴黎，Epel，1993）。据我所知，恩斯特·瓦格纳所写的戏剧《妄想》（Délire），仍是一个偏执狂关于另一个偏执狂创作戏剧作品的唯一案例。

> [注35] 参见拉克尔·卡普罗、迭戈·宁，《我杀了他，她说，他是我父亲》（Je l’ai tué, dit-elle, c’est mon père）（弗朗索瓦丝·本·凯蒙自乌拉圭西班牙语译出，巴黎，Epel，2005）。

我们习惯于把行为中的暴力程度视为区分越入行动与其他行事方式（错失行为、症状性行动、行动展示〔acting-out〕等）的标准。史诗性跃迁这一临床发现，迫使我们提出另一个标准，重新审视先前的标准：不是暴力，而是它是否被写入一段立即就有意义的历史。

在阿尔都塞的行为发生时，他既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是所发生事情的行动者。再者，他是行动者吗？把这种晕厥归于马克思追随圣西门而称作“事物的力量”的东西（中性的另一个名称），难道不更合适吗？

阿尔都塞在他的行动中不在场。他不在那里，以至于甚至无法说“我不在”。由此可见，他从未在那里；这一情形持续到今天，并呈现为永远延续。其消失，他作为消失了的人的禁闭，首要的一点就在于此。

阿尔都塞还提供了关于杀人的另一个指示，可以在《来日方长》手稿的一段中读到。它由两句话组成，书的编者没有刊出，无疑因为它们被作者划去了：假如能指是痕迹的抹除，这反倒只能显示它们的重要性。[注36]

> [注36] 此段由 I. 费诺利奥引用于《悲剧的自我书写：路易·阿尔都塞〈事实〉与〈来日方长〉的手稿》（Une auto-graphie du tragique, Les manuscrits de Les Faits et de L’Avenir dure longtemps de Louis Althusser），扬·穆利耶-布唐作序（新鲁汶，Academia Bruyland，2007）。我由于 G. 卡萨达蒙的文章“Althusser derrière là le V en masse”，《Quid pro quo》，第4期（巴黎，Epel，2009），而找到了这一段。

没有对在场的 sésir〔改为 désir，欲望〕的幻觉，而不伴随摧毁那种否定死亡欲望的在场的意愿。[注36]这种摧毁的意愿可能导致对幻觉中的在场的实际摧毁，在本例中，是充当这一幻觉中的在场之支撑的那个人 / 本身。[注37][注]

[注36] 此段由 I. 费诺利奥引用于《悲剧的自我书写：路易·阿尔都塞〈事实〉与〈来日方长〉的手稿》（Une auto-graphie du tragique, Les manuscrits de Les Faits et de L'Avenir dure longtemps de Louis Althusser），扬·穆利耶- 布唐作序（新鲁汶，Academia Bruyland，2007）。我由于 G. 卡萨达蒙的文章"Althusser derrière là le V en masse"，《Quid pro quo》，第4期（巴黎，Epel，2009），而找到了这一段。

[注37] 这个词被涂抹得几乎无法辨认。

[注] 底本此处法语引文的原注索引，和紧接着英语对译的索引有错位；按底本保留引用及注释顺序，未擅自互换。sésir 为手稿写法，随后被改为 désir；作者后文将其与"攫取"联系，故不删除或径改为欲望。

没有对在场的sésir〔改为欲望〕的幻觉，而不想摧毁那种否定死亡欲望的在场。[注37]这种摧毁的意愿可能导致对幻觉中的在场的实际摧毁，在本例中，是充当幻觉中的在场之支撑的同一个 / [注38]人。[注]

[注37] 这个词被涂抹得几乎无法辨认。

[注38] 这条斜线是在打字稿上手画的。

[注] 法英对照的斜线位置及原注索引不同，译文各按底本保留。

读到这里，我们还能把这种旨在摆脱某种在场的行为称作杀人吗？哪种在场？我们完全不必给这些句子中的"在场"一词赋予同一种意义。毋宁说，sésir/désir上的双关，本身就是一种加倍，邀请我们看得更仔细。于是，我们区分出两种不同的在场：被欲望的在场，一种纯粹的在场，必须将它攫取，哪怕以幻觉方式；以及另一种在场，它否定死

亡欲望，只有将它摧毁，才可能通向前一种在场。这是可能的，因为第二种在场构成了第一种的支撑。埃莱娜·里特曼由于一个巨大的误解，为此付出了生命。

1982年，阿尔都塞再次谈到自己的行动，写下如下几行，澄清他所说的“支撑”是什么意思：

> 1980年11月，在一次强烈而不可预见的精神错乱危机中，我掐死了我的妻子：对我而言就是整个世界的妻子，她如此爱我，以至于因为她不能活下去，她只想死；无疑，我——在错乱和浑然不觉中——替她“帮了这个忙”，对此她没有自卫，却因此而死。[注39]

[注39] 路易·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文集》（Écrit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第一卷，弗朗索瓦·马特隆编集并介绍，巴黎，Stock / Imec，1994，1999年再版，第550—551页。我由于 G. 卡萨达蒙的前引文章“Althusser derrière là le V en masse”，而找到了这一段。

这个支撑是一个形象，某个人的形象，“埃莱娜”；她——无法活下去——只能以想要死来爱；或者，至少他是这样想的，因为把埃莱娜缩减为这个单一特征，至少看起来是无意的，即使假定她任凭自己被孤立于这一特征之中也一样。在这里有在场吗？不尽然：这里起作用的只是某种被欲望的在场的可能支撑，而只有越入行动能够唤起这一在场。这个越入行动由一个词组成：“来！”因此，这是一声对在场的呼唤：更确切地说，是对一种在场的呼唤，沿着“支撑”一词的指示，我

们已认出它是双重的。她，“埃莱娜”的在场；她想要死的欲望越是使她对自己、对生活缺席，她的在场就越是被强烈地等待。至少，这是阿尔都塞理解它的方式。[注40]

> [注40] 这里完全不是面对面的情形，不是某些人会称为“自恋性”的关联。埃莱娜既占据大他者的位置，又化身为大他者，上文将其规定为“双重在场”。我认为有必要提出一个词，使主体选择伴侣的这一非常平常的情境不再受到忽视：“化身占据”（incarpation），是“化身”（incarnation）与“占据”（occupation）的凝缩（《他性》（L’Autresexe），巴黎，Epel，2015，第183页）。化身：注定会终止，某种东西仍是偶然的。占据：外国军队占领一个国家，接管它，把通常由居民作出的决定据为己有。化身占据不应被看作接近压抑、否认、反向形成、拒斥或升华：这些都是主体以某种方式在自身上实现的操作（至少，按人们思考它们的方式来说如此）。化身占据，是当某人被寄托在他 / 她的伴侣身上时，情色层面所发生的事情的名称。

然而，这里还介入了另一种在场：另一个“来！”，当伴侣迟迟没有“来”（coming）时，人们在性行动中说出的“来”：一段往往来日方长的未来。我们不妨承认，在做爱时，这个伴侣奇怪地没有被承认为在场，尽管有种种爱抚以及其他性爱前奏——只有到来才使她成为真正的伴侣，而这也只在这种在场如一道稍纵即逝的闪电那样出现时才成立。[注]

> [注] come / coming 在性行为语境中既有到来、在场之义，也有达到高潮之义。“来”保留呼唤与到来的连续性，同时应读出这一性的双关。原句 as long as 可表示“只要”的条件，也可表示“在……期间”的时限；正文取时限读法。英句本身生硬，未据此断定另一读法不成立。

“支撑”指示了越入行动中起作用的双重在场；越入行动未能达到这种双重在场，便只能以使它消失为目标——而这又只有通过消失才可能做到。稍后，在第三章和结论中，我们会修正这些陈述，因为届时我们能够把幻觉中的埃莱娜的在场归于第一种性的分析论（对象a的分析

论），并把另一种在场归于第二种性的分析论（不存在的性关系的分析论）：后一种在场，倘若有效，便会允许对性关系的“攫取”〔sésir〕。[注41]一边，是一个幻觉中的“埃莱娜”；另一边，是一个女人，与她的性关系可以被写出。

> [注41] 请参见上文原注40，因为这里涉及化身与占据的相互作用。

等我们考察克莱尔·拉纳所犯的杀人（第三章）时，我们将如同此处一样——但以一种更易于分析的方式——看到这两种分析论的相互作用，并看到越入行动被写入第一种性的分析论，史诗性跃迁被写入第二种。结论中，当我们着力澄清拉康所说的“明晰的越入行动”是什么意思时，我们将发现同样的相互作用；这个语组乍看显得畸形，但他却用它来询问分析的终点，以及从精神分析者到精神分析家的过渡。

上述展开唤起了最后一个问题。如何一面承认阿尔都塞在其越入行动中不在场，一面又断言，与史诗性跃迁相反，越入行动以一种“我在”为特征：一种没有任何思想的“我在”？无意识假说可能误导性地提供排除这一异议的可能性。当然，人们可能会说，这里没有意识思想在活动。然而，无意识思想仍然在起作用——何况阿尔都塞提供的信息，一经研究、并作为整体加以考虑，便可能使我们确定其越入行动的意义：换句话说，把它写入一段历史，一段会使它成为史诗性跃迁的历史。然而，不论这些“建构”（弗洛伊德）多么聪明、精确，我们读着读着便放下了，感觉到它们并未把握住越入行动，而像山顶上的云那样浮在它上方，很快便会被风带往别处。这些建构的多样性本身就表明，没有一种是最终的。承认行动，既驳斥思想的帝国主义，也同样驳斥无意识的帝国主义。

没有思想促使阿尔都塞犯下杀人行动，没有预谋，这一点精神科医生和法官都承认。如今我们看到了无处所〔撤案〕的正当性；而一项定罪——无疑与阿尔都塞当时的愿望相反——也不会消除他对自身的这种缺席。在无处所的真理中，以及在杀人期间的消失中，显现的是同一种必然性。[注]

> [注] 此处“无处所〔撤案〕”继续保留 non-place / non-lieu 的司法义和处所义，而不把“消失”简化为法律判决的结果。

我们已经知道对这一表面上的困境的回答：它由一个词构成——“消失了”。“消失了”既意味着在行动中的缺席，也意味着越入行动所特有的“我在”（那个消失了的人）。

杀死幻觉中的埃莱娜，或者杀死埃莱娜的幻觉，可以被视为一种史诗性跃迁。阿尔都塞被让她活起来的意图所占据，[注42]它因而具有一种意义——被写入一段历史。然而，在这一行动中还有另一个、不同的行动：“来！”埃莱娜只是它的支撑：那种会使性关系存在的“来！”雅克・拉康的一项陈述，即使不确立，也确认了这一断言：[注]

> [注42] 我们已指出圣战者行动中存在这一特点（见上文第000页）。只有当人们被告知：身体死亡不是一个人命运的最后一句话，身体死亡开启一个空间——两次死亡之间的空间（雅克・拉康，《精神分析的伦理》，1960年7月6日课次），它才可以被接近。有关这一空间的更详细说明，请参阅让・阿卢什，《拉康的场景及其魔法圈》（La Scène lacanienne et son cercle magique）（巴黎，Epel，2017）的第二章。

> [注] 原注42的“第000页”是底本占位；其末尾“第二章”指阿卢什另一部著作《拉康的场景及其魔法圈》，但电子书给出的链接通向本书第二章。保留原链接并标明这一底本异常。

> 事情是这样的：既然今年我的目标是向你们谈一，我今天就先从阐明它与大他者〔l'Autre〕的相关性开始……大他者，大写的 O。我曾在不久前就它收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表达的忧虑；我得以重新开展工作的那个位置，是有赖于他的：他的忧虑是，大他者是第三者，把它相对于一对伴侣提出时，他（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把它认作上帝。[注43]

[注43] 雅克·拉康，《……或更糟》（… ou pire），1972年3月8日课次。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曾向拉康指出，在大他者的掩护下，上帝很可能就在那里。然而，按照拉康这段陈述，这里还有更多：就阿尔都塞而言，对大他者的定位可能与伴侣对子联系在一起。"伴侣对子"：这个词使"成对存在"的专制凝结起来，居伊·奥康盖姆曾如此清楚地确立过这一点。[注44]如今，我们想到的与其说是结合、从二做成一，不如说是组成一对、成为一对、配对。在两种情形中起作用的，都是性关系存在这一思想、信仰或幻觉。重新接上自己昔日的天主教信仰，阿尔都塞只能通过一个神性的第三者，使这对伴侣存在。我会说，这就是他的认真；米歇尔·福柯《肉体的告白》（Aveux de la

chair）的出版最近确认了这一点。[注45]没有比这更切实的证据证明，这个著名的伴侣对子并不存在——阿尔都塞的越入行动试图使之存在的性关系也同样不存在，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注]

> [注44] 居伊·奥康盖姆，“伴侣对子的未来（L’Avenir du couple）”，《解放报》，1980年8月22日，再刊于《Chimères》第69期。有关这一点的更广泛展开，请参见让·阿卢什，《他性》（L’Autresexe）（巴黎，Epel，2015，第105页，原注63）。

> [注45] 米歇尔·福柯，《性史》，第四卷，弗雷德里克·格罗作前言（巴黎，Gallimard，2018）。

> [注] couple 在这里不只是婚姻身份，而关乎两个人构成“一对”的论证；译为“伴侣对子”，保留它与二、一及性关系的关联。being two 指成对存在的状态；后文的组成一对、成为一对、配对，是作者另外列出的不同说法。

现在让我们带着另一个问题回到剧院。这个被体验为空的观众席，这个缺少一次讲话的地方：它难道不正是期待并询问上帝的同一个地方吗？在阿尔都塞与拉康首次共进晚餐的次日，1963年12月4日，阿尔都塞给拉康写了一封相当长的信——无疑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仿佛这种沉默已经预告了那个对我而言如此引人入胜、如此重要的空观众席。我从中摘出两句话：“是的，有外部。感谢上帝。”[注46]我们可以读成：“是的，在外面，有一位上帝。谢谢。”（“Oui, il y a un Dehors. Dieu merci.”……“Oui, il y a, dehors, un Dieu. Merci.”）

> [注46] 路易·阿尔都塞，《精神分析文集：弗洛伊德与拉康》（Écrits sur la psychanalyse. Freud et Lacan）（巴黎，Stock / Imec，1993，第285页）。

三年后，拉康在赠给路易·阿尔都塞的《文集》上题写：“我们就在这里，同在一条船上。”[注47]这值得怀疑。

> [注47] 路易·阿尔都塞，《精神分析文集：弗洛伊德与拉康》（Écrits sur la psychanalyse. Freud et Lacan）（巴黎，Stock / Imec，1993，第270页，题赠的影印）。

第三章｜越入行动与史诗性跃迁：玛格丽特·杜拉斯

DOI：10.4324/9781003504092-4

1968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将她的小说《英国情人》（L'Amante anglaise）（1967）改编为戏剧：《〈英国情人〉的戏剧》（Le Théâtre de l'Amante anglaise）。[注1]同时，她也采用并重新配置了《塞纳-瓦兹的高架桥》（Les Viaducs de la Seine-et-Oise）中的许多元素；这部戏写于1959年，1963年首次上演。《高架桥……》有一小段话在帷幕升起之前读出，其最后一句是："法律与犯罪者的共同努力，未能找到这桩罪行的任何理由。因此，罪行仍然没有得到解释。"[注2]观众立刻得到提示：这里要做的，是提供解释以外的事情。那么，是什么？是让人有可能加入那个魔法圈；圈中的人感兴趣的是，杀人者与她的受害者之间，以及受害者与她的杀人者之间，发生了什么。[注3]眼前放着这一页的你，也处在这个位置，仅仅因为你正在阅读。

> [注1] 这部戏已经上演过许多次，最近于2017年在巴黎吕塞内尔剧院上演。标题角色由玛德莱娜·勒诺饰演。米歇尔·吕蒂的一篇文章，配有勒诺扮演这一角色的照片，发表于《Littoral》第43期，题为"《英国情人》：对一桩罪行的解释"（L'Amante anglaise: interprétation d'un crime）。〔本章除另有说明外，出处都指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英国情人》（1967）。〕

> [注2] 玛格丽特·杜拉斯，《全集》（Œuvres complètes），第一卷（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2011，第1263页）。

> [注3] "魔法圈"这一构想见让·阿卢什，《拉康的场景及其魔法圈》（La Scène lacanienne et son cercle magique）（巴黎，Epel，2018）。

关于这桩罪行能够说出或写下的任何东西，永远都不可能填满那个洞；解释的缺失如此清楚地标出了它。或者说得更精确些：无论说出什么陈述，它都只有在被这一特征所标记——也就是承载着这一特征——时，才有意义：解释的彻底缺席。任何关于这桩谋杀的陈述，都将是微薄的（tenuous），而不是提出的（tendered）〔法语：ténu，而非tenu〕[注]：它会把位置留给行动，留给作为行动的行动。这一标记持续存在于杜拉斯的文学作品中，至少从1964年出版的《洛尔·V.斯坦的迷狂》（Le Ravissement de Lol V. Stein）起就是如此；那是《高架桥……》首次上演一年之后、《英国情人》出版三年之前。1962年，勒吉扬医生邀请玛格丽特·杜拉斯，在一名叫玛侬的女人被关住的精神病院围墙之外，与她共度一整天；多年间，杜拉斯始终无法忘记这个女人。这次会面之后，便有了《迷狂……》的写作。我们不知道勒吉扬医生为何给杜拉斯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邀请。战后那些年，杜拉斯在她巴黎圣伯努瓦街的家中，接待了不少"上流人物"，其中包括雅克·拉康。无论是因为她招待得好，还是因为她许诺让他们成名，克洛德·鲁瓦毫不犹豫地称她为"圣伯努瓦团体"的女王。拉康说的则不同：他承认她是令人着迷者（ravisseuse），自己为她着迷（ravi）；不过，这并非洛尔被迷住〔ravie〕的那个意义。拉康的"就《洛尔·V.斯坦的迷狂》向玛格丽特·杜拉斯致敬"（Hommage fait à Marguerite Duras du Ravissement de Lol V. Stein）发表于1965年，它把这部作品从一出版就将它埋入的"棺材"里带了出来——杜拉斯如此说。至于杜拉斯，她丝毫没有为拉康着迷（ravie）。然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解释的根本缺席。这非但丝毫没有损害他们的写作——文学的、临床的、理论的写作——反而与写作的对象相符。[注4]〔英译者注：

“共同的特征”：在精神分析中，没有哪种解释是必不可少的。〕什么对象？疯狂。关于它，凡是没有被自身的悬置判断（épokhē）所标记的解释，都是不适当的。

> [注4] 玛尔塔·马托尼追踪了拉康与杜拉斯接连发生的交会。她未发表的文章“杜拉斯与拉康之间的洛尔·V.斯坦”（Lol V. Stein entre Duras y Lacan），汇集了与上述信息有关的所有出处。

> [注] 本段保留英文 tenuous / tendered 与其所附法文 ténu / tenu 的对照。ténu 指纤细、微薄，tenu 可指被持住、维持，在“说出言论”的搭配中也会出现；二者词形只差一个尖音符，中文无法重现。英文 tendered 与法文 tenu 并非稳定的同义对应，尚未取得阿卢什法文原句，不强行确定第二项含义。作者强调陈述需给作为行动的行动留下位置，不是说要温柔对待犯罪。

提醒

聋哑的玛丽-泰蕾兹·布斯凯的尸体，几乎所有碎块都被杀害她的人抛到从维奥尔讷高架桥下经过的几列货运列车上，由此散落各处。这项工作困难而沉重：花了三个夜晚，往返九趟。

如同我们先前就“9·11”圣战者指出的，这个行动也有签名[注5]：两个词写在不同的表面上。一个是“阿方索”（Alfonso），写在肢解尸体的地下室墙上；另一个是“卡奥尔”（Cahors），写在尸块上，与“阿方索”连在一起——阿方索是杀人者爱着的男人（第47页）。小说为理解这两个题记，各自提供了一把钥匙。我们将在后文讨论尸块上题记的意义。地下室里的“阿方索”题记，占据了一声呼喊的位置：一声向阿方索发出的、无法说出的求救呼喊。

> [注5] 正如有时一次盗窃，以留在现场的粪便签名。

> 因为我不能喊出来，那样会把我丈夫吵醒，所以我写了下来？也许吧。我不记得了。我想到写下来，是为了呼唤，尽管我知道那是徒劳的。
>
> （第178页）

除了头之外，尸体的所有碎块都被找到了。克莱尔·拉纳始终不准确说出头在哪里。而且，被问到时，她不作回答（第45页）。一旦她承认了自己的杀人行动，这种不回应的立场便不再部分地属于她[注]；她的承认几乎是一次口误，为的是不让任何人循着错误的线索走下去（第43—127页）。

> [注] 底本此处写 no longer partly hers，否定与 partly 的辖域不够清楚。正文保留“不再部分地属于她”的表述，不替换为“不再完全属于她”，也不据此断言她已完全放弃不回应的立场。

因此，很早我们就知道，克莱尔·拉纳杀了人，也知道受害者是谁；于是，继续读这部小说时，便出现那个几乎不言自明、寻常而普遍的问题：这桩罪行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还想知道：这个杀人、肢解受害者尸体、又把尸块散布各处的女人，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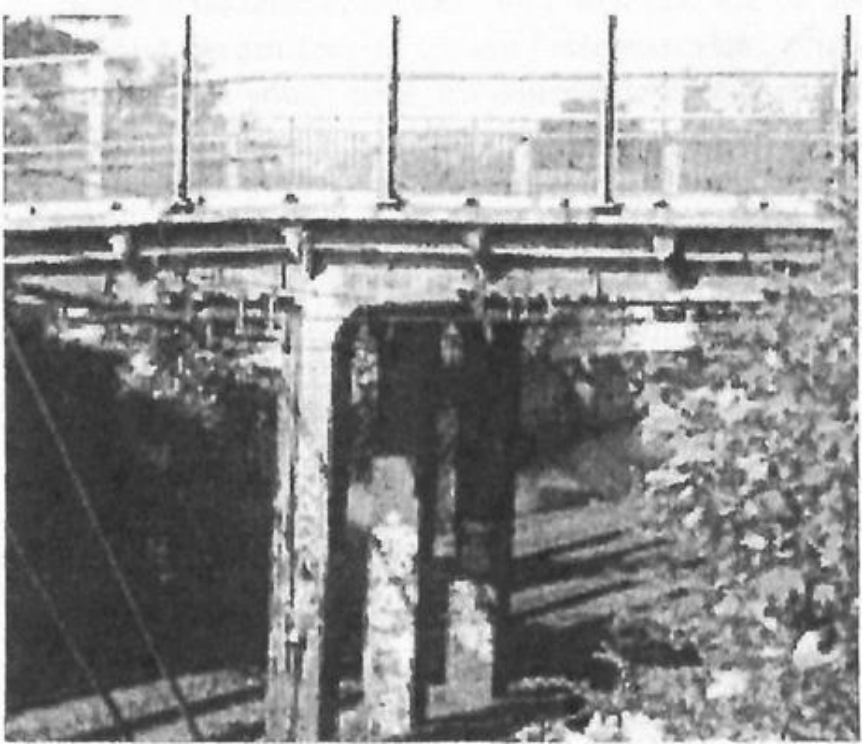
但渐渐地，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何对头的处理如此不同？”

杜拉斯并非凭空（ex nihilo）虚构了重组尸体时头的缺席。她读过1952年3月1日《世界报》刊出的阿梅莉·拉比尤审判报道，随后进一步调查（拉比尤案件启动并启发了杜拉斯这三部相互关联的作品：《塞纳-瓦兹的高架桥》、《英国情人》和《〈英国情人〉的戏剧》）：

> 我们责备阿梅莉·拉比尤的、我们想从她的罪行中理解的，与其说是她杀死了丈夫，不如说是她随后肢解丈夫的尸体，又将尸块散布到奥尔日河畔萨维尼的排水沟与空旷田野中。但她无法清楚地〔clairement〕解释这一点。[注6]

[注6]《世界报》的引文，以及铺石山高架桥与铁路线交叉处的照片，都在奥尔日河畔萨维尼《市政公报》2009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重新刊出。这篇文章非常恰当地题为“奥尔日河畔萨维尼的一桩罪行：没有耳朵的头之谜（1949—1950）”（Un crime à Savigny-sur-Orge: le mystère de la tête sans oreilles (1949 – 1950)）。

“阿梅莉”（Amélie）变为“克莱尔”（Claire），会不会是由于“清楚地”（clairement）这个词？克莱尔的话语是清楚的，清楚到使那些极限变得明晰：解释撞上这些极限，便告失败。让-马克·泰奥莱尔在《世界报》这篇报道中的这段文字，没有提到被肢解的丈夫的一些尸块，是从那座被称作“铺石山”（Montagne Pavée）的高架桥顶部扔下的。



一座带金属栏杆的高架桥，由多根竖直支柱支撑。

图3.1　铺石山高架桥：阿梅莉从这里将丈夫的尸块抛到货运列车上（第75页）。

报道也没有提到，被杀丈夫的耳朵始终没有找到。[注7]不过，报道暗示了耳朵这令人费解的缺席。泰奥莱尔写道，被告受审时，“在那没有特征的脸颊下面，在黄皮肤之下、紧挨着耳朵的地方，肌肉周期性地收缩，像一次抽动”。在《英国情人》中，受害者身体重组时没有出现的，是整个头。

[注7] 一项可以做的、有用的工作，或可题为“抽动与越入行动”。

对这令人惊讶的缺席，讨论确实展开了，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拉斯希望如此，希望保留“书的一部分让读者来做”（第10页）。我们来玩这个杜拉斯式的游戏：按照她的说法，不管是哪一本书，这个游戏“始终存在”（这里我们会想到拉康，因为他也知道怎样保留“留给读者的部分”）。我们不久就要提出一个解谜方案：一个并不消除谜团、却会向它稍微靠近一点的方案。

《英国情人》中的史诗性跃迁

正如我们将在后文确认的，小说第一部分呈现为一段史诗性跃迁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它类似于已经提到的那些行动：圣战者的行动（第一章），伊里斯·卡贝苏多、恩斯特·瓦格纳的行动，以及同类的其他行动（第二章）。小说开头，说话的是克莱尔的丈夫皮埃尔·拉纳；更准确地说，是他的声音，那是在巴尔托咖啡馆（Le Balto）一次聚会时由录音机录下的。参加聚会的有罗贝尔·拉米（咖啡馆老板）、阿方索·里涅里、皮埃尔·拉纳、一个试图掩饰警察身份却掩饰得很差的男人——他也几乎没有藏住自己的录音机——、一个刚加入这些常客之中的年轻女人[注8]，以及克莱尔·拉纳：她最初并不在场（这令人惊讶），而我们很快得知，她是一个凶悍、坚硬的人。[注9]第二台录音机，即那个警察的录音机，录下了正在播放的录音带中能

够听到的内容，以及伴随这次现场（in vivo）集体聆听而来的评论。整体来看，这一安排（在小说中用图形表达出来）是一种层层嵌套（mise en abime）。皮埃尔·拉纳的声音：[注]

> [注8] 也许这是杜拉斯本人的呈现，就像希区柯克在自己的一些电影中短暂现身？

> [注9] 请参阅我在让·阿卢什《拉康之爱》（L'Amour Lacan）（巴黎，Epel，2009，第276页）中对这种坚硬的评论。在那里，我讨论它如何可能被"提起"（raised）。至于知道它涉及什么，可以参阅D.H.劳伦斯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32），安德烈·托皮亚编，F.罗歇- 科纳兹译，安德烈·马尔罗后记（巴黎，伽利玛出版社，"Folio Classique"，1933，第358页）。

> [注] 原注9的英文为"the way in which it could be raised"，raised 在这里的具体所指不明。原注保留英文词形并译"提起"，不把它确定改写为"解除这种坚硬"；这一处有待原语核对。

"说到底，大多数罪行的原因，也许仅仅在于发现自己面对着犯罪的可能性。假设你日日夜夜生活在，比如说，一个爆炸装置旁边……而要引爆它，你只需按一下按钮。那么，有一天，你就按了。假设你和某个人共同生活许多年，然后有一个晚上，这个念头出现在你脑中。最初你对自己说，既然这个念头来了，你就能做——当然，完全没有打算做。随后你对自己说，另一个人在你的位置上就能做，另一个有理由做的人。再后来，你又对自己说，你总有理由做，而换作另一个不像你这么……"

"软弱的人？"

（我们不知道是谁打断皮埃尔·拉纳：这是一个"有这么一说"，一个"谁在说都无所谓"。）

“软弱，对，就是这个词：另一个不如你软弱的人，就会做。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而这个念头越来越频繁地回到你脑中；后来它就在那里，留在那里。它不断长大，占满屋子，你总是撞上它。就这样。”

“他在说什么？”（克莱尔对阿方索说。）

“一堆废话。”

“然后，有一天，你做了。至于之后——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所以，这是一次史诗性跃迁：提前考虑过，在某种意义上有所预见，丝毫不是一次断裂。史诗中的各个片段都是有意义的。在荷马这位西方史诗文学的奠基者那里，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注10]荷马之名已经变成了形容词。“荷马式的愤怒”是一种著名的、强烈的、被承认堪称荷马式的愤怒：它被写入一个故事，其表达方式是史诗（《罗贝尔词典》将“史诗的”列为“荷马式的”的同义词）。史诗性跃迁并不呈现越入行动对所有人——首先是做出它的人——所构成的不可预测性、荒谬、无意义与惊讶。作为越入行动的典范，并与史诗性跃迁形成对照的，是帕潘姐妹和阿尔都塞的罪行；至少，就我们刚刚重提的这一特征而言如此，因为阿尔都塞的行动也进入了史诗性跃迁的领域。至于克莱尔·拉纳，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在她的情形中看到一次史诗性跃迁，就会忽略她丈夫皮埃尔·拉纳的一句话：“也许在杀她的一分钟前，她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杀她”（第115页）。除了“也许”这个词之外，

这句话似乎与皮埃尔·拉纳在上面引文中的话相矛盾。我们以后还会回到这一困难；就阿尔都塞的行动，已经提出过它（第二章，第54—58页）。

[注10] 荷马曾是一些争论的对象，当时这些争论为尼采带来了许多东西。见弗里德里希·尼采，《荷马事件》（Le Cas Homère），卡洛塔·桑蒂尼编并作序，皮埃尔·朱代·德·拉·孔布后记，居伊·菲永和卡洛塔·桑蒂尼译（巴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出版社，2017）。尼采称荷马为"审美独一性的精髓"（第64页）。

由于越入行动具有不可理解、不可解释的性质，我称为之间效应（effet-d'entre）的东西[注11]便起作用了；无疑，这里的强度比别处都更大。我们想知道：帕潘姐妹与她们的女房东之间发生了什么？路易·阿尔都塞与埃莱娜·里特曼之间呢？我们还可以提到拉康：他追问安托万·蒂达尔一首诗中接连出现的"之间"（entre）。[注12]这首诗令他极为感兴趣，当时他正努力更好地理解爱，以及男人与女人之间的间隙；诗中"之间"（entre）的一再弹回，如此有效地表达了这一间隙。[注13]一次越入行动的周围，环绕着一个"魔法圈"；其中的人仿佛被之间效应磁化了，除了向它靠近，别无他法，因为这也涉及他们自己的追问。拉康派也形成一个魔法圈，聚拢那些想知道雅克·拉康与他的事物之间发生了什么的人；那个事物，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是弗洛伊德式的。

[注11] 我在《拉康的场景及其魔法圈》（巴黎，Epel，2018）中介绍了这个之间效应。

[注12] 请参阅让·阿卢什《拉康之爱》（巴黎，Epel，2009）第十五章，可找到拉康对这首诗的引述，以及或许令人意外的、对拉康引诗时一次口误的研究。

[注13] 拉康甚至第二次回到这首诗：继1953年"言语与语言的功能和领域……"之后，又在1972年（"精神分析家的知识"，1972年1月6日）回到它。请见我在让·阿卢什《拉康之爱》（巴黎，Epel，2009）中的评论。

进一步说：当一个孩子撞见父母在床上，而他们正在……时，父母之间发生着什么？所谓“原初场景”，无疑尤其承载着之间效应。1972年3月8日（……或更糟），当拉康准备“揭示”（！）“关于这个大他者正在发生什么”时，他可能想到了这一点；那时，这是他自己的大他者。他先说“大他者是性伴侣这一对的大他者”，即便这个大他者，是人并不与之发生性享乐（jouir）的那个大他者。这两项陈述怎样调和？我看不到其他办法，只能区分两种不同的性的分析论：大他者被性化了，却没有发生性享乐。这一张力要求一个回应，甚至一项发明：无外乎一个对大他者的新定义。拉康：“因此，大他者，你要好好明白这一点（！），是一个之间（Entre）：性关系所涉及的那个之间，但它被移置了，恰恰为了　　s’Autreposer”。[注14][注]（由动词entreposer——存放、保管、储存——转到这个由autre与poser组成、以反身动词形式出现的新词。）这个大他者介入其间、干预、插入——这便产生了一个效应：之间效应（effet-d’entre）。[注15]拉康多次回到这个“之间”。[注16]1974年10月9日[注17]，他说自己始终无法达成“被我们性别化为男性的言说存在（parlêtres），与被我们性别化为女人的言说存在之间的关系的解决”。[注18]一年后，1975年10月14日，他在讲述自己的“tentrisme”（他的之间，他的情色）时，又加入了这个“之间”，甚至用“je　　t’entre”〔“我之间 / 进入你”〕这句话，粗暴地对待、变形了法语。此时，之间变得至关重要：不仅是因为缺少某种能将男人与女人连接起来的东西（尤其是阳具），使性关系不存在这一断言成为可

能；也因为之间处在博罗米结的核心："在那里存在的三个，是作为纯粹的一致性起作用的：也就是说，唯有保持在一起，它们才一致"（1974年12月17日）。

[注14] 雅克·拉康，《……或更糟》（…ou pire），1972年3月8日。

[注15] 两种性的分析论之间的某种连接，也随之出现。这个大他者 / 之间〔Autre/Entre〕，"在隐退、在不存在时……成为关系被写下的场所"。这不可能是在写性关系，因此这里的"被写下"，只能指"性化公式"（雅克·拉康，《再来》（Encore），1973年3月13日课次）。这些公式将阳具设想为函数，即"阳具函数"；而我们这里所处理的，是在不存在的性关系这一问题中，它的缺席。由此，上述引文的"移置"，可以被读作指向一个过渡、一种变换，以及将缺席的阳具转为运作着的阳具函数。如果想断言性关系不存在，却又不忽略性行为确实发生这一事实，那么，这种移置是必要的。性关系中阳具的缺乏，指向第二种性的分析论；而阳具被当作阳具函数时，成为函数的阳具在第一种性的分析论中发挥某种作用。大他者同样如此：尽管不存在，它却并非不活动。

[注16] 乔治-亨利·梅勒诺特记录了拉康对d'entre的各次提及（《隐姓埋名的弗洛伊德：与摩西共舞》（Freud incognito. Danse avec Moïse），巴黎，Epel，2017，第197—209页）。

[注17] 雅克·拉康，"罗马记者招待会"（Conférence de presse à Rome），1974（《并非全部的拉康》（Pas-tout Lacan），https://ecole-lacanienne.net/bibliolacan/pas-tout-lacan）。

[注18] 注意这一不对称：是"女人"（woman），而不是在"男性"（male）之后我们本会期待的"女性"（female）。

[注] s'Autreposer 以 autre（他者）替换 entreposer（存放）中的 entre（之间），并保留 poser（放置）及反身形式。中文保留新词，不以"自我定位"等概念替换。je t'entre 也故意把 entre 用作动词；底本的"I between/enter you"提示"之间 / 进入"的叠合。

对于所有转向玛丽-泰蕾兹·布斯凯谋杀案的人，这不仅是解释谋杀的问题，也涉及其极端暴力唤起的震惊；人们立即意识到，这一暴力已经发生了——某种额外的暴力。在杜拉斯式的这一说法出现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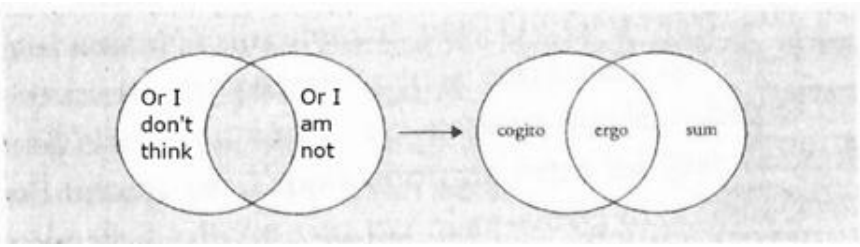
让-马克·泰奥莱尔已经是杜拉斯式的了；他写道（我们读到），对所有人来说，问题与其说是拉比尤这个丈夫被杀，不如说是尸体被肢解和散布。同样，在《英国情人》中，出现的问题不只是杀人的行动，还有受害者尸体的切割（“屠宰”），然后是头的消失，最后是头所在的地方。与克里斯蒂娜·帕潘的陈述“我的罪行太大了，我说不出它是什么”[注19]相呼应的，是克莱尔·拉纳的陈述：“那件事对我来说做起来太难了，我没法想它”（第165页）。一种不思考、没有思想的做。

> [注19] 弗朗西斯·迪普雷，《越入行动的“解决”：帕潘姐妹的双重杀人案》（La “Solution” du passage à l’acte. Le double crime des sœurs Papin）（图卢兹，Érès，1984，可于Epel出版社网站获取）。

这些话将越入行动与史诗性跃迁区分开来。我们已经看到，圣战者用若干词语来思考自己的行动：对行动的思考是行动实施的一部分，是它所必需的。相反，越入行动免除了所有思想，更不用说所有能够被思考的思想。

“要么我不思考，要么我不在”：拉康

越入行动 / 史诗性跃迁的区分，与一个二择相互参照。按照拉康的说法，被划杠的主体$（从一开始就被这个制约着他的选择划杠）被困在其中，没有任何有效的逃脱可能。这个二择就是前面提到的“异化之‘或’（vel）”；拉康将它称为“必需的”“被迫的”“不可避免的”：“要么我不思考，要么我不在。”先前（第二章，第46—47页），我们提出了对异化之“或”的一种初步接近：依照拉康怎样提出它，又怎样探究和运用它。拉康借用奥古斯都·德摩根式的图式，表现了他对被否定化的我思（cogito）的肢解（1967年1月18日）。



两个维恩图，箭头由第一个指向第二个。第一个由两个重叠圆构成，标为“或：我不思考”与“或：我不在”。第二个也有两个重叠圆，标为 cogito（我思）与 sum（我在），重叠部分标为 ergo（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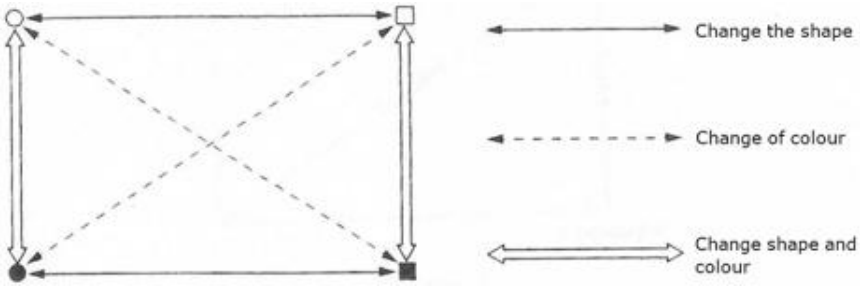
图3.2　图式1。

图式1意在表示德摩根定律之一：两个被否定的集合（对“我思考”的否定和对“我在”的否定）的并集，等于它们交集的否定：¬ A v ¬ B ~ ¬ (A & B)。就等价关系而言，中间的箭头应当表示双向。

拉康还制作过其他若干图式：信息更加丰富，也许过于充满信息；它们说明异化之“或”的制约怎样向主体呈现，其中也有一些不规则之处（尚在进行中的工作？）。他在1966年12月14日指明了这一点。灵感来自他读过的一篇文章：1966年11月发表于《现代》第246期的“数学中结构一词的意义”。[注20]拉康没有提到作者马克·巴尔比，却说这篇文章“可以扩展，但在所选择的简短形式中，它极其细致地咀嚼这些问题：二十四页，我们一步一步地往下走。尽管如此，对那些喜欢长篇的人，这是一次有用的练习；这一练习可以软化你们对这个克莱因群的态度”。在这篇文章对克莱因群的若干种书写中，我们选取这一种：

它呈现一个对象——白色圆圈——，通过修改其两项特征，即形状（圆或方）与颜色（黑或白），产生另三个对象。克莱因群在它们之间建立某些联系（准确地说，三种联系）：

> [注20] 也许值得知道这篇文章的撰稿者名单：马克·巴尔比之外，有让·普永、A.J. 格雷马斯、莫里斯·戈德利耶、皮埃尔·普尔迪厄（Pierre Pourdieu）、皮埃尔·马舍雷和雅克·埃尔曼。拉康带着一点轻蔑说：“总之，这篇文章里没什么东西。”



一个正方形的四个顶点以实线、虚线和双向箭头相连。左上和左下顶点是圆形，右上和右下是方形。左下与右下的图形被涂满。

图3.3　图式2。

现在，无论人们曾提出什么，拉康从未像数学家那样使用克莱因群的数学性质。[注21]弗朗索瓦·巴尔梅斯在著作中讨论异化之“或”的那些页里[注22]，指出了这一点。他作出如下观察。（1）克莱因群的每项操作都是对合的（重复执行时，每项操作都会取消自身）；拉康的情况却不同，他那里的箭头只有一个方向。（2）克莱因群的每个顶点都能是出发点和到达点；在拉康那里，只有一个顶点能成为起始点。（3）克莱因群的另一条定律要求，一项操作的结果，必须等同于另外两项操作的乘积（例如，从白色方形到黑色圆形，你既可以直接沿横贯线抵达，也可以用两项操作，经由黑色方形或白色圆形抵达）；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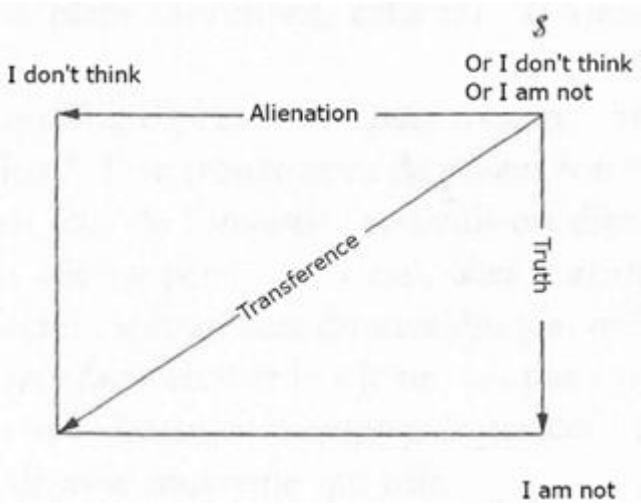
面我们将验证，拉康的图式不允许应用这条定律（例如，左边的竖线和底部的横线，都不是双向的）。（4）拉康的大多数图式只包括一条对角线，或者区分两条对角线：一条实线、一条虚线。由这些观察，巴尔梅斯得出结论："图解转向了图式，方向与内容的考虑以逻辑模型为基础。"[注23]还要注意，名称也有变化：有时我们读到"图式"，有时是"四边形"或"四面体"，更少见的是"装置"；这些名称似乎都没有受到偏爱，也没有最终取得优越地位。巴尔梅斯选了"四边形"；我将坚持用三个名称中最中性的"图式"。[注24]因此，在延伸拉康这种不怎么正统地"处理"克莱因群的方式时，我们似乎不想比国王更加保王，也不想比他更富于发明。我们先从下列图式的选择开始；这一选择部分带有任意性（《精神分析行动》，1968年1月17日课次）：

[注21] 克莱因群在"幻想的逻辑"（La Logique du fantasme）中被提到；那是1966—1967年研讨班的一篇书面报告（雅克·拉康，《其他文集》，巴黎，瑟伊出版社，2001，第323—328页），没有清楚地提到拉康怎样使用它，也几乎没有关切这个群的逻辑，只有一句不显眼的标示（1968年1月24日）：他的图式显然是"克莱因群那一类的"。

[注22] 弗朗索瓦·巴尔梅斯，《结构、逻辑、异化：精神分析研究》（Structure, logique, aliénation. Recherches en psychanalyse）（图卢兹，Érès，2011，第103—126页，题为"四边形"的一章）。

[注23] 弗朗索瓦·巴尔梅斯，《结构、逻辑、异化：精神分析研究》（图卢兹，Érès，2011，第130页）。巴尔梅斯也写道（同页），拉康对克莱因群结构的使用，是一种拼装（bricolage）。"内容对形式的优先性，禁止一切形式化的使用，一切盲目的计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并非绝对如此。

[注24] 拉康对四种话语的书写，也包括四个项和四个位置，有时呈现得让人想到异化之"或"的图式的呈现（1970年6月17日或1971年3月17日研讨班）。我们既不能承认，也不能宣称，这一相似是"偶然的"，或每一种情形中在各项之间建立的连接，都指向同样的形式制约。另有一点也很有趣：住在异化之"或"图式右上方的被划杠主体$，在分析家话语中也占据相同位置。



一个长方形，四个顶点带有标签，并以箭头连接。

图3.4的详细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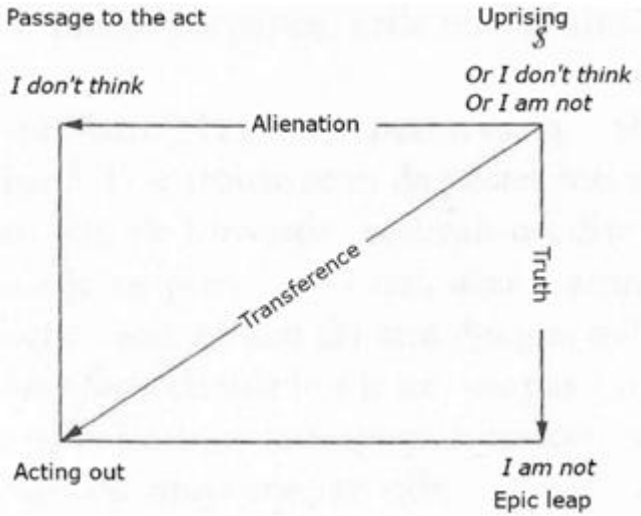
左上顶点标为“我不思考”（I do not think），右下顶点标为“我不在”（I am not）。右上包含两个标签：“或：我不思考”与“或：我不在”。由右上指向左上的水平箭头标为“异化”。由右上指向右下的竖直箭头标为“真理”。由右上指向左下的对角箭头标为“转移”。右上顶点上方有一个类似美元符号的符号。

图3.4　图式3。

我选择这个图式，是由于它相对简单。[注25]不过，我的选择可能受到批评，因为我决定不研究这一系列中的所有图式；这一选择更令人遗憾，是因为拉康的标示在不同图式之间发生变化。比如，“小 a”（petit a）被写在左下或右上（1968年1月17日的一次课次，AFI〔国际弗洛伊

德协会〕转录本），或写在右下（3月20日，同一转录本）。或者，将“我不思考”连向“我不在”的斜线，被认作“被称作分析者任务的那项任务”的线，或阉割的线（1968年2月21日），或精神分析行动的线（1968年3月20日）；在后一情形中，它不再指向分析者，而是指向分析家。而且，由于借助听众笔记的转录者，拉康的这些不规则之处又被加剧了：那些笔记有时不完整，或有错误。因此，我作出了这个选择，几乎没有其他东西来保证这一选择的启发性。人们若想找一个依照拉康本人使用和变换的同一模型建构的图式，将徒劳无功。

> [注25] 雅克·拉康，《精神分析行动》研讨班，1968年1月17日课次。此处呈现的图式，出自这期研讨班极出色的批校版，可从拉康学派网站获取。



一个长方形，顶点带有标签，箭头标示“异化”“真理”与“转移”；另有“越入行动”“史诗性跃迁”与“起而反抗”等标签。

图3.5的详细说明

一个长方形，四个顶点带有标签。左上顶点标为“我不思考、越入行动”。右下标为“我不在、史诗性跃迁”。右上顶点有两个标签：“或：我不思考”与“或：我不在”，以及“起而反抗”和一个类似美元符号的符号。左下顶点标为“行动展示”（acting out）。右上指向左上的水平箭头标为“异化”。右上指向右下的竖直箭头标为“真理”。右上指向左下的对角箭头标为“转移”。

图3.5　图式4。

我作了三次“闯入式介入”。（1）“起而反抗”在出发处，即右上方，拉康将它放置的地方。主体被迫选择两项之一：要么朝向“我不思考”，要么朝向“我不在”。这样的选择，是对我思（cogito）在“我思考”与“我在”之间建立的联系说不。它不可能是一个无意识欲望的选择，更不可能是那种被看作大他者的欲望的欲望的选择。它只能是一个意图的结果。受到拉康的提醒，我们可能会对这里出现的两个词感到惊讶：“起而反抗”与“意志”。我在《拉康的场景及其魔法圈》中引入了它们，你可以参阅这部作品。[注26]

> [注26] 让·阿卢什，《拉康的场景及其魔法圈：疯人起而反抗》（La Scène lacanienne et son cercle magique: Des fous se soulèvent）（巴黎，Epel，2017）。

（2）“行动展示”被放到了拉康曾将它写入的位置（代替“我不思考”），因为它仍然被界定为“没有分析的转移”（弗洛伊德的agieren）。（3）“行动展示”的移位留下一个未被占据的位置，我于是能够将史诗性跃迁放在这里。

主体一开始就被划杠了，并没有得到不作选择的选择。[注27]主体必须承担自己的起而反抗，把它投入运作，或者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对它进行投注：要么投注在“我不思考”的位置上——如拉康所言，这个位置刻画了越入行动[注28]——，要么投注在史诗性跃迁的位置上；在后者，由于他思考，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他选择了“我不在”（由此，史诗性跃迁在图式4中处在这个位置）。[注29]在这里，转移表现为一种两者之间，一种中间道路，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想象自己可以免于处理异化之“或”。当一次分析结束时，那个曾为转移提供支撑的“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形象（不一定是分析家）被罢黜了，转移便回到异化之“或”。

> [注27] “要钱还是要命？”这一选择也是如此，拉康广泛讨论过它。不过，这两组二择并不相同。

> [注28] “实际上，异化作为对我不思考的不可避免的选择，与重复作为对越入行动的不可避免的选择之间，存在一种对应。的确，另一个不可能被选择的项，是与我不在关联的行动展示”（《精神分析行动》研讨班，1968年2月28日课次）。

> [注29] 这里，我赞同弗朗索瓦・巴尔梅斯的阅读：按照他的阅读，选择“我不在”的推论是“我思考”；反过来，“我不思考”的推论则是“我在”。

史诗性跃迁因此是一种思考着的跃迁；与它相反，越入行动若呈现为一个巨大而令人入迷的问号，那么，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启动的程序便几乎是不言而喻的：详尽研究案件的全部资料，来产生一种解释，或者更好，一种建构（弗洛伊德），让越入行动变得有意义，乃至可以理解。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方式：总是找到一个随时可用的答案，从而避免异化之“或”在每个人身上的效应。然而，单是这种随手可取性，本身就应当让人对它的价值有所保留。或者说得更精确些：若干答案将出现，但没有哪一个会占据优势到足以消除其他建构（帕潘姐妹的案件也在这里举例说明了这一点）。

这种最终的、摇摆不定的局面，是促使人们尝试解释道路以外的某种东西的因素之一。解释这条路被认为能够（但并非总能）将越入行动纳入史诗性跃迁的范围。我们不忽略这条道路，而是沿着它走到显露失败之处；对于《英国情人》，我们将始终记住史诗性跃迁 / 越入行动的区分，以断言二者都不可化约。而且，正是将它们相互区分，才让我们能够追问二者彼此相比的相互作用：一种迄今我们才刚刚瞥见的相互作用。

一场哀悼

那么：玛丽-泰蕾兹的头消失了。这件事很早就被提到，但故事却让它远离一切言语交换；这使头的消失更加显著，它因此以沉默的方式极其在场。被追问、要求就此解释时，克莱尔·拉纳最后零星透露出一点信息："我使她消失了"（她说的是自己的罪行），"就像一个本应拥有她整个头的人"（第165页）。一处两义在回响、在推理〔résonne, raisonne〕[注]：那么，到底是谁本应拥有她整个头？克莱尔（人们在想，她是不是疯了）？还是玛丽-泰蕾兹（她确确实实失去了头）？无法决定。不过，当克莱尔同意说出下面这些话时，谁也不能断言她丢了头：

> [注] 法语 résonne（回响）与 raisonne（推理）同音；底本并列 resonates, reasons，中文保留两种动作并附词形。"拥有整个头"既可指头部完整，也可涉及神智是否完整；作者在此明确拒绝决定指称。

> 至于头，我做了必需做的事。我很费劲。甚至比其余的事更费劲。我不知道会不会说出头在哪里……头是我最后处理的，在一个夜晚。等一切都结束了。我做了人们通常做的事。我找了很久，不知

> 道该拿头怎么办。我什么也没想出来。于是我去了巴黎。我在奥尔良门站下车，一直走，直到我能找到该怎么办。我找到了该怎么办。
>
> （第138—139页）

后来（第184页），她提供了关于自己拿头做了什么的细节，但始终没有说头被放在哪里：

> 我为它 / 她举行了一次葬礼〔在法语中，“头”是阴性，因此这里的代词elle既可以指头，也可以指受害者〕。〔又一处两义？Elle，头？是的，无疑如此。但也可以是elle，玛丽- 泰蕾兹。〕我还说了我为死者的祷词。我找不到其他办法，尽管卡奥尔职员把我同上帝分开了，而我再也没找回他〔找回谁？卡奥尔职员？上帝？〕。

所以，是一场哀悼仪式，不过没有观众（publikum），没有“魔法圈”[注30]——至少在当时没有，因为在描述了这个仪式后，杜拉斯身边就有了她的读者，他们一起形成一个魔法圈。其宗教色彩不容怀疑，即便我们起初没有看见，它在小说一开头（第26页）就已被清楚地宣告。

> [注30] 参阅《拉康的场景及其魔法圈》（巴黎，Epel，2018）第一章。

此时克莱尔・拉纳重新与上帝建立联系，使她回到了卡奥尔职员那里。[注31]她用一生爱着这个“出众的男人”；他曾爱过她两年（“我们疯狂地彼此相爱”）。他为了她离开妻子，而她为了他放弃上帝，甚至对

她来说，他取代了上帝的位置（第152页）。我们想到玛格丽特·安齐厄，拉康的艾梅；她在小说《诋毁者》（Le Détracteur）中写下这首诗：

[注31] 他是她的舅舅，她母亲最小的弟弟，与她同岁（第93页）。“他们从小就认识”（第117页）。

牵起我的手，我将它给你〔原诗：Prenez ma main je vous la donne〕

因为自从我见到了你〔原诗：Car depuis que je vous ai vu〕

我爱上帝已不同往昔〔原诗：Je n’aime plus Dieu de même〕

我更爱他，我更少爱他〔原诗：Je l’aime mieux, je l’aime moins〕

我爱的是你还是他〔原诗：Est-ce vous ou bien lui que j’aime〕

无疑你们是同一个〔原诗：Sans doute vous êtes le même〕

牵起我的手，我将它给你

因为自从我见到了你

我爱上帝已不同往昔

我更爱他，我更少爱他

我爱的是你还是他

无疑你们是同一个[注32]。

[注32] 引自雅克·拉康，《论偏执狂精神病及其与人格的关系》（De la psychose paranoïaqu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ersonnalité）（1932）（巴黎，瑟伊出版社，1975，第183—184页）。

对玛格丽特·安齐厄而言，上帝与她的平庸诗人（poétereau）是“同一个”，尽管这一认同中仍留有疑问；克莱尔·拉纳则让后者取代了前者。

是他把我同上帝分开了。上帝之后，我只看见他。我只听他；他是我的一切，有一天，我不再有上帝，只有他一个。

（第153页）

这一切持续到这样一个时刻：她发觉卡奥尔职员刚刚对她撒了谎，替代便崩塌了。不过，这一崩塌并没有导致她回归上帝。她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第95页）。

如同上帝一样，卡奥尔职员没有属于他自己的名字；他仅仅由其职能——卡奥尔职员——来指称。这让我们明白：直到最后，克莱尔·拉纳仍然保持着一个愿望，盼他能成为上帝的替代物；一个让她失去了上帝的替代物。

在哀悼仪式的时刻，克莱尔·拉纳明确地重新与上帝建立联系；卡奥尔职员和上帝——前者从后者那里继承了某些特征——此时都在她心中。卡奥尔职员在谋杀和散布尸块期间，也并非不在场。由于这最后一个特征没有任何显而易见之处，理应为它提供依据。

所谓“卡奥尔职员”，是哪一个机构或企业的职员？他是警察吗，正如盘问罗贝尔·拉米的警方调查员所确认的那样（第63页）？那么，“警方的”这个限定，在那不断将他称为“卡奥尔职员”的小说中，就会被永远重复下去；这个限定没有在《〈英国情人〉的戏剧》中沿用。每次只需在“卡奥尔职员”上加一个“警方的”，于是写成“卡奥尔的警方的职员”（连续两个属格——福楼拜曾追剿这样的接续），便足以给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文体致命一击。他是邮政、电报和电话部门的职员？银行的职员？我会提出，他是SNCF〔Société nationale de Chemins de fer——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职员。于是，许多事情就各归其位了。不过，这不意味着一切都能理解；相反，对其职业身份的这一指明，使克莱尔·拉纳的两个行动愈发奇怪：一边是谋杀及随后发生的事，另一边是哀悼仪式。我们不能将哀悼仪式，与肢解尸体、继而将尸块从高架桥护墙上抛下的行动，放在同一面旗帜之下。

这根线太粗了，不能明说。[注]埃马纽埃尔·芬基尔从其电影《痛苦》（La Douleur）的首次放映出来时，同意接受《世界报》访谈（2018年1月24日）。以下是他结束时的话：

> [注] 底本确作“线太粗，不能明说”，但粗线通常暗示线索明显，这里的因果关系不透明。尚未取得阿卢什法文原句，不能确定 explicit 的方向是否失当，故保留并标明，不自行改成“不能暗示”或相反命题。

> 拍电影时，我厌恶杜拉斯。后来，我又被她重新征服。她的线太粗了。她让我们看见，她在撒谎。她暴露自己的弱点，以便更好地向我们展示真理。

这里，我们将绕道《塞纳- 瓦兹的高架桥》，借此辨识这根线。在该剧中，杀害聋哑的泰蕾兹的克莱尔和马塞尔·拉贡，是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退休职员。当然，仅凭这个最初线索，本身证明不了什么……如果没有前面提过的那则犯罪新闻的话：那则新闻启发了这部戏，杜拉斯这样呈现它：

> 这些人叫拉比尤。他曾是军人，已经退役。她从未有过固定职业。他们有两个孩子，两个女儿。罪行由拉比尤的妻子实施，针对的是她丈夫。一天晚上，他正在读报，她用那把劈柴用的泥瓦锤砸碎了他的头骨。犯罪后，阿梅莉·拉比尤花了几个夜晚肢解尸体。然后，在夜里，她把尸块抛到从铺石山高架桥下经过的货运列车上，每晚每列车扔一块。[注33]

[注33] 玛格丽特·杜拉斯为《〈英国情人〉的戏剧》的一次制作所写的文本，由艾哈迈德·马达尼执导（theatre-contemporain.net）。

《高架桥》把新闻报道中的军人，变为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职员。在“七星文库”关于这部戏的说明文章中，我们读到（引自杜拉斯），这个女人“把尸块从高架桥上抛到经过奥尔日河畔萨维尼的火车上；它们被发现于里尔、波尔多和卡奥尔”。[注34]卡奥尔车站：按照我的猜想，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那位职员就在这里工作。这部戏相较于新闻还有另一项重要改动：“拉比尤”（Rabilloux）变成“拉贡”（Ragond）；除了其他能指，这让我们听见“车厢”（wagon）。

[注34] 玛格丽特·杜拉斯，《全集》，第一卷（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2011，第1574页〔说明〕）。

我们将把这一猜想继续推下去：它可以被认作妄想性的（delirant）（源自拉丁语delirare：偏离犁沟），取塞里厄与卡普格拉《推理性疯狂》（Les Folies raisonnantes）中的意义。高架桥跨越一条铁路。这一交叉点，恰好位于一组道岔之上的可能性很小：这些道岔将列车送往不同方向，借助铁路交汇点，让人们能在《英国情人》中，将维奥尔讷镇确定为谋杀发生的地点。于是，我们转向更可信的情况：高架桥位于一条双向铁轨之上，正如我们能在铺石山高架桥照片中看到的。只有两个可能的方向：在一个方向上，列车经过高架桥下后，由铁路交汇点发往不同目的地；另一个方向上，列车只被导往单一方向。哪个方向？经过奥尔日河畔萨维尼的列车，朝向的是卡奥尔。

这项弗洛伊德- 福尔摩斯式的调查，还要添上一个细节。法国没有哪个城市或小镇叫“维奥尔讷”（Viorne）。不过，“Viorne”或“Viosne”，是瓦兹河一条支流的名称；瓦兹河流入塞纳河。对想把人体碎块送往远方的人来说，有两个可能性：河流或货运列车。克莱尔·拉纳：“我没想到高架桥。我朝河走去，从它下面经过。”列车这一选择，并没有被事先想到或预见：当她第一次背负一块或几块尸体碎块行走时，列车的念头才来到克莱尔·拉纳脑中，像一个忽然冒出的念头（Einfall）。

尸块上用木炭（地下室里很容易找到）写了两个词组成的题记：“阿方索”和“卡奥尔”（第47页）。一个名字、一个地点：这是一个邮寄地址；如果我的猜想为真，即卡奥尔职员在卡奥尔的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车站工作，那么这个地址看起来并不缺什么。有些尸块在其他目的地被发现，并不意味着卡奥尔不是它们预定的目的地。尸块可说是信件（克莱尔写过很多信）；循着拉康，我们可以认出，它们注定要去某

个地方、到某个人那里。哪里？卡奥尔。某个人？卡奥尔职员，他的工作将他安置在卡奥尔的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车站。他永远是她唯一的、持久的、没有得到回应的伟大爱情。

这一猜想的意义在于，它为分析克莱尔·拉纳的行动提供了新信息（我们一开始就区分了两个：史诗性跃迁与越入行动）。在其他方面之外，它们是让一封信抵达卡奥尔职员那里而选择的途径。选择的……却是徒劳，因为她不知道，卡奥尔职员像尼采的上帝一样，已经死了。

这封信是一封情书，诉说肉身之爱；克莱尔·拉纳知道，这种爱既活着，又被排除在外。[注35][注]她无法习惯它：一段已经确定失去的爱依然存活，尽管在巴黎最后一次约会时，是她自己主动从卡奥尔职员的怀抱中挣脱出来。[注36]卡奥尔职员在货运车厢里发现一块肉，上面写着“卡奥尔”和“阿方索”两个词时，人们邀请他知道什么？倘若他活着，正如她相信的那样，而且具有某种格外敏锐的感知力，正如她认为的那样，他就会从“卡奥尔”读到对昔日爱情的提醒——那时，他是这爱情的对象——，从“阿方索”读到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显露为无法替代他。然而，这封信没有抵达目的地：它落到警察手里。谁读过“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班”，就不会不知道，警察很难是信的最终

目的地。《英国情人》的读者（不只是玛格丽特·杜拉斯）是否有责任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上帝也缺席了——，让这封信在此找到它真正的目的地？

> [注35] 取这个词的通常意义。

> [注36] 经典的情形：许多已分离、往往已分离很久的恋人，感到有必要再见对方一次，双方都不向对方期待什么。

> [注] 原注35明确限定 foreclosed 为通常词义，因此正文保留“被排除在外”，不改为精神病结构中的技术术语“拒斥”。紧接的“已经确定失去的爱依然存活”提示：爱情仍存活，却已失去实现的可能；这是由相邻语境提示的读法，具体原语仍待核实。

这种爱在爱人被拒绝之后仍然持续，因而可称为“纯粹的爱”；这封信能对它产生什么效应？这封信是一个故事中达成结论的时刻：这是先爱上帝、再爱一个男人的故事，而这个男人最终显露为上帝的非替代物。纯粹的爱，能够选择一个人类存在吗？我们将会问：与其把这封信的寄送看作越入行动的一部分，是否不如在其中看见史诗性跃迁的一项特有特征。的确，这封信在一个爱情故事、一段叙事中占据其位置，尽管寄送它的意义与方式仍然有部分晦暗不明。

因此，我们被引向这样的区分：一边，寄送这封信，以及对头的特殊处理，属于史诗性跃迁；另一边，杀害玛丽-泰蕾兹，以及对她尸体施加的暴力，属于越入行动。寄送信件与埋葬头，是同一个既情色又灵性的行动的部分。归根结底，这封信是写给上帝的：写给那个曾经变为人、变为卡奥尔职员的上帝——的确，与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不同——；在做出她的行动（既是越入行动，也是史诗性跃迁）后，克莱尔·拉纳能够再次向这个上帝祈祷，因为他让一场哀悼仪式对她成为可能。

这封信前来唤回对上帝的爱；克莱尔·拉纳投入哀悼仪式，便放弃了这份爱。这个头不只是玛丽-泰蕾兹的头，也是克莱尔·拉纳的头：

> 在花园里，你知道，我头顶上有一个铅盖……大多数时候，念头从上面落到我身上。它们留在铅盖上，到处爬来爬去，那实在太痛苦了，以至于有好几次，我想把〔我的头〕取下来，好不再受苦。
>
> （第160页）

她大多数时间都独自待在这个花园里。在这里，一种联系早已建立：一边是那颗爬满了从上方落下的念头的头——这些思想，严格说来并非她自己的思想[注37]，而是令人不安、无法控制、不受欢迎的思想——，另一边是某人的死亡，这一次是她自己的死亡。“在花园里，你是谁？”——“我死后留下来的那一个”（第151页）。的确，自从卡奥尔职员的谎言剥夺了他的神性之后，克莱尔·拉纳便对爱情死了，对一切生命死了。但将死去的会是玛丽-泰蕾兹，因为，如果克莱尔这次真杀死了自己，我们正在处理的这一切——既然全都涉及她——就不可能发生。哀悼仪式解决了花园的经验。她终于感到平静（第139页）。

> [注37] 受这类思想的气息所制约时，最好像一只中国猴子那样行事（一点技术方面的建议）。

我为自己受到诸神启发、为诸神所占据而惊讶（这一切的责任都归于亲爱的玛格丽特·多纳迪厄——她的娘家姓[注38]）；现在，我可以通过为她（elle，头；elle，玛丽-泰蕾兹·布斯凯；elle，克莱尔·拉纳）构想一场哀悼仪式，指明克莱尔·拉纳把头处置在何处。[注]哪里？她说：“我为它举行了一整场葬礼”（第184页）。这让人想到，她

为头挖了一个墓穴，放入洞中，然后用土盖住。在巴黎？在沥青之下？“葬礼”（burial）的含义更广：“给予一个安葬之所（sépulture）”，或者“先于并伴随埋葬的所有仪式”（《罗贝尔词典》）。克莱尔·拉纳走到了塞纳河岸，圣米歇尔桥跨过的地方（从奥尔良门到塞纳河的最短路线）。四项汇合的资料支撑这个猜想，尽管它们没有使之成为确定的结论。（1）她从奥尔良门抵达巴黎，然后走向（正如她说的）河流（正如她没有说的）。（2）她曾在池塘中尝试自杀：水再次出现了，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她自己也是这一哀悼仪式的对象。（3）她最初想过在河里处理掉玛丽-泰蕾兹的身体。（4）她说过害怕被活埋，由此便选择了水。

> [注38] 杜拉斯的创作，无论怎样广泛、多样，会不会是一封写给上帝的信？我们会不会仍然仅仅因为她与上帝之间发生了什么这一问题始终相关，才对它感兴趣？“Donnadieu”这个名字让我们听见三样东西：“给上帝的礼物”〔un don——礼物，à Dieu——给上帝〕；又有“Dona Dieu”〔Dona——女人〕，上帝的妻子或情人；或者“femme-Dieu”，女上帝〔femme——女性；Dieu——上帝〕。当上帝死了，或更好，无意识了（拉康），她除了以另一个名字写作，还能做什么？不过，她并没有割断两个名字之间的联系；它们被一根线连在一起：第一个字母〔“D”〕，也是Dieu〔上帝〕这一名称的第一个字母。这里，我们发现了上帝那不显眼却决定性的在场的回声；讨论路易·阿尔都塞时，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见第二章，原版第67—68页、本译本第000—000页〔底本保留的占位页码〕）。

> [注] 法语 elle 是阴性第三人称，既可指女性，也可指阴性名词“头”；这里反复使用同一词形，让头、受害者和克莱尔的指称叠合。中文“她 / 它”无法原样保留，故附法词。构想仪式的是叙述者“我”；下文也明确称其为猜想，不能把这一重建当作小说已确认的事实。

一次未完成的史诗性跃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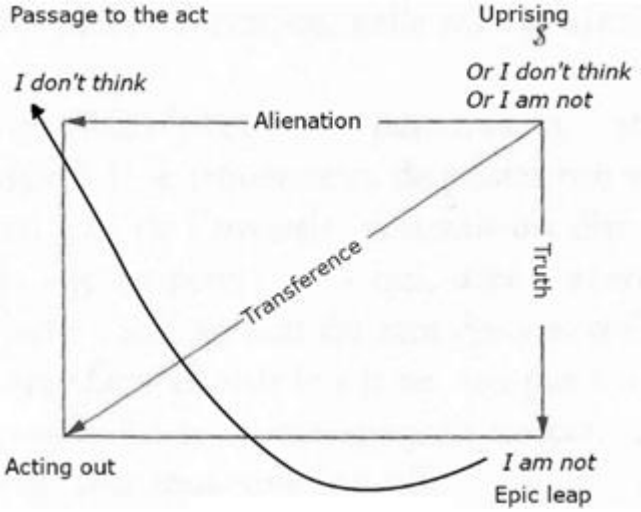
克莱尔·拉纳平静下来了；若没有处在她的史诗性跃迁核心的某个空洞，她就不可能如此：

> 一个疯女人说什么，都无关紧要。那么，既然我说的都无关紧要，为什么问我头在哪里？也许我已经不知道把它放在哪里了；也许我忘了准确的地方？一点提示就够了，哪怕模糊。一个词。森林。河岸。——可为什么呢？——好奇。——那么，在其他成千上万个词中，只有这个词要紧？你以为我会让自己说出这个词吗？好让其他人被活埋，让我也在他们之中，被活埋在疯人院里？
>
> （第192页）

一个指明地点的词的缺席，在这里显露为谜团永远不能被解决的条件，因此也是叙事无限次重现的条件。克莱尔·拉纳承认想到过这个词（其方式并不比任何其他人更加笨拙、更满是孔洞）；虽然它属于一个“我不在”，但正是在这一缺席之中——在这个既是语言性的（lalangue）又是空间化的洞中（大他者作为场所）——，她的存在、她的言说存在（parlêtre）被维系着。[注]由此，史诗性跃迁的一点走到了刻画越入行动的“我不思考”之前。当我沿着《英国情人》这根线走下去时，我没有想起，拉康曾在他的一个四边图式上画过这条路：一条路——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我们不会一步一步地走，而会一次跃过。[注39]

> [注39] 雅克·拉康，《精神分析行动》研讨班，1968年1月17日课次（批校版，图式由听众笔记重建）。国际拉康协会〔ALI〕转录本，也提到了这个跳跃的图画〔拉康研讨班的两个不同来源〕。

> [注] 底本在 linguistic 后保留拉康词语 lalangue，中文保留这一词形；本段没有将它归约为一般语言学，也没有把“我不在”与“我不思考”这两个逻辑位置合并为一般的自我消失。



一个长方形，顶点带有标签，箭头标示“异化”“真理”与“转移”。图中表示了“我不在”与“我不思考”之间的连接。

图3.6的详细说明

一个长方形，四个顶点带有标签。左上标为“我不思考、越入行动”。右下标为“我不在、史诗性跃迁”。右上包含“或：我不思考”与“或：我不在”，以及“起而反抗”，后随一个类似美元符号的符号。左下顶点标为“行动展示”。箭头分别标为：“异化”，由右上指向左上；“真理”，由右上指向右下；“转移”，由右上指向左下。一条曲线始于右下顶点，指向左上顶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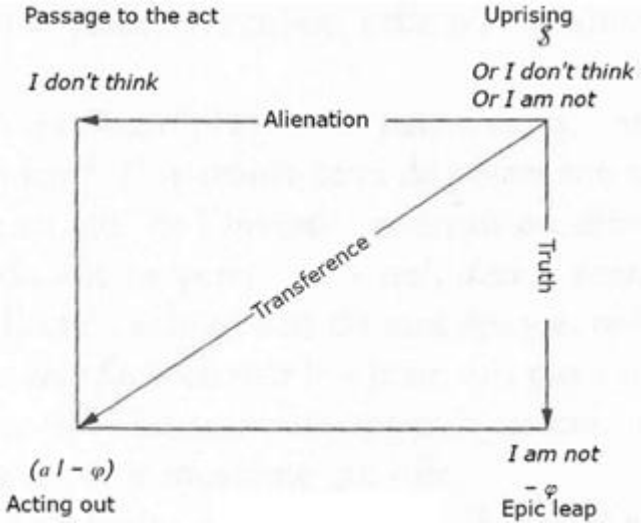
图3.6　图式5。

这里画出了拉康所说的主体向“四面体的某个顶点”作出的“跳跃”。[注40]不过，在《英国情人》面前，我们与其说见到那个从根本上且立刻就被划杠的主体，从“我不在”的位置向“我不思考”的位置逐渐移位，不如说见到了两个不同的位置，主体从它们出发分裂。这两个位置，“我不在”与“我不思考”，彼此都没有被绑定。克莱尔·拉纳不说“那个会要紧的词”；她断言，说出这个词，就会使她成为一个被活埋的人。我们也想知道：看着她维持自己的叙事——她的“我不在”，她的史诗性跃迁——，到底是什么将她留在那里，留在一个特定而无法跨越的门槛前，仿佛她被卡住了。

> [注40] 雅克·拉康，《精神分析行动》研讨班，1968年1月17日课次。

卡住了……在什么之前？我将继续沿着人们或许已经注意到的方式，阅读《英国情人》，借此回答。这一阅读回到拉康的一个图式：因此，是带着书写（avec de l’ecrit）来读[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拉康式的做法，他将它保持到旅程的尽头。1968年1月17日那次课次——我们从中抽取了图式5——的一周之前，他在自己的四边图式上增加了相当大量的标示。我将只保留其中两项（即便有受到过度简化这一指责的风险）：一边，是放在史诗性跃迁被写入之处的 -φ；另一边，是拉康将越入行动定位之处的小 a。

> [注] 英文写 with the story，所附法语 avec de l’ecrit 却是“带着书写 / 写下的东西”，并不等同故事。正文据直接附出的法语改为“书写”；此处又引向图式，不能把书写预先缩窄为故事叙述。



一个长方形，顶点带有标签，箭头标示“异化”“真理”与“转移”。“行动展示”与“史诗性跃迁”附近另有数学表达式标签。

图3.7的详细说明

一个长方形，四个顶点带有标签。左上标为“我不思考、越入行动”。右下标为“我不在、史诗性跃迁、负 phi（－φ）”。右上包含“或：我不思考”与“或：我不在”，以及“起而反抗”，后随一个类似美元符号的符号。左下顶点标为“行动展示、α l minus phi”（α l 减 phi）[注]。箭头分别标为：“异化”，由右上指向左上；“真理”，由右上指向右下；“转移”，由右上指向左下。

> [注] 图示长说明底本逐字写“α l minus phi”，没有说明 l 的符号意义；这里保留其写法，并同时保留原图，不擅自修复公式。

图3.7　图式6。

克莱尔・拉纳害怕自己与自己的话被活埋，这种恐惧迫使她不再沿着她在其中不在的那段叙事继续走下去，无法一直走到认出自己不在——“在－φ曾在之处”。这是我们随拉康称为“阉割”的东西。[注41]不过，我们仍然注意到，另一个拉康式词语去存在（dèsêtre），显著地在她的恐惧中在场。[注]因为这种惧怕，是害怕死亡过早且过度侵入的在场（第一重与第二重死亡），会阻止她将自身的去存在经验感知为并不违逆生命的经验。

> [注41] 人们完全有理由对这种阉割方式感到惊讶；它似乎与对这一词语的一般理解如此不同，甚至相反。

> [注] 底本此处将法语词写作 dèsêtre，通常术语写作 désêtre；此处保留底本词形并按本书术语表译“去存在”。它与克莱尔对活埋的恐惧、第一重 / 第二重死亡的关系，按作者本段的限定保留，不将去存在直接等同于死亡。

现在，这个强加于史诗性跃迁的限度，回应了另一个涉及越入行动的限制。这是两个极为不同的限度，因为史诗性跃迁作内涵指涉，而越入行动作外延指称。

一次未完成的越入行动

凡是形成叙事的“我思考”，都能给越入行动的冲力提供养料；越入行动却是一个“我在……”的显现。这个“我在……”必须用省略号写出，像“我是那个……的人”这样的东西，有待指明。

关于是什么可能把人推向行动，可以收集许多信息；假如有人致力于这项任务，信息的各个片段甚至可以构成一段叙事。玛丽-泰蕾兹・布斯凯从卡奥尔来，为克莱尔・拉纳做管家：她是克莱尔的表亲，与她有血缘关系。[注42]玛丽-泰蕾兹不费任何力气，就取得了女主人地

位：在克莱尔的房子里，她自在地处在自己家中（第107页），而这房子克莱尔从未据为己有。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在担当女主人这一角色上，两人之间没有实际竞争；在阿方索这一点上，也没有竞争：克莱尔很喜欢他（第63页），玛丽-泰蕾兹时不时与他睡觉（第63页），但据说，这“有点像图个方便”（第72页）。还有另一个特征，也以较弱的方式在场：玛丽-泰蕾兹担心丑闻或自杀，“善意地”照看克莱尔，因为“这是必要的”。

> [注42] 她的父亲阿尔弗雷德·布斯凯，是她母亲阿德琳·布斯凯的第八个兄弟（第146—147页）。

玛丽-泰蕾兹的聋哑状况包括三个特征。（1）这并不使她不快乐：她“活泼”（第147页）、“强壮”、“总是心满意足”（第137页）。（2）这并不妨碍她通过读唇，理解所说的一切，以至于“没有什么逃得过她”（第84页）。（3）这使得与她争论成为不可想象的事（第143页）。这三个特征让克莱尔恼火：“我告诉你，我的性格就是无法忍受那些吃得好、睡得好的人”（第148页）。她知道，除了残疾这一点，玛丽-泰蕾兹与阿方索相反，并不“在她这一边……如果她是正常的，她会是另一边的女王”（第177页）。

由此认为这些特征就是越入行动的决定因素，是一个解释性的步骤，我们将克制自己，不走这一步。许多标示更贴近地把握了越入行动，它们来自完全不同的领域。这涉及什么？口腔性；更准确地说，某种口腔性的厌恶，而越入行动结束了它。

假如认真看待最初几次越入行动，人们本可预见到这一点：它们预示着最后将到来的那一次。是的，因为某些越入行动恰好以系列形式出现；最初几次承载着这样的意图：避免一次被认为更严重、因为更暴烈的越入行动发生。按照什么标准？[注43]最后一次越入行动，最终通过死亡为这一系列画上句号。

> [注43] 很有可能，在这种对暴力强度不断增大的连续统的隐含而不确定的参照中，死亡居于最高处。这里介入了现代偏见，至少在西方、且自上帝被宣布死亡以来如此：按照这一偏见，活着是最珍贵的事。并非如此：越入行动与史诗性跃迁，除了其他东西之外，都证明了这一点。

皮埃尔·拉纳说：

> 克莱尔有时做蠢事，那些事本可能是危险的……她富于破坏性，不计后果。她在壁炉里一次烧掉所有报纸。她砸东西，常常是盘子：把它们扔进垃圾桶。或者藏在隐秘的地方，把它们埋在花园里……她也把东西切碎。
>
> （第110页）

随杜拉斯，我们可以把这些越入行动看作一些永远不会被听见的呼唤，或一些准备性的行为，是那个将部分地成为解决办法的行动的草稿。

这涉及“破坏”“埋葬”“切碎”“扔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动词将在后来介入。与“年轻同性恋女人”的两义性Niederkommen相反（在其中，S_1“坠落”为S_2“分娩”代表主体），这些词不是能指，而是在朝向越入行动的配置中，作为另外一些符号起作用。不过，皮埃尔·拉纳的证词强调盘子，克莱尔也几次提到盘子。她说：

> 在一摞盘子的最下面，我看见结婚前三天在卡奥尔买的那些盘子上的图案……又开始了。我知道我将被卷进盘子的思想，卷向那些东西。好了，我受够了，你明白吗？我想让人来把我带走。我渴望三四面墙、一扇铁门、一扇装着栏杆的窗户，让克莱尔·拉纳被关在里面。因此，我打开窗户，打碎盘子，好让人听见我、来把我带走。但突然，她在那里。她看着我打碎盘子。她微笑着，跑去告诉皮埃尔。
>
> （第172页）

因为打碎盘子毕竟不是那么严重（真的吗？），所有这些行动都是要求被关住、被阻止的（没有说出来的）呼吁；但因为没有明说，这些呼吁没有被听到，所以克莱尔·拉纳不知怎样避免最后一次越入行动（不过，她先前的越入行动，证明她曾想过让自己停下来）。相比之下，詹姆斯·弗雷姆到警察局长那里，恳求被送到疯人院，好让自己被关住，由此恰好避免了越入行动（杀害心爱的妻子）。[注44]最后一次越入行动平息了克莱尔·拉纳。其原因与其说要从盘子中寻找，不如说要从盘子里面的东西，某种特定的东西里寻找。如果你愿意，可以说是转喻。什么东西？玛丽-泰蕾兹煮的浇汁肉（第136页）；克莱尔吃着它，却没有说这种食物以及吃它这个行为本身，怎样使她恐惧。

[注44] 詹姆斯·弗雷姆，《疯狂的哲学》（Philosophie de la folie）（1860），戴维·艾伦编并由英语译出（巴黎，Epel，2018）。

这里又有另一个转喻介入：按照它，厨师被赋予了她所烹饪之物最令人倒胃口的特质。有那么一天，克莱尔指着玛丽-泰蕾兹，向丈夫说她看起来像一头“小个头的牛（ox）”[注]（第108页）。后来，关于这个说法，她特意纠正盘问她的人：

> [注] little ox 的 little 可以指体型小，不能直接确定为幼牛。ox 既有泛指牛的用法，也可特指成年阉公牛；这里未核得杜拉斯法文用词，故不进一步确定动物年龄或阉割属性，也不据此添加阉割理论含义。

> “有一天，你跟他说玛丽-泰蕾兹·布斯凯像个动物。”
>
> “不对。我说的是‘一头小个头的牛’。而且是从背后看。那是真的。”
>
> （第140页）

玛丽-泰蕾兹胖，甚至“对这房子来说太胖了”（第150页）。克莱尔评论她吃得多，形容她是“一大团聋了的肉”（第177页）。克莱尔再也无法忍受看玛丽-泰蕾兹吃东西（第147页）。

永远不再有浇汁肉了！杀害玛丽-泰蕾兹·布斯凯，结束了克莱尔·拉纳对浇汁肉的厌恶[注45]；此前她强迫自己默默吃下它。怎样与它了结？她将它从高架桥的护墙上吐出去。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这一次，越入行动用一个词来表达：“吐”（第148页）。拉康的一则评论澄清了这一厌恶：

> [注45] 有时制作这类酱汁会用到血。在谋杀发生前不久，克莱尔·拉纳曾注意到玛丽-泰蕾兹·布斯凯颈上有一抹血；她之所以能看见，是因为后者改变了发型。

对人类物种来说，性是令人强迫性地纠缠的——这是有理由的。它实际上是不正常的，取我所定义的那个意义：没有性关系。弗洛伊德，也就是说，一个个案，获得了这样的功劳：注意到神经症在结构上并非强迫性的，而在其根基上是癔症性的。也就是说，它与没有性关系这一事实相联系，与有一些人对此感到厌恶这一事实相联系；这是一个符号，一个正面的符号：这让他们呕吐。[注46]〔英译者注：阿卢什指出，弗洛伊德发表了少数几个个案，其中没有哪个足以可信地作为概括的根据；这与那些小病例片段完全不同，后者被认为能教人如何用一条适用于所有人的一般规则，治疗各种所谓的精神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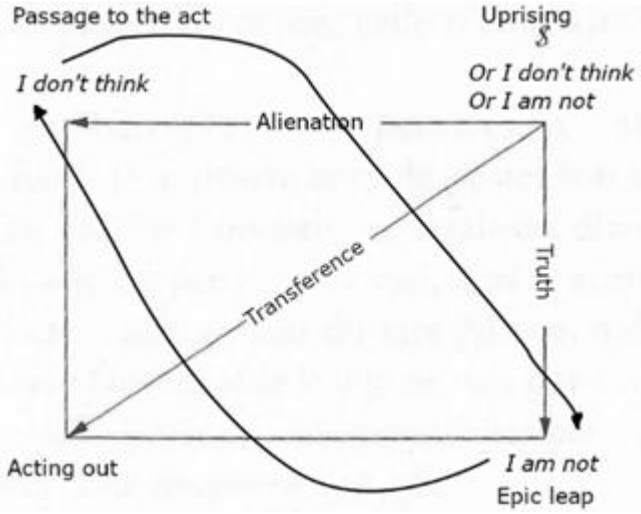
[注46] 雅克·拉康，L'insu que sait de l'une-bévue s'aile à mourre，1977年4月19日课次。〔英译者注：这期研讨班有不同的可能译法，我把选择留给读者。〕

考虑到上面这句话，克莱尔·拉纳加诸玛丽-泰蕾兹尸体的屠宰，将它在谋杀之后变为浇汁肉，就显得不那么奇怪了。同样，一些哀悼者接连做梦：他们想象那个人活着，由此让失去亲人的人有可能在一瞬间，使亡者以死亡之前的样子在场。同样，屠夫在肉被放进酱汁之前，就把它切碎。

不过，我们能否断言，克莱尔·拉纳的越入行动，与拉康第二次追问"年轻同性恋女人"时给出的越入行动描述相吻合？他提出，任其坠落，是"主体突然与其作为小 a的所是发生任何连接时，必不可少的关联项"。[注47]如果玛丽-泰蕾兹·布斯凯的尸体，整个都是浇汁肉，那么这个公式就会适用。但完全不是这样。克莱尔·拉纳以两种不同方式处理了身体。越入行动的"我不思考"在这里遇到了它的限度，就像史诗性跃迁的"我不在"还没有达到其"我不在－φ"一样。在图式4左上方，我们读到两个相连的标示："我不思考"，一条连字符将它与"小 a

曾在之处”分开。克莱尔·拉纳没有把她的“我不思考”带到“小 a曾在之处”。由此可见，未完成的越入行动返回到史诗性跃迁，就像未完成的史诗性跃迁同样返回到越入行动那样。

[注47] 雅克·拉康，《焦虑》（L’Angoise），1963年1月23日。我在《你的狗的影子：精神分析话语、女同性恋话语》（Ombre de ton chien. Discours psychanalytique, discours lesbian）（巴黎，Epel，2004）中讨论过这一陈述。



一个长方形，顶点带有标签，箭头标示“异化”“真理”与“转移”。两条曲线连接“我不在”与“我不思考”。

图3.8的详细说明

一个长方形，四个顶点带有标签。左上标为“我不思考、越入行动”。右下标为“我不在、史诗性跃迁”。右上包含“或：我不思考”与“或：我不在”，以及“起而反抗”，后随一个类似美元符号的符号。左下顶点标为“行动展示”。箭头分别标为：“异化”，由右上指向左上；“真理”，由

右上指向右下；“转移”，由右上指向左下。另有两条曲线：一条从“我不在”出发，朝向“我不思考”；另一条从“我不思考”出发，朝向“我不在”。

图3.8　图式7。

克里斯蒂娜·帕潘或许达成了越入行动的实现，但在某种意义上，她的方式与克莱尔·拉纳试图做的相反，因为她的越入行动并不将受害者同化为厌恶的对象，而是同化为令人有食欲的口腔对象，比如兔子和“可以下锅”的面包卷：玛耶特·维尔塔尔为《越入行动的“解决”》写的那一章，就以这个说法结束。[注48]越入行动时，克莱尔·拉纳吐出，帕潘姐妹则吃进（纳入身体）。

> [注48] 弗朗西斯·迪普雷，《越入行动的“解决”：帕潘姐妹的双重杀人案》（图卢兹，Érès，1984，可于Epel出版社网站获取）。

两种不同的重新安置

史诗性跃迁与越入行动，各以自己的方式受到了限制，也就是没有完成。一边，史诗性跃迁没能达到刻画它、且证明其有效性的“我不在－φ”。另一边，越入行动没有把其“我不思考”带到可能抵达“小　a曾在之处”的那个点；抵达那里，也会使它生效。史诗性跃迁与越入行动最终都未能达成；如果人不能脱离每个人面对这类暴行时体验到的各种感情，就无法设想这一点。

案件的两个特征现在找到了理由。它们相互关联，这个唯一的理由为两者所共有。恰恰因为这一个和那一个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可以这样说），所以必然有两个未达成。换句话说，被召唤去在“我不在”与

“我不思考”之间作选择的“出发处的主体”，未能倾向这一个或那一个选择而解决问题（既选择，又找到自己的解决）。这个主体并未真正定位于图式7的左上（越入行动）或右下（史诗性跃迁）。结果是一种反弹效应，由前述理由而来。这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拉康所谓的“跳跃”：不是史诗性跃迁，而是主体借此抵达四面体某个顶点的运动。我会说，主体在这些顶点之间被弹来弹去。克莱尔·拉纳坚决拒绝指明玛丽-泰蕾兹·布斯凯的头在哪里，这在她的叙事中构成了一个洞，标记了史诗性跃迁未达成的那个点：这一未达成返回到越入行动（见图式4）。而玛丽-泰蕾兹·布斯凯的身体并未整体被当作浇汁肉、头在哀悼仪式中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处理，这些事实唤起了另一个跳跃：其中，越入行动的中止将主体送回史诗性跃迁。因此，这是两次重新安置，取某种安置被移到别处的意义。不过，越入行动与史诗性跃迁并没有混在一起。

这里，我们清楚地有了两种性的分析论的一种双重联结。[注49]第一种，是对象（小 a）在其中运作、却并未实际坠落的那一种；越入行动必须定位在这里。第二种，是“没有性关系”的那一种，它同样没有抵达：我们看见，它停在尚未抵达 −φ之处。

> [注49] 联结（Syntagma），但并非某些语言学家赋予这个词的那个意义。

现在我们注意到，这两次重新安置各自的枢纽，都是玛丽-泰蕾兹·布斯凯的头：对于从史诗性跃迁返回越入行动，头是没有被定位的；对于从越入行动返回史诗性跃迁，头是没有被认作浇汁肉的。仅仅是这个头的问题吗？玛格丽特·杜拉斯写《洛尔·V.斯坦的迷狂》时，被“一种害怕稍稍丢掉头的恐惧”占据着。[注50]

> [注50] 玛格丽特·杜拉斯，《全集》，第二卷（巴黎，伽利玛出版社，2011，第1684页）。

荣格派实践的精神分析，将患者提到的某些现象同文化联系起来；这些现象对患者来说既令人费解，又是“个人特有的（idiotic），按这个词最初的意义，也就是只涉及他个人的”。[注51][注]这一程序能够对患者（荣格派给予分析者的名称）产生平静的作用，让他看到自己或许并没有先前以为的那么疯。我们将其称为心理治疗。不过，如同弗洛伊德承认使用过暗示这一杠杆一样，我们也不会避免使用它，因为克莱尔·拉纳对玛丽-泰蕾兹·布斯凯身体两个部分（头，以及其余尸块）的不同处理，可以在……阿兹特克人那里找到对应。他们并不以相同的方式，对待被献祭者的心脏（心脏切除术的对象）与其余尸块；后者由某些被选中的人吃下。这里，我们同样有灵性的、乃至神圣的维度：一位神在场。[注52]蒙德尔·基拉尼的著作《品尝他者：食人话语的片段》（Du gout de l’autre. Fragments d’un discours cannibale）[注53]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它探究食人行为的象征维度与隐喻维度。在这一点上，我们想到犬儒派与斯多葛派的食尸行为，想到它表现出的对死亡的蔑视；也想到蒙田，他在《随笔集》关于食人行为的那一章中写道，克吕西波与芝诺认为，若没有其他东西可吃，吃人的尸体也无妨。

[注51] 希腊语的idiotês：“简单的、个别的”，与执政官、公职人员、专家相对。经过古典拉丁语（“无知的”），这个词越来越获得它现有的贬义：“低能者、蠢人”。历经数百年，大学话语总是在贬低这个令人排斥的形象的过程中建构自身。它的（对象 a）？

[注52] 菲利普·索莱尔会如此吗？他是一位犯罪纪录片爱好者，那些纪录片呈现把受害者身体切成碎块的杀人者。见菲利普·索莱尔，《中心》（Centre）（巴黎，伽利玛出版社，2018，第65—66页）。关于食人行为的情色维度，可以参阅阿尔贝托·莫拉维亚《我与他》（Moi et lui）（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71）第130

> 页；其中，一个女人讲述了一个情景，它使她的手淫行为增强，带她达到高潮。提到这部小说，我们就不能不指出，它质询了在升华这一名称之下建构起来的东西：阳具是向升华提出的良心异议。

> [注53] 蒙德尔·基拉尼，《品尝他者：食人话语的片段》（Du gout de l'autre. Fragments d'un discours cannibale）（巴黎，瑟伊出版社，2018）。

> [注] 正文按其限定"只涉及他个人的"以及原注51所述词源取义，不取 idiotic 的现代贬义"愚笨"。同一词从个人、私人之义转向无知、愚蠢的历程，是原注所讨论的意义变化，中文单一译词无法兼具。

"Amante anglaise"这个名称

克莱尔·拉纳的"我不思考"，没有抵达并重合于对象小 a，没有作为a消失于其中而被吸收；这一事实与案件的两项主要资料汇合：标题（《英国情人》）的选择，以及对这一名称所保留的处理；如同上帝的名称和卡奥尔职员的名称一样，它并不是她自己的名字。

口腔性在这里也占主导："我想了这个：英国情人（l'Amante anglaise）是浇汁肉的反面"（第150页）。"她把la menthe〔'薄荷'——法语中与l'amante'女情人'读音完全相同〕写成amante / 女情人。把anglaise〔'英国的'——法语中与en glaise'上釉的 / 在黏土中的'读音完全相同〕写成en glaise，就和'土的'、'沙的'一样"（第124页）[注]。克莱尔转写了这个词组：不再是"la menthe anglaise"（"英国薄荷"），而是"l'amante en glaise"〔釉 / 黏土中的女情人〕。她吃这株自己最喜爱的植物："我有时吃它，好洁净自己"（第150页）。按照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述说神话的方式，我们将指出，英国薄荷逐项地与浇汁肉相对立。克莱尔瘦，玛丽-泰蕾兹则胖；克莱尔喜欢鱼，玛丽-泰蕾兹则煮了那么多肉，以至于她变成了肉（第89页）。薄荷是一种药

（pharmakon），能抵消吃浇汁肉的效应；克莱尔说，吃这种肉把她变成了下水道（égout）："犯罪之前，我比下水道还糟〔一道炖肉（ragout）？〕。现在，越来越不像了"（第190页）。但罪行是必要的：无论她在花园里栽种这株植物时（第124页）如何悉心照料，药（pharmakon）都无效。她必须吐出来。

> [注] 本段的论证依赖法语 la menthe / l'amante、anglaise / en glaise 的声音关系，中文"薄荷 / 女情人""英国的 / 在黏土中的"无法重现，因此保留各词。英文底本把 en glaise 同时解释为 glazed/in clay；中文保留这两个释义，不把"上釉"反推为法语唯一词义。égout（下水道）与 ragout（炖肉）也保留词形，以提示作者在方括号里提出的声音联想。

因此，玛格丽特·杜拉斯对标题的选择，似乎接过了她通过克莱尔·拉纳一句话所描述的聪明："我不够聪明，无法谈论我所拥有的聪明，而对于这聪明，我说不出来"（第163页）。这一标题让自己处在两种可能的指称之间：她的名字"英国薄荷（menthe anglaise）"，以及"克莱尔·拉纳"，她自己的名字。她不能成为"英国薄荷"并打败浇汁肉；她只能是克莱尔·拉纳，前提是她的对话者终于愿意听她。一个之间，一种悬而未决：某种未达成之物的符号。因此，无论在史诗性跃迁层面——克莱尔·拉纳没有抵达 $-\varphi$——，还是在越入行动层面——她没有变成对象a——，它都在场。若图式4上有一个地方能够写入amante anglaise这个名称，那会是转移的线所朝向的位置：在某些图式上，这里是（小 a）与（$-\varphi$）容身于同一个月牙形区域、却彼此分隔的位置。

呈现出三个限度，它们相互关联得如此紧密，以至于我们可以承认其连接的博罗米性质：假如跨过其中一个，其他的也会被跨过。（1）史诗性跃迁的限度，它保留了小 a；（2）越入行动的限度，它停住了，没有抵达 $-\varphi$；（3）克莱尔·拉纳述说的限度，它不交出那个会指明

头在哪里的词，那个会使她成为被活埋者的词。[注]“如果我告诉你头在哪里，你还会和我说话吗？”（第193页）。她的对话者灰心丧气——一个新的、第四个限度——，承认失败，放弃再盘问她。

> [注] 本段底本将史诗性跃迁的限度同 petit a、越入行动的限度同 $-\varphi$ 相连；前文146段将二者的未达成分别表述为未抵达 $-\varphi$ 与 petit a。这里按底本保留两项列举及其对象，标明与前文表述的差别，不自行互换它们。

这个既是最终的、又没有定论的时刻，也是克莱尔·拉纳面对这种放弃，终于能表达自己的要求的时刻：“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我会听。听我说”（第195页）。在这一点上，她不同于越入行动之后的克里斯蒂娜·帕潘。克里斯蒂娜·帕潘则活着[注]，以至于将所发生之事的未知理由，不显眼地安置在她的位置上：“这个未知的理由在哪里？”她问。她的对话者全然浸没于心理领域（psy）的世界，回答：“在你里面？”她反驳：“为什么？为什么不在她里面？或在房子里面？在刀里面？或在死亡里面？是的，在死亡里面”（第169页）。在那个并没有杀死她的死亡里面。

> [注] 英文底本在这里再次写 Christine Papin（克里斯蒂娜·帕潘），随后却引用《英国情人》的第169页。这里保留底本指称及其跳转，不将主语默默改成克莱尔·拉纳。

结论

DOI：10.4324/9781003504092-5

越入行动对于精神分析还有另一种相关性，迄今受到忽略；它将使我们得以——除其他事情之外——看清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渊。这道深渊把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内部看待越入行动的方式，与雅克·拉康描述一次分析历程终点上所发生的事情时看待它的方式，分隔开来；他把这个终点描述为"一种明晰的越入行动"。这是一个恰当的时机，来称许雅克·德里达：他在2000年说，今后"精神分析"一词只应以复数形式使用。如果对于拉康借助 S.I.R.〔象征、想象、实在这三个层面〕向弗洛伊德领域引入了一个新范式这一事实，尚存任何疑问，那么在注意到这道深渊之后，我们便只能承认：疑问已经消除了。

IPA，或者如何预先招致人们想要避免的事情

2006年，精神病理学博士、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培训分析家路易丝·德·乌尔特贝（Louise de Urtebey）出版了一部题为《如果分析家越入行动》（Si l'analyste passe à l'acte）[注1]的著作。〔英译者注：请注意，引用德·乌尔特贝书中内容时所给的出处可能不准确。〕她有理由指出，精神分析家的"越入性行动"（她的主题，她的问题），虽然为一些人所知（当事人、周围的人、精神分析协会），大多数时候却遭到缄默……只有某些引发丑闻的案例除外。她的书终结了这种沉默：不是通过详细研究几个案例（书中只有临床片段），而是通过对问题的理论探究。[注2]因此，如果德·乌尔特贝没有把道德考量放在

精神分析理论的伪装之下，如果她的著作不像人们描述的那样是一项“警告”，我们本可以把它称为勇敢之作。[注3]它根本不是一项警告，因此，这部作品值得我们关注。

[注1] 路易丝·德·乌尔特贝，《如果分析家越入行动》（Si l’analyste passe à l’acte），克洛德·勒冈作序（法国大学出版社，2006）。这部著作中的引文几乎从来没有精确的出处。

[注2] 书中提及一些“越界的”分析家的案例：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尚多尔·费伦齐、恩斯特·琼斯和马苏德·汗——她指出，最后这位只在其最后一位精神分析家唐纳德·W. 温尼科特去世之后，才做出某些越界的性行动，因而依照这一推论，温尼科特对此也应负部分责任（第153—156页）。书中还提及（第11页）美国和加拿大的统计资料：在“心理”职业中，越入性行动的比例为5—20%。作者也提到，她在四十年精神分析实践中知道的约二十个类似案例（第74页）。

[注3] 著作的最后几行（第180页）带有弗洛伊德式〔Verneinung〕否定的意味：“对我而言，问题不在于揭发任何人……”而在四行之后，这个“任何人”却被描述为“一匹害群之马”。

精神分析家的越入行动问题，在精神分析实践的一次转折中变得更加显露、更为明显；IPA内部广泛分享着这次转折，路易丝·德·乌尔特贝对此有所指示。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人们仍持有“关于反转移的旧有经典理论”：这些理论重申弗洛伊德的立场，要求精神分析家成为情境的主人，或者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保持“漠然（indifferenz）”，[注4]以维持精神分析科学的“客观性与精确性”（第93页）。无疑，人们发现这一立场无法维持。从那以后，反转移不再是“一个要打败的敌人，而是……转移的一面镜子，一种理解分析情境的手段”（第94页）。[注5]精神分析心理学从单人转为双人（第40页），以至于“分析家- 患者的共同幻想”（第47页，着重为我所加）的存在，被毫不迟疑地肯定了；“两个自我中此前遭到压抑的一个相遇点”的幻想（第69页，着重为我所加）也是如此。德·乌尔特贝经常使用“伴侣对子”这个词，她认

为患者与分析家构成一对，这样说毫无奇怪之处：由此，精神分析变成了伴侣治疗。性关系的气味飘散着，我们也能从“转移与反转移彼此相遇、接受、享乐（jouir）并受苦这一由两个人建构的灾难性事实”中闻到它（第105页，斜体为德·乌尔特贝所加）。[注]

[注4] 这个indifferenz从一手传到另一手，从弗洛伊德传到如今的德·乌尔特贝，经由两位精神分析家史蒂文·利维和劳伦斯·因德比岑传递；她说（第26页），他们指出，弗洛伊德并未谈中立性。这的确就是问题。漠然的关切，是掌权者的关切。当被问到他认为共和国总统应具备的最重要品质时，弗朗索瓦·密特朗答道：“漠然。”

[注5] 这部著作中，没有任何东西支持把反转移构成为转移的镜子这一想法（尽管这一用语多次出现）。

[注] 本段“灾难性事实”引文中的下划线，依底本保留为下划线；斜体与下划线的着重分别保留。底本在第40页的括号后缺少闭合括号，此处按句法补足，不改变引文范围。

反转移方面的这一变化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于是，与露西·塔沃一道，我们看到了得出如下结论时的坦率和开明：“情色反应困扰着几乎所有分析家”（第12页）。作为对此种变化的回应，有人会“力图通过反转移成为患者童年时所缺少的那个好父母”（第61页）。另一个人会认为，如果分析家未能对自己的患者“以情色和爱意幻想”（第68页），在俄狄浦斯的生殖器阶段爱过并欲望过患者（第90页），精神分析便不能终结。还有人会发现，有时候向患者传达后者使自己承受了什么，是适当的（第96页）。沿着这条路走得更远，有些人会向患者谈论自己，实行自我披露（第96页）。另一些人会提到自己的情色反转移；按作者的说法，这是二人疯（folie à deux）[注6]的建立（第97页）。

[注6] 这是一个误解：作者在这里似乎完全不了解所谓“二人疯（folie à deux）”（见“偏执狂的断言确定性”，L’assertitude paranoïaque，《Littoral》，第3 / 4期，巴黎，Epel，1982，可在 Epel 网站免费查阅）。这一误解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作者指

> 出，她治疗过神经症者，而精神病者“非常少”（第73页）。她表现出非凡的坦率，提到自己实践中的若干案例：由于与某些患者之间的情境陷入僵局，她把他们摆脱掉了。

我们刚刚浏览了从这只潘多拉盒子里出来的一些精神分析立场与实践；打开它所要求的，不只是某种对等的代价。反转移一旦被带到露天，就只能诉诸对它的分析，以避免被推到越入“越界的性行动”的地步。于是，分析场景中有两个患者在场，必须有两场分析：一场给予实际的患者，一场给予那个被反转移攫住、不再像弗洛伊德所希望的那样有“一张厚皮”的精神分析家（第88页）。承认反转移之后，“分析家自己就是第二个患者，必须自我分析”（第24页）。

然而，分析反转移虽被视为至关重要，却不足以保证不会发生越入行动。分析家还必须是“分析设置的守护者”，因此也必须亲自尊重它。在这一点上，德·乌尔特贝区分了大的与小的偏离。我们得知，分析会谈比约定时间提前一两分钟开始，或者延长一两分钟，并不太严重；而提前或拖后十分钟，就被视为精神分析家的越入行动（第53—54页）。[注7]这不禁令人发笑。大量规则规定着分析设置；它有时是精神分析家与患者之间契约的对象：会谈时长恒定；按约定时间开始并结束；没有身体接触；诊室里只有他们两人；及时支付费用；由患者先开始说话；专业保密；分析家不作道德或审美判断；不利用患者的退行；精神分析家作为一个人保持相对匿名；不否认分析家内在的恨；不站在支持或反对患者的一边。还有另一条规则，“禁止分析家越入行动”（第24页），被提升为基本规则（着重为德·乌尔特贝所加），因为其“越界”会终结分析。这一点，如我们将要表明的，突显

了分析设置的建立和对它的尊重中起作用的东西。例如，人们不知道为什么，爱上分析者会比与他或她发生关系不那么严重（第100页）。爱造成的损害比性更少吗?

> [注7] 在这里，可以提到IPA一位杰出成员（莫里斯·布韦？）的一句话：当患者告诉他自己病了，不能来会谈时，他说，如果患者的体温超过38.5度，他就不收费。

那么，人们期待这种分析设置做什么？它有助于“分析家承受患者的攻击而存活的能力”（第22页）；它反对非神经症患者“建立一个不同于分析家设置的设置”的努力（第22页）；它是一个容器（第30页）；它是越入行动越过并攻击的东西（第51页），由此便有了“越界”、甚至“侵犯”这些用语；它维护希波克拉底誓言（第65页）；它“旨在允许患者安全地倾诉心事”（第98页）。[注8]谁能不注意到，构成分析设置的规则，以及被赋予它的功能，都服务于快乐原则：换言之，把兴奋保持在最低程度？这一切关乎一个缓冲器，人们期待它压住过程中的某些不合时宜的时刻？[注9]这难道不是企图把那恰恰前来寻求治疗的东西，留在分析领域之外吗？作者认为分析中必须上演的属于“仿佛”之序；这一看法确认了这一点，她说这是一种“分析空间中不可缺少的”“特征”（第108页）：简言之，没有任何实在。与弗洛伊德相反，德·乌尔特贝否认转移之爱是真正的爱。[注10]

> [注8] 有一个人想接受培训精神分析。他第一次约见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一位培训分析家，向其提出自己的请求。答复是：“先平静地进行你个人的分析，之后我们再看。”这位候选人的请求是认真的，他再没有回到这个人那里；那个人竟指出，一次分析可以在完全平静的情况下完成。

> [注9] 我逐渐认识到，这些“危机”时刻是分析历程中最具决定性的时刻之一。两个特点表明这一点：（1）分析处在被中断的边缘（有时确会发生）；（2）精神分析家很想把患者转给一位同事或精神科医生。分析由此显出自己接近药物医学；后者在

> 危机中既看到疾病的加重，也看到患者恢复的可能性。在“转移的动力学”中，弗洛伊德写道，“没有人能够在缺席中（in abstentia）或在画像中（in effigie）被杀死”。这一陈述常被引用。请注意，它排除了“仿佛”这个说法。

> [注10] 这里似乎有一个困难未被注意到。如果分析中的爱是“仿佛”的爱，而不是真正的爱——理由在于它是童年之爱的更新——那么，“真实生活”中的任何爱，凭什么自身不是一种“仿佛”的爱呢？

对分析设置的尊重本应阻止越入性行动，它难道不是反而推动人去越入行动吗？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精神分析家的越入性行动，恰恰显现了那个僵硬、沉重的分析设置试图排除在领域之外的东西。那个越入“越界的性行动”的分析家，比许多其他人更专注于所谓的“分析设置”。因此，德·乌尔特贝著作的论题，像一张薄饼那样轻而易举就可以翻过来。被当作防护的分析设置，呈现为一种挑唆。分析设置（setting）……变成了一个圈套（set-up）。德·乌尔特贝的书《如果分析家越入行动》的讯息，由IPA这一支脉的精神分析家在彼此之间分享，以一种多少带着惋惜的口吻说出：“对于那些向我们求助的患者，我们无法提供一种分析设置。”的确，疯狂如果不以多种方式打破分析设置，它就不会是疯狂了。

也许我们在此能够看到，是什么促使路易丝·德·乌尔特贝如此大幅度地讨论精神分析家的越入行动：她自己对所属群体所推行的分析设置感到不适，却并不自知。难道不是对越入行动的恐惧，引向了这一框架的界定和建立吗？临近结尾时，德·乌尔特贝写道：“分析家厌倦了工作，失望，被囚禁在诊室里，可能会体验到对自由的欲望，对反抗弗洛伊德规则的欲望，并设想俄狄浦斯式的性活动会使他获得解放”（第175页）。

一个多年相信自己必须把分析设置的轭压在肩上的人，会欲望自由吗？当我们把这一猜想，与德·乌尔特贝的书为如下问题提供的回答相对照时，它似乎并不那么不合适：精神分析家必须怎么做，才能始终自我分析其反转移，始终确保分析设置得到尊重？我们读到，他必须把伦理规则内化；这些规则"源于——尤其在超我和理想自我中——对代表法律的恰当父亲、对昔日分析家、对大师、对弗洛伊德，以及对其他超我的父母形象，或被内摄并确立于理想自我中的形象的认同"（第20页）[注11]。[注]很难想象，受这样一个超我折磨的分析家，能够在分析者的转移游戏中行使他／她自身的自由；分析者并不总是期待分析家成为分析设置所要求的那个人。

> [注11] 这部著作中对拉康的憎恶，从几个隐晦、可数的征象中可以觉察；无疑，这使作者能够免于讨论拉康对把分析历程终点看作认同分析家的做法的批评。

> [注] 本段底本两次使用 ideal ego，按本书术语表译为"理想自我"；不将它径改为 ego ideal（自我理想）。

《如果分析家越入行动》所传达的越入行动版本，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许多方面，它与我们阅读《拉康临床》（La Clinique lacanienne）所发表的"越入行动（Passer à l'acte）"专题时研究过的版本相一致。在这里，一开始就走错了：把弗洛伊德1914年发表的文章"记忆、重复与修通"，说成是越入行动概念的"奠基之作"（第34—36页及第82页）。这是不正确的。在弗洛伊德那里，任何地方都没有"越入行动"。这种强加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德·乌尔特贝极其明确地指出的一点：她不会在这个词公认的精神医学意义上使用"越入行动"这个说法（第51页）。[注12]正如我们已指出的，同样的弃用也是"越入行动"（发表于《拉康临床》）的特征。如同那部作品一样，越入行动由于未被定位，在德·乌尔特贝的著作中就变成了指称任何行动的词。因此，就患者而言：不支付会谈费用；不到场；迟到，等等；就

精神分析家而言：在会谈中打盹（第46页）；让会谈超过约定时限（第53页）；接待一位在平常时间却在错误日子到来的患者（第59页），等等。把“精神医学的”越入行动塞回弗洛伊德的agieren（1914年的文章），使我们把越入行动想成某个象征要素的过渡行动：这个要素未能踏上正确的道路——言语之路。

> [注12] 这开启了说出以下话的可能性（第112页）：“越入行动是一种‘共同的’创作。”

一则公开拍卖的分类广告可以这样写：“象征的首要地位尚未死去！”《拉康临床》的撰稿人与德·乌尔特贝，情况一样；例如，她写道，分析关系是这样的：“一切都‘仿佛’发生，象征性地发生”（第20页）。或者进一步说，“仿佛”的丧失“与分析家严重病理所导致的象征化能力缺失有关”（第108页）。“仿佛”与“象征”的等同，似乎完全不引出任何问题。那么，当弗洛伊德把梦视作字谜来解读时，“仿佛”又在哪里呢？

此处，我们试图攀回《拉康临床》的“越入行动”专题和路易丝·德·乌尔特贝共同滚落的斜坡。其结果，这个坠落之点，无异于对越入行动的放弃。在我们的努力中，有三个标准起作用。（1）意义标准：一个轻易就在叙事中取得位置的行为，不能与一个始终完全成谜的行为以同样方式看待。（2）第二个标准使第一个标准加倍，属于临床之序：费蒂·本斯拉马揭示了他所称的“史诗性跃迁”，也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若不考虑它，就不能看待越入行动。（3）第三个标准同样涉及一个选择，这次是理论之序的选择：我们选择异化之或（vel），以便定位并处理越入行动和史诗性跃迁。因此，如果这三个标准中的任何一个被拒绝，我们此处读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会有效。

这些标准的运用产生了一项令人惊讶、出乎意料的材料，在写下这些文字时如此，或许阅读时也如此。通过分析路易·阿尔都塞的越入行动（第二章），尤其克莱尔·拉纳的越入行动（第三章），看来这些杀人行为固然属于越入行动的领域，但也属于史诗性跃迁的领域。就此，它们不同于圣战者的行动（史诗性跃迁的范式）和帕潘姐妹的罪行（越入行动的典型）。

这一惊讶可能使我们重新批判性地考察先前提到的越入行动：其中包括"年轻女同性恋者"、玛格丽特·安齐厄、伊里斯·卡贝苏多和恩斯特·瓦格纳的越入行动。我们还可以重新考察"渴求新鲜脑子的男人"这一著名案例，询问它究竟是行动展示（acting-out），还是越入行动，抑或史诗性跃迁。我们承认，虽为行动展示安排了位置，却没有如我们本该做的那样处理它；因为我们呈现的、展示异化之或（vel）的各个图式，除出发点外，包含的不是两个而是三个顶点，越入行动、行动展示和史诗性跃迁分别在这些顶点发生。我们略过了行动展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它在越入行动与史诗性跃迁之间占据一种居间位置。然而，这一令人遗憾的遗漏并未阻碍随后要展开的东西，它关乎分析经验开始与终结之际，越入行动与史诗性跃迁的衔接。

越入行动与史诗性跃迁的区分——前者由"我不思考"构成，后者由"我不在"构成——与我最近揭示的另一区分相交：拉康那里两种性的分析论的区分。阅读《英国情人》确认了，越入行动出自第一种性的分析论（对象 a，在此是口腔对象），而第二种（没有性关系的分析论）可以归于史诗性跃迁（在此是情书的寄出以及哀悼仪式）。

分析终点的史诗性跃迁与明晰的越入行动

越入行动 / 史诗性跃迁的区分，也可能为精神分析行动以及何为一次分析的终点这一构想带来一些光亮。尤其因为我们在拉康那里，从1967年起，[注13]发现的不是一个，而是至少两个、甚至三个[注14]有关这一终点的版本。分析如何结束的构想，为三者所共有。然而，拉康从两个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一完成。有时：作为a与A的分离，分析家被丢弃，像废物一样被抛开[注15]（在这种情形下，这一终点可以而且应当被规定为越入行动）。另一些时候：作为另一种分离方式，它以不同方式标记场中的各方——分析家受到其去存在（désêtre）的打击……以及相应的分析者的主体性罢黜（在这种情形下，终点应被视为史诗性跃迁）。第一个版本关乎驱力和幻想（$ <> a）的一条特定路径。第二个版本不能如此，因为它涉及另一种分离，关乎分析家本身和分析者本身。因此，我们应当在第一个版本中认出越入行动，在第二个版本中认出史诗性跃迁。现在，是时候肯定，乃至细化这一猜想了。

> [注13] 参见拉康的“1967年10月9日关于学派的精神分析家的提议”（Proposition du 9 octobre 1967 sur le psychanalyste de l'École），第14页，《Scilicet》第1期（巴黎，瑟伊出版社，1968）。刊行于弗洛伊德领域的杂志，雅克·拉康主持的丛书。各卷从第1期延续至1976年的第6 / 7合刊，后者是最后一期。

> [注14] 参见若泽·阿塔尔，《不止一种名目的通行：雅克·拉康第三项十月提议》（La passe à plus d'un titre. La troisième proposition d'octobre de Jacques Lacan）（巴黎，L'Unebévue éditeur，2012）。又见让·阿卢什，《为什么会有性兴奋，而不是什么都没有？》（Pourquoi y a-t-il de l'excitation sexuelle plutôt que rien?）（巴黎，Epel，2017，第16页）。

> [注15] 在其他可能性之中，并参照克莱尔·拉纳。被吐出来？

我们更加受到邀请来这样做，因为拉康给分析家指派了“我不思考”的位置；如前所说，它是越入行动的特征。起初，这似乎与我们迄今所说的相矛盾，也就是与把分析终点构想为史诗性跃迁相矛盾，因为分析的运动本身始终突出分析家与分析者之间发生的事情。这变得特别强烈：它无非就是转移，而我们再清楚不过地知道，转移恰恰是许多分析未能达到真正终点的地方（只需考虑拉康对迪迪埃·安齐厄和三位一体玛丽（Marie de la Trinité）的分析，[注16]或者除了分析家的死之外没有别的终点的分析[注17]）。

[注16] 三位一体玛丽，《从焦虑到安宁》（De l’angoisse à la paix）（巴黎，Arfuyen，2006）。更多出处见让·阿卢什，《拉康之爱》（L’Amour Lacan）（巴黎，Epel，2009，第455页，原注21）。

[注17] 这是精神分析史上一个未经探究的问题；拉康精神分析学派于2003年6月14—15日在巴黎专门为此举行了一场专题讨论会。

按照拉康的说法，把分析家置于“我不思考”这一（无法维持的？）位置，出自一种为分析者的历程服务的分析家位置；这个历程被认为是“一种奇怪地从‘我不思考’与‘我不在’之间所提供的异化选择开始的逻辑”。[注18]拉康把到达这一点的主体规定为“知情的”；这个点因而被显示为一个点，在那里有可能出现“那不能被称为别的东西、只能被称为——我们会说——明晰的越入行动的东西”。[注19]因此，这里提出的分析终结问题，不再只有两个终点，而是——起初看来——有三个：越入行动、史诗性跃迁和明晰的越入行动。

[注18] 雅克·拉康，《幻想的逻辑》，1967年1月25日。

[注19] 雅克·拉康，《精神分析行动》（L’Acte psychoanalytique），1968年3月13日。1972年10月14日，拉康把话说得一清二楚（直译：给 t 画横、给 i 加点），再度非常精确地说，这涉及越入行动，“不涉及行动展示（acting-out）”（“比利时精神分析学派的会议”，可见《并非全部拉康》（Pas-tout Lacan），https://ecole-lacanienne.net/bibliolacan/pas-tout）。

首先，我们有坚持不思考的分析家的越入行动：然而是一种奇怪的越入行动，因为它远非一次单独的事件，而是在分析全程中持续起作用。肯定“我不思考”是分析家所在的位置（无疑来自某种修持），使拉康陷入与他提出“没有性关系”时所面对的相似困难；

> 作为精神分析家，我不能说这话。他幽默地说，看看这会对我的客户产生什么效果！这也是把我困在我不思考这一位置上的东西。

他不能说，却又……说了。这样，他指涉了自己的窘境——我们凭借这一特点认出了他的认真。一项书写出来而非转录的陈述，把这一点钉牢：

> 在精神分析中，精神分析家不是主体；把他的行动定位于对象 a的理想拓扑学，便可以推导出：他通过不思考而运作。[注20]

[注20] 雅克·拉康，“研讨班提要”（Resumé du séminaire），《精神分析行动》，1967—1968年。

我们可以问，分析家免除思考的这一位置，难道不就是西方在数世纪的哲学、灵性和治疗实践中所创造的某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吗？拉康注意到了这一点，甚至得出结论：分析很可能消失，后来被视为人类历史中仅仅一个“插曲”……我们会想到波尔- 罗亚尔。

> 分析——随你怎么称呼——就是那种原初的经验，或者人工产物，或者某种东西；它也许将出现在历史中，不是作为一个特定时刻，而是作为某种插曲，一种处理极其特殊的案例的非常正当的方式，一种碰巧被发现开启了人类之间所施行的关系的一种完全不同模式的实践。[注21]

[注21] 雅克·拉康，《精神分析行动》，1968年1月24日。

免于永恒，分析便将标出自己与永不沉没的基督教之间的差异。那么，谁还能怀疑，存在一种得到更好构成的与死亡的关系？

分析家不思考，会对分析者产生什么效果？我们可以看到，分析者总被推向完成一次史诗性跃迁，从而结束自己的分析。这一断言虽属于我，却得到拉康的一些评述的支持，并处在先前对图式3（第三章）所作修改的脉络中。虽然从结构角度看，名为“异化”、“转移”和“真理”的三个向量共存，它们却仍绘出一条终于真理的主体路径。稍稍想象，就可以把这一图式看作一把展开的扇子的图画，手在（$）处握着它。手把扇子合起来：异化的水平线先与转移的斜线合在一起，后者现在盖住前者（如果愿意，可说是从神经症向转移神经症的过渡）；然后，两条线一同退到真理的竖线后面。扇子合上了。历程从选择“我不思考”开始（自由联想，由一次越入行动使之成为可能），终于“我不在”。这一真理曾被置于“主体性罢黜”的旗帜下。一旦分析者到达标为 $-\varphi$ 的这一点，他便借助史诗性跃迁与自己的分析家分离。克莱尔·拉纳的史诗性跃迁无法达到 $-\varphi$；她无法知晓阉割的快乐。最后，她要求有人听她说话——一个将会退缩的人。在越入行动之后，克里斯蒂娜·帕潘已没有什么要向任何人请求，甚至不请求总统赦免：她任凭自己死去。

现在，应当定位“明晰的越入行动”了。它是什么？为了解它，我们参照图式5——准确地说，参照转录主体运动的那条曲线：从“我不在”跃迁到“我不思考”。

> 正是主体完成了那项任务，在任务的终点，他在阉割中实现为主体，作为缺乏性结合的享乐者。我们必须看见的，正是这个主体——通过旋转或转轴转动某个角度，按照这里这个图形所画的是180°——过渡或回到出发点。当他在这里实现时，正是在这里，如我已经强调的，来到这里（左上方）的主体知道什么属于主体经验；而这一经验也意味着，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在左侧留下的是那个人变成了什么：正是那个人的行动对走过的路径负有责任。换句话说，就我们如今看见从他的行动层面涌现的分析家而言，已经有关于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之去存在〔désêtre〕的知识，因为按照这一逻辑，它是必要的出发点。[注22]

[注22] 雅克·拉康，《精神分析行动》，1968年1月17日。

如果稍稍留意这段引文，它会比乍看时更清楚。我们将着眼于两点评述。第一点：如果对分析在第二种性的分析论的层面上终结这一事实尚有疑问——在那里起作用的是性关系的不存在、大他者（l’Autresexe）和大他者的享乐——这些疑问如今就消除了。[注]因为阉割被界定为“缺乏性结合的享乐”，它并不与性关系的不存在相交，甚至不与之重新汇合，而本身就是表达性关系不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拉康：

[注] 此处底本把 Other 与 l’Autresexe 置于同一括注关系，译文保留“大他者（l’Autresexe）”；后者在本书引用的阿卢什书名中译为《他性》。不据其他文本消除底本在此保留的命名关系。

> 精神分析实践的价值论证明自身归结为性的这一事实，并无助于那在初始行动中发生的伦理颠覆；在该行动中，性通过结构的诸种否定性被显示出来〔着重为我所加〕。[注23]

[注23] 雅克·拉康，“研讨班提要”（Résumé du séminaire），《精神分析行动》，1967—1968年。

在这里，“性关系”中“性”的意义被规定了。“没有性关系”与“阉割”是同一回事。“那完成任务、在任务的终点于阉割中实现为主体的主体”，因而已经达到他的“我不在”。既然这个位置是史诗性跃迁的位置，我们便可以得出结论：被阉割之后，他借助史诗性跃迁结束自己的分析。这个终点既彻底，又并非没有后果。“彻底”，因为不再涉及另一个“期次”。如弗洛伊德所说，“‘狮子只跳一次’这句谚语，必然是正确的”，[注24]而这是“一跃如狮”。“并非没有后果”，因为我们必须看到这个主体“过渡或回到出发点”（着重为我所加）。在这里，拉康假定主体一开始就选择了“我不思考”——此外，这与自由联想规则相符合；主体一旦开始分析，这便是其言说的方式。（“刚刚想到要说……”与“我认为……”是完全不同的说法。）他借助一次越入行动进入分析；换言之，转移 / 行动展示得以建立，并且（这就是允许我们肯定分析是一种会终结的经验的理由）在分析者与分析家的分离发生之后，他借助一次明晰的越入行动，来占据分析家的位置：这种分离具有史诗性跃迁的地位。这就是图式5中那条曲线所表示的过渡。

[注2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终与无终的分析”（L’analyse avec fin et l’analyse sans fin）〔1937〕，收入《成果、观念、问题》（Résultats, idées, problems），第二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5，第234页）。

此外，一言以蔽之，明晰的越入行动在别处被称作“通行”（la passe）；通行由此从一个对它至关重要的角度——行动的角度——得到看待。我们可以看到，这不关乎一次补充的分析；也不关乎重新接上一个所谓“未被分析的”方面（人们如此频繁地这样说……甚至有时也这样实践）。如此通行的人来占据分析家的位置（然而并不因此被要求从业）：在这个位置上，越入行动的这个相当特殊的例子可以被维持；它在于——这就是它的定义——完全不思考。明晰的越入行动是越入行动的本质。然而，通行者回到这一位置时，已不是他通过开始分析而离开这一位置时的同样状态。他“明晰地”，甚至“知情地”回到这里：在此，这两个词可以被视为等价。下面的引文会确认这一点；其中首次提到明晰的越入行动（我对其中的绕路感到遗憾，但我们没有选择）：

> 的确，如果凡属于知道的东西总留下一份残余，一份以某种方式构成其地位的残余……首先必须提出的问题，难道不是关于那个伙伴——关于在那里的人，我说是作为工具而非助手，为了让某种东西运作；这东西就是精神分析的任务——吗？在任务的终点，主体——让我们这样说——知悉了那构成性的分裂，此后某种东西向他开启，我们不能给它任何别的称呼，只能称作越入行动：我们可说，明晰的越入行动。这恰恰关乎知道：在每个行动中，总有某种

> 东西逃脱他这个主体，将会产生一种效果；而在其行动的终点，至少暂时，就行动中应当作为他自身的实现而完成的东西而言，这一实现是被遮蔽的。[注25][注]

> [注25] 雅克・拉康，《精神分析行动》，1968年3月13日。

> [注] 英文断句将否定疑问变成“不是关于那个伙伴”。项目同日法文转写（s15-13-0038）为否定疑问；另一份公开转写虽有句法差别，也不排除伙伴。正文据这一共同方向校正；尚未取得阿卢什法文书中的最终引文，不能声称已完成该版本校勘。其后的 informed 与 constitutive division 分别保留为“知悉”与“构成性的分裂”。

一周后，拉康更精确地谈到这个“知情的”主体，同时也显露了他自身知道的一个界限：

> 为了构想这种知情的主体应当是什么，我们迄今还没有任何现存的类型。（这一知情的主体）只有相对于一个有待建构的行动才可辨认；正是在这样的行动中，阉割通过再次实施自身，确立自身为越入行动。[注26]

> [注26] 雅克・拉康，《精神分析行动》，1968年3月20日。

这些话以不同方式表达了我们已经指出的东西：也就是从“我不在”（史诗性跃迁）转到“我不思考”（越入行动）的跃迁。然而，它们还做得更多：它们肯定，阉割“确立”了一个从此知情的主体的明晰的越入行动。这是一种阉割之后的越入行动：某种从未被看见、想象或思考过的东西。

这种拉康式的大胆丝毫不温和；当拉康承认这种知情的主体“没有任何现存的类型”时，它面对自己的界限，或者更好说，挖出了一个洞。让我们回想那篇“1967年10月关于学派的精神分析家的提议（Proposition

d'octobre 1967 sur la psychanalyste de l'école）"；它写于上引话语的六个月前，我们或许可以同意：只有因为脑中有着这项提议，拉康才能走得如此远，构想出一个像这样的知情主体的可能性，同时又说此前不存在这样的主体。他期待从一种经验——通行的经验——中获得这种主体存在的证明，从而承认，这一主体不在他的分析实践或研讨班所能触及的范围内。然而，他没有留意到，自己关于通行的要求可能阻碍其有效的施行。[注27]如果他在提出通行之后，免除一切与它有关的要求，有效施行本来可能实现。他未能如此，是他所认出的"这个通行"之失败的组成部分之一。[注28]

[注27] 拉康要求，每一个认可评审团开会决定，是否将那些在通行（the pass）中由通行见证人（les passeurs）呈现并谈述的人命名为学派分析家时，他都要在场。根据一个传闻，评审团的其他成员会转向他，询问他对所说的东西如何看法，因而拉康处在一个反常的位置。而我现在说，学派中从来没有人向他指出，这并不必然是他的位置；对此，我可能会遭到反驳。

[注28] 若泽·阿塔尔十分正确地指出，这不是"通行的"失败（《不止一种名目的通行：雅克·拉康第三项提议》（La Passe à plus d'un titre. La troisième propositioned de Jacques Lacan），巴黎，L'Unebévue éditeur，2012）。这一"失败"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那些受邀作判断的学派分析家，丝毫不知道这究竟关乎什么。

如果以相反的运动，转向几年后，确切地说，1973年11月2日，[注29]我们可以在拉康一篇引人注目的讲话中读到：一道闪电发生在"（通行的）时刻，在那里，一个人决定（意愿又出现在这里）或者离开，或者进入分析话语"。于是，明晰的越入行动概念，在通行的闪电中回弹，因而即使未被确认，也得到了支持。

[注29] 在拉格朗德- 莫特举行的巴黎弗洛伊德学派大会上的讲话（发表于《弗洛伊德学派通讯》（Lettres de l'École freudiennne），第15期，1975，可通过《并非全部拉康》（Pas-tout Lacan）查阅，https://ecole-lacanienne.net/bibliolacan/pas-tout）。

因此，精神分析家被邀请通过不思考来履行自己的职务。[注30]把这位精神分析家与《英国情人》联系起来，这一陈述可以用不同的话来表达：没有思想，因而没有思考，分析家就是随便什么人。克莱尔·拉纳：“我本来可以写关于他的信，可是写给谁呢？……得把信寄给随便什么人。可是随便什么人并不容易找到。”

> [注30] 那么，他会类似于中国的圣人吗？见弗朗索瓦·于连，《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Un sage est sans idée. Ou l’autre de la philosophy）（巴黎，瑟伊出版社，2013）。

索引

说明：指向插图的页码以斜体显示。本索引沿用英文原书的条目次序；中文译名后必要时保留外文，方便查找。[注]

> [注] 本索引依英文原书顺序排列，不按中文拼音重排；全部页码及交叉参照保留原书链接。底本索引有若干拼写或措辞与正文不一致，例如 Racially / Radically、fair affaire、noyed le poisson、Silesiuis、Rytman 及 so if life；外文形式按索引底本保留，中文专名和术语按本书术语表统一。

- 亚伯拉罕（Abraham，Abou Raham）（众人之父 / 万民之父）23
- 亚伯兰（Abram，Abou Ram）（至高的父亲）23
- 行动：缺席 30；明晰的越入 37；样态 31；越入。见 越入行动。；准备姿态 21
- 行动，竞斗性方式（采用）3 – 4
- 行动展示（acting-out）35，74 – 75；建立 78；发生 75
- “行动展示”（拉康）14；移置，突发的介入 51；突发的介入 51
- 行为，暴力（知觉）35
- acto fallido（失误行动）7
- 行动，压抑 13
- 《埃涅阿斯纪》（Aeneid, The）3
- 卡奥尔职员，谎言 53
- agieren（行动）74；差异 14
- “野蛮人之曲”（Air de Sauvages）（才艺，展现）1
- “异化之‘或’（vel）”30
- 异化之“或”（vel），处置（缺席）51
- 异化（向量）77
- 异化，“或”（vel）31
- “真主至大”（Allah Akbar）21
- 阿卢什，让（Allouch, Jean）8
- 阿尔- 穆拉比通（Al-Mourbitoune）21 – 22
- 他异性，拉康的强调 5
- 阿尔都塞，路易（Althusser, Louis）2，27 – 31；行动，缺席 35；行动者，作用 28 – 29；死亡 32；效应，表述 32；杀人者 8；越入行动，分析 74；占有 38；“支撑”一词（解释）36

- 《英国情人》（Amante anglaise）（名称）64 – 65
- amante / 情人 64
- 美国原教旨主义 22
- 《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罗斯）23
- “依靠性关系”（anaclitic relation）12
- 分析者：逃走 15；影响 29 – 30；提供 5；记忆，缺席 13；主体性罢黜 75；任务，规定 50
- 分析：终止 75 – 80；分析设置，界定 17
- “分析家- 分析者之对”17
- 分析情境，理解 71
- 分析规程，偏离 16 – 17
- 诸种分析论，相互作用 37
- 解剖学家，自我出卖 7
- anglaise（英国的）65
- 昂戈，米歇尔（Angot, Michel）12
- 匿名 32；缺失 33
- 安提戈涅（Antigone）22
- 相反的一端（Antipodes），战争（转而投入）3 – 4
- 安齐厄，玛格丽特（Anzieu, Marguerite）14，74，76；拉康的艾梅 52
- 困局（aporia）37 – 38
- 现身，竞斗性方式（采用）3 – 4
- 阿隆，雷蒙（Aron, Raymond）19
- 国际弗洛伊德协会（Association freudienne internationale，AFI）的转录 50
- ato falho（失误行动）7
- 阿塔，穆罕默德（Atta, Mohammed）（文件，联邦调查局的发现）20，20 – 21
- 听众的困惑，深处 11 – 12
- 礼堂，空无 27
- 《肉体的告白》（Aveux de la chair）（福柯）38
- 阿兹特克人，布斯凯的身体（对应）64
- 巴尔梅斯，弗朗索瓦（Balmès, François）49
- 巴尔比，马克（Barbut, Marc）48
- 巴特，罗兰（Barthes, Roland）33
- 贝克特，塞缪尔（Beckett, Samuel）33
- “成对存在”，专制 38

- 本斯拉马，费蒂（Benslama, Fethi）3 – 4，17，19，74；临床发现 23
- 本·塔利卜，阿里（ben Talib, Ali）21
- 两者之间 51
- 两次死亡之间 18；空间 21，33
- blanchote 石 31
- 布朗肖，莫里斯（Blanchot, Maurice）31
- “盲目性”，论证 19 – 20
- 盲目性，影响 19
- 身体，照料 / 祝福 21
- 伯林格，桑德拉（Boehringer, Sandra）12
- 博罗米结 47
- 博罗米性质 65
- 边界 17
- 布斯凯，玛丽- 泰蕾兹（Bousquet, Marie-Thérèse）：动物，相似性 61；身体，对应 64；尸体，散布 43；尸体，带酱汁的肉（关系）62；聋哑状况 54，60；死亡 56；头颅，消失 51 – 52；头颅，处置 57；头颅，拉纳的评论 52；女管家，角色 59；谋杀 8，47
- 旁观者：咒骂，逃离 28 – 29；逃离，方式 29
- 卡贝苏多，伊里斯（Cabezudo, Iris）35，74
- 恶病质，影响 32
- 卡奥尔（Cahors），职员（谎言）53
- 卡拉姆，克洛德（Calame, Claude）12
- 康吉莱姆，乔治（Canguilhem, Georges）29
- 笛卡尔式主体 30
- 卡鲁日，伊戈尔（Caruge, Igor）1
- 阉割 50，58；“没有性关系”，等同 78；快乐 77；阉割后的越入行动 79
- 灾难性的事实 71
- 天主教，阿尔都塞的重新连接 38
- 童年记忆，讲述 28
- 选择：标准 74；启发性 50
- 克律西波斯（Chrysippus），消化人的尸体 64
- 宣称（断言）15
- 临床次序，标准 74
- cogito（我思），影响 50
- 科吉托，克莱芒（Cogitore, Clément）1
- cogito（我思），展开 31

• “来！”，词语（说出）36，38

• 共同体，“原教旨主义”性质（承认）22

• 谴责（行动，越入）14 – 18

• 谴责（断言）15

• 禁闭，行动者的作用 28 – 29

• “禁闭”，讨论 28 – 29

• 有意识的思想，活动（缺席）37

• “建构”（弗洛伊德）37

• 契约，用处 17

• 科斯特，玛丽娜（Coste, Marina）28

• 反转移，经典理论 71

• 反转移，攫取 71 – 72

• “一对”，词语（影响）38

• 创造性的无知 6

• 琼卡，玛格丽特（Csonka, Margarethe）（嘲笑 / 鄙视）13

• 犬儒派，食尸 64

• 舞蹈，体育表现（比较）1

• dans un premier temps（在最初阶段）27

• “décharitер”（去慈善）15

• 德科尔佩利亚达，马尔科（Decorpeliada, Marco）5

• 污秽，关注点 22

• 三位一体玛丽（de la Trinité, Marie）76

• 德 · 利贝拉，阿兰（de Libera, Alain）28 – 29

• 登贝莱，宾图（Dembele, Bintou）1

• 德帕东，雷蒙（Depardon, Raymond）2

• “去激进化”23

• 笛卡尔，勒内（Descartes, René）30

• 德斯科拉，菲利普（Descola, Philippe）12

• dèsêtre（去存在）58 – 59，75，77

• “无处可居的命运”34

• “破坏性”12

• 德蒂安，马塞尔（Detienne, Marcel）12

• 德 · 乌尔特贝，路易丝（de Urtebey, Louise）70 – 74

• Deutung（解释）8

• 对角线，涉及 49

• 迪耶，托马斯（Diet, Thomas）1

• “消失了”，词语（含意）37

- 划分标准，存在 3
- 神圣法则，放弃 22 – 23
- 神圣意志，语句（记诵）21
- 《圣战主义》（Djihadisme）（罗戈津斯基）19
- “惹出一桩事”（fair affaire）2
- 多纳迪厄，玛格丽特（Donnadieu, Marguerite）57
- “合用”（fait l’affaire），避免 2
- 梦：构成 5；内容 18；发生 4
- 德鲁瓦，罗歇-波尔（Droit, Roger-Pol）19
- 淹没（行动，越入）14 – 18
- 淹没这条鱼（noyed le poisson）15
- 《他者之味：食人话语的片段》（Du gout de l’autre. Fragments d’un discours cannibale）（基拉尼）64
- 杜拉斯，玛格丽特（Duras, Marguerite）2，33，42；游戏，玩 45；风格，攻击 53
- 《文集》（Écrits）（拉康）38
- effet-d’entre（之间效应）46
- égout（下水道），拉纳的转变 65
- Einfall（想法）55
- “要么我不思考，要么我不在”（拉康）47 – 51；图式1 48；图式2 48；图式3 49，77；图式4 50；图式5 58；图式6 59；图式7 62
- 阿萨德，巴沙尔（el-Assad, Bashar）23
- 埃尔塞瑟，托马斯（Elsaesser, Thomas）7
- 敌人，错误命名 19
- en glaise（上釉的 / 在黏土中）64
- 明晰的越入行动 70，78 – 79
- “明晰的越入行动”（拉康的含义）37
- 《狱中圣战者的言语》（En prison, les paroles de djihadistes）（莫诺）22
- entre（之间）47；反弹 46
- entre-deux（两者之间 / 间隔）18
- 史诗性跃迁：临床发现 35；完成，缺失 62；考察 3 – 4，74；共同在场 8；区分 4；不完整 57 – 59；写入 58；不可还原性，断言 51；圣战行动，对照 17 – 18；发生 22 – 23，75；越入行动（对照）46 – 48；越入行动（关系）42；存在 38；思想的跃迁，等同 51；特征 56
- “史诗性跃迁”（本斯拉马）3；举动 4
- “史诗性跃迁”，命名（问题）35

- “插曲”，观察 76
- 双关，共鸣 52
- 情欲前戏 36
- 情欲回应，问题 71
- 逃离，可能性（缺失）47 – 48
- 《随笔集》（Essais）（蒙田）64
- 欧洲知识分子，认识 12
- 事件：缺席 15；界定 19；通称，考察 2 – 3；意义 8
- 恶 12 – 13；抵消，善（影响）13
- 生存轨迹（断裂 / 分岔）3 – 4
- ex-nihilo（从无中），杜拉斯的发明（缺失）43 – 44
- 解释，缺失 43
- “行动的面向”，强调 7
- 福尔韦尔，杰里（Falwell, Jerry）22
- 幻想，路径 75
- 告别信，高师学生（normalien）的书写 29
- Fehlleistung（失误行动），矛盾性 7
- 费伦齐，尚多尔（Ferenczi, Sándor）（实践）17
- finance of mind（心智钱财）（finance d’estrit）7
- fineness of mind（心智细腻）（finesse d’esprit）7
- 芬基耶，埃马纽埃尔（Finkiel, Emmanuel）54
- 流畅性，速度（关系）1
- 福柯，米歇尔（Foucault, Michel）3，6，29，31，38
- 拆散（行动，越入）14 – 18
- 拆散，研究 6
- 自由联想 77
- 弗雷格，戈特洛布（Frege, Gottlob）30
- 法语，损害 / 变形 47
- 弗洛伊德的三项组 1
-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Freud, Sigmund）33 – 34，71；话语，对照 12；梦 / 罪责 34；实践 17；《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7；规则，反抗 73；《塔木德》，疏离 8；在维也纳被排斥 / 抵达伦敦 6
- 纪德，安德烈（Gide, André）13，29
- 《吉尔伽美什》（Gilgamesh）3
- 吉泰，阿莫斯（Gitaï, Amos）18

- 上帝：缺席 21，53；期待 38；拉纳，重新连接 52；爱（故事）56；呈现 3 – 4；质问 22；替代物 56；无意识，等同 8
- 诸神，启发 / 附身 67
- 格雷厄姆，比利（Graham, Billy）22
- “分析设置的守护者”的角色 16 – 17
- 哈勒维，埃弗拉伊姆（Halevy, Efraim）20
- 幻觉出的在场，摧毁 36
- 《哈利·波特》（Harry Potter）（传奇）23
- 充满恨意的冲动，压抑 13
- 恨：出现 12；享乐，存在 12
- “卫生专业人员”，社会的要求 16 – 17
- “黑格尔与弗洛伊德：一次解释性对照的尝试”（Hegel et Freud. Essai d’une confrontation interpretative）（科耶夫）30 – 31
- 印度教 28
- 历史化的意义，标准 4
- 历史：求助 4；拒绝（拉康）8
- 奥康盖姆，居伊（Hocquenghem, Guy）38
- 圣战（jihad），发动 19
- “荷马式的愤怒”46
- “向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洛尔·V. 斯坦的迷醉》致敬”（Hommage fait à Marguerite Duras du Ravissement de Lol V. Stein）（拉康）42 – 43
- “有识之士”12
- 人的尸体，食用 64
- 侯赛因，伊玛目（Hussein, Imam）3 – 4
- 理想性 18
- “我不思考”63；选择 77
- 无知，激情 6
- 不朽 28
- “受损的判断力”，描述 11
- 不敬神者，屠杀 4
- 《风流印第安人》（Indes galantes）（拉莫）1
- “我们信赖上帝”（In God We Trust）这一格言，采用 22
- 抑制：后果 5；构想，缺失 5
- “入门”旅程，描述 23
- 对话者，挫败（承认）65

-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IPA）70 – 75
- 询唤 27
- 解释，产生 51
- Intolérable dureté du durer（持续之难以忍受的坚硬）28
- “内摄”12
- 非自愿精神科住院 2
- “伊尔玛的注射”（梦）16
- 突发的介入 50 – 51
- “伊斯兰国”（ISIS），神学思想 22，23
- 伊斯兰，投入 21 – 22
- 以色列的事件，哈马斯的理解 20
-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 18
- 它 / 她，埋葬 52
- “人们说”（“on-dit”）33，34
- 耆那教，投入 23
- “je t’entre”（“我之间 / 进入你”）47
- 圣战（jihad）：j-h-d 词根，含义 19；发动 19
- 圣战主义，所押上的东西 22 – 23
- 圣战行动，史诗性跃迁（对照）17 – 18
- 圣战者：人性，重新还给 23；“越入行动”4；署名文本的痕迹（九一一）3；灵性的程度 20；恐怖分子，比较 19
- 圣战战争，寻求 21
- 享乐 12；缺席 77，78；屏障 16 – 17；欲望 23；重新加工的享乐，行动者的责任 15
- kamikaze（神风），词语（使用）19
- 克尔凯郭尔，索伦（Kierkegaard, Søren）28
- 基拉尼，蒙德尔（Kilani, Mondher）64
- “Kingdom Racially Uplifted Mighty Praise”（Krump）舞者，邀请 1
- 基辛格，亨利（Kissinger, Henry）1
- 克莱因群：对合运算 49；数学性质，使用（避免）49；柔化 / 连接 48
- 知识，使用 12
- 科耶夫，亚历山大（Kojève, Alexandre）30 – 31
- 《古兰经》，诵读 21
- labor limae（锉磨之工）（贺拉斯）15 – 16
- “拉康派”的胡言乱语，阅读 17 – 18

- 拉康派牧灵话语，提及 15 – 16
- 拉康派精神分析家：管理者的角色 14；“新政”式拉康派精神分析家 15
- 拉康遗存 3
- 拉康派的解决办法 13
- 拉康，雅克（Lacan, Jacques）4，8。另见“要么我不思考，要么我不在”；“行动展示”14；临床观察 5；对角线，涉及 49；“明晰的越入行动”（含义）37；对历史的拒绝 8；不合规则之处 50；《对象关系》研讨班 14；实践 17，29；四边形图式 57；责任，一份 14；“或”（vel）一词（提及）30 – 31；“野蛮的转移”14
- 《分析行动》（L’Acte analytique）研讨班 15
- l’acte manqué（失误行动）7
- l’amante（情人）64
- 《英国情人》（L’Amante anglaise）（杜拉斯）2，8，31，42，44；考察 51，64 – 65；史诗性跃迁 45 – 47；精神分析家，关联 80；读者，决定 56；阅读 75；线索，追随 57
- la menthe anglaise（英国薄荷）64 – 65
- 拉米，罗贝尔（Lamy, Robert）45；质询 53
- 拉纳，克莱尔（Lannes, Claire）2，37；行为，奇异性 54；行动，分析 55；史诗性跃迁 77；重新连接上帝 52；头颅 56；信息，提供 51 – 52；最初的缺席 45；肉，厌恶 61 – 62；杀人者 8，43；越入行动 61，74；祈祷 56；自杀企图 57；安定 57
- 拉纳，皮埃尔（Lannes, Pierre）：评论，忽略 46；证言 60 – 61；声音录制 45
- 口误（lapsus）43
- 《对象关系》（La Relation d’objet）研讨班（拉康）14
- 《死刑判决》（L’Arrêt de mort；“死亡的停止”）（布朗肖）31
- 《越入行动的“解决”》（La “Solution” du passage à l’acte）63
- 《激进的诱惑》（La Tentation radicale）（加朗 / 穆克塞尔）20
- 《来日方长》（L’Avenir dure longtemps）〔“未来持续很久”〕（阿尔都塞）[注][27](Chapter-02.md#p27) – 28，32 – 34；手稿，段落（阅读）35

[注] 英文索引此处署 Melogno；本书第二章原注2、27等明确将《来日方长》列为路易·阿尔都塞的著作，故中文校正作者并保留这一纠错说明。梅洛尼奥对应的是第二章原注1所列另一部采访书，不能互换。

- 巴黎弗洛伊德学派（L'École freudienne） 29
- 拉康精神分析学派（L'École lacanienne），邀请本斯拉马 3
-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29
- 《诋毁者》（Le Détracteur）（安齐厄）52 – 53
- 《历代传说》（Legend of the Ages, The） 3
- 《洛尔·V. 斯坦的迷醉》（Le Ravissement de Lol V. Stein）（杜拉斯）42
- 《推理性疯狂》（Les Folies raisonnantes）（塞里厄 / 卡普格拉）54
- 《塞纳- 瓦兹的高架桥》（Les Viaducs de la Seine-et-Oise）（杜拉斯）42，44，54
- 《〈英国情人〉剧场》（Le Théâtre de l'Amante anglaise）（杜拉斯）42，44，53
- 列维- 斯特劳斯，克洛德（Lévi-Strauss, Claude）38
- 利沃夫，西摩（Levov, Seymour）23
- 生命史 2 – 3
- 唇读，使用 60
- "生活在地狱中而没有地狱"23
- logos（逻各斯）12
- 《指环王》（Lord of the Rings, The）（传奇）23
- 做爱 36
- 爱，存续 55
- 疯狂，涌现点 2
- "魔法圈"，缺失 52
- 魔法圈，加入 42
- 《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 3
- "渴求新鲜脑髓的男人"病例，重新考察 74 – 75
- 殉道：赐予 21；圣战候选人 3 – 4
- 马克思，卡尔（Marx, Karl）35
- "Massage à l'acte"（行动按摩）31
- 数学，词语结构（含义）48
- 莫斯，马塞尔（Mauss, Marcel）2
- 意义：标准 74；求助 4
- 忧郁，道德过错 5
- 梅洛尼奥，里卡多（Melogno, Ricardo）27
- 精神疾病，范式 3

- 转喻 27，61
- 米尔纳，让- 克洛德（Milner, Jean-Claude）28 – 29，33
- mise en abime（层层嵌套）45
- moksha（解脱）28
- 冲势，痕迹 1
- 莫诺，纪尧姆（Monod, Guillaume）22 – 23
- “铺石山”（Montagne Pavée）高架桥 44，44
- 铺石山高架桥，考察 55
- 蒙田（Montaigne）65
- 道德考量，免除 70
- 德·摩根，奥古斯都（Morgan, Augustus de）47；定律，表示 48
- 哀悼 51 – 57；仪式 52；仪式，解决 56
- 运动，延伸 13
- 谋杀（行动），痕迹（缺失）35
- mûthos（神话）12
- 叙事，连贯性 5
- 食尸 64
- 被否定的集合，并集 48
- 否定不安 34
- 被否定的 cogito（我思），肢解 48
- 新词 47
- 中性（Neutral）16，33 – 34；介入 34；名称，替换 35；点，抵达（缺失）34
- niederkommen（Niederkommen，坠落 / 分娩）60；双关 13
- 尼采，弗里德里希（Nietzsche, Friedrich）（上帝）55
- 未完成，返回 63
- 不信者 21
- 不结束 32
- 不存在的大他者 23
- 无处所，恰当 37
- noyed le poisson（淹没这条鱼）15
- 对象 a，拓扑 76
- 《奥德赛》（Odyssey, The） 3
- 俄狄浦斯式的性活动，想象 73
- 走调的言说 33
- 大他者（l’Autresexe）46 – 47，78；抵达 47；定义，改变 47；欲望 50；存在 8；不存在的大他者 23；定位 38；相关性 38

- 作为地点的大他者 57
- 奥图尔，芬坦（O'Toole, Fintan）8
- 巴勒斯坦，十字军（前往）4
-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 71
- "帕潘事件"2
- 帕潘，克里斯蒂娜（Papin, Christine）32；越入行动，实现 63；陈述，回声 47
- 帕潘姐妹 14，51；行动，越入 31 – 32；罪行 2，3
- 失误行动：行动 35；构成 5；失误行动 7；发生 4
- parlêtres（言说存在）47
- "越入"，暗示 13
- 越入行动 31 – 32；弃用，标准 74；承认 37；行为 35；当下性 11；另一地点，命名 78 – 79；特征 37；差异 31；淹没 / 拆散 / 谴责 14 – 18；明晰的越入行动 70，78 – 79；构想 16，70；史诗性跃迁，对照 46 – 48；史诗性跃迁，关系 42；排空 15；解释，变态（关系）22；面对 32；影响 12；不完整 59 – 63；援引 36；不可还原性，断言 51；拉康派的构想 13；逻辑的清晰性，提供（不能）12；意义，确定 37；发生 75；描述 51；宗教 / 实践指示，一组 20 – 21；奇异性 9
- "越入行动"4
- "Passer à l'acte"（越入行动）专辑 73 – 74
- 患者：攻击，分析家的存续 72；恨，出现 12
- 大数的保罗（Paul of Tarsus）（前往大马士革）3 – 4
- 人们，满口行话（问题）12
- perturbado（被扰乱的）7
- 小 a：写入 50，58；位置 63；对象 63，64；主体，连接 62
- 阳具，缺席 47
- pharmakon（药 / 毒）65
- "恐怖症"21
- 身体死亡 28
- 盘子，打碎 60 – 61
- 普罗提诺（Plotinus），支持 23
- poétereau（平庸的小诗人）53
- 诗歌，思考（影响）32
- 出发点，越过 / 返回 78
- 尚贝里投毒者 11
- 投毒者的人格 11

- 奥尔良门（Porte d'Orléans），拉纳的抵达 57
- post mortem（死后）出版 34
- 权力，征服 1
- "事物的力量"35
- 实践，阻止 17
- 预谋，缺失 37
- "1967年10月关于学派精神分析家的提案"（Proposition d'octobre 1967 sur la psychanalyste de l'école） 79 – 80
- 精神医学话语 / 实践，对象 1 – 2
- 精神医学知识，陷阱（避开）22
- 精神医学 / 精神分析实践 / 理论，庇护 2
- 精神分析：效应 29；起源 33 – 34；复数形式 70；问题 6；分析设置，规则 72；终结，不可能性 71；接受分析 5
- 精神分析家。见 拉康派精神分析家："分析设置的守护者"的角色 16 – 17；第二个患者，地位 72
- 精神分析家，越入行动 73；问题 71；视角 72
- 心理学，根本拒绝（不承认）29
- 《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弗洛伊德）7
- 精神病理学，改写 5
- 心理治疗，规定 64
- 心理专业功能（psy function）5
- 驱力，路径 75
- "纯粹的爱"（规定）56
- pure supposed（纯粹的假定）29
- 纯洁，关注点 22
- 拉比尤，阿梅莉（Rabilloux, Amélie）：谋杀 47；审判 43 – 44
- 拉希基，布拉希姆（Rachiki, Brahim）1
- 激进化，种族主义含意 19 – 20
- 根本的沉默 33
- 拉贡，马塞尔（Ragond, Marcel）54
- 兰克，奥托（Rank, Otto）3
- ratonnade（译作"种族主义袭击"）20
- 反应，影响 7
- 层面 70；改变 14；差异 14；区分 30
- 转生 28

- “记忆、重复与修通”（弗洛伊德）13，73
- 重新安置 63 – 64；枢纽 64
- “抵抗者”（resistants）（维希的称名）19
- 被揭示的存在（revealed-Being）30 – 31
- 进行揭示的存在（revealing-Being）30 – 31
- 《做梦要紧》（Rêver compte） 29
- 重新加工的享乐，行动者的责任 15
- 利科，保罗（Ricœur, Paul）8
- 里涅里，阿方索（Rignieri, Alfonso）45
- 瓦兹河（River Oise），支流 55
- 塞纳河（River Seine），拉纳的到访 57
- 罗戈津斯基，雅各布（Rogozinski, Jacob）19
- 鲁瓦，克洛德（Roy, Claude）42
- 谣言，滋养 33
- 里特曼，埃莱娜（Rytman, Hélène）：幻觉出的在场 37 – 38；谋杀 8，30，34 – 36
- “传奇”，术语（出现）23
- 塞奇曼，马克（Sageman, Marc）19
- 萨义德，爱德华（Said, Edward）12，19
- “圣- 伯努瓦团体”42
- 圣茹斯特（Saint Just）22
- 圣西门，亨利·德（Saint-Simon, Henri de）35
- s’Autreposer（autre“他者”与poser“放置”构成的反身新词）47
- 奥尔日河畔萨维尼（Savigny-sur-Orge），火车旅行 54，55
- 犯罪学学院（蒙特利尔大学）（邀请福柯）6
- 第二次死亡 28；参照 31
- “攫取”（sésir）37
- 塞凯尔，亨利（Sekel, Henri）11
- “由口误而自我出卖”7
- 自我揭示，实践 71
- 分离，运动 3 – 4
- 2001年9月11日 20 – 23；文件，联邦调查局的发现 20，20 – 21；上帝，质问 22；圣战者，影响 43
- sésir / désir（攫取 / 欲望），关系 36
- sésir（攫取），幻觉（缺失）36
- 性，第二种分析论 37

- 性行为：“来！”，词语（说出）36；越入，谴责 16；精神分析家的越入 72 – 73
- 性伴侣对子，大他者 46 – 47
- 性关系：不存在 17；不存在，断言 47；气息 71；“攫取”（sésir）37
- 性关系，存在 8；尝试 / 幻觉 38；信念 17
- 性结合，享乐（缺席）78
- 《莎士比亚很难，但生活也如此》（Shakespeare is hard, but so if life）（奥图尔）8
- 灿烂的明天，许诺 15
- “短”时段会谈 17
- 署名文本，痕迹 3
- 所指，迷恋 8
- 《如果分析家越入行动》（Si l’analyste passe à l’acte）（德·乌尔特贝）70，73
- 西莱修斯，安格鲁斯（Silesiuis, Angelus）23
- “缓慢的锉磨工作”（labor limae；底本英文“slow work of the lime”）（贺拉斯）15 – 16
- 社会领域，疯狂 / 精神医学（涌现点）2
- 社会法则，具体规定 16 – 17
-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Société nationale de Chemins de fer，SNCF）的职员 53 – 54，55；谎言 56
- 空间（entre-deux）18
- 说话，竞斗性方式（采用）3 – 4
- 速度，流畅性（关系）1
- 灵性十字军征战，基督教的投入 22
- 灵性 18；排斥 19
- “分裂”的人格，描述 11
- 体育表现，舞蹈（比较）1
- 《星球大战》（Star Wars）（传奇）23
- 斯坦纳，乔治（Steiner, George）23
- 斯多亚派，食尸 64
- 结构，否定性 78
- 主体的历史，承担 4
- 主体性罢黜 75
- “主体性罢黜”15；旗帜 77
- 主体，跳跃 58
- 主体，第二次死亡（剥夺）33
- “支撑”：双重在场 37；含义，阿尔都塞的澄清 36
- 判断悬置（épokhē）43

- “象征性行动”13，14
- 象征性言说 31
- 象征界、想象界、实在界（S.I.R.层面）70
- 症状：构成 5；发生 4
- 症状性行动，行动 35
- 萨博，德尼（Szabo, Denis）6
- 《塔木德》（Talmud），弗洛伊德的疏离 8
- “技术”，指示 17
- 恐怖主义：行动 19；考察 21；对宗教维度的觉察（阻碍），盲目性（影响）19
- 恐怖分子：“激进主义”，解释 19 – 20；西方（人们），对照 22
- 恐怖分子，词语（西方的使用）19
- 恐怖，散播 18 – 19
- 四面体顶点，主体（跳跃 / 抵达）58，63
- “命名不当的越入行动”（Le mal nommé passage à l’acte）12 – 13
- 泰奥莱尔，让- 马克（Théolleyre, Jean-Marc）44，47
- 神学思想（“伊斯兰国”）22，23
- 思考：免除 76；不可能性 31 – 32
- 思想的跃迁，史诗性跃迁（等同）51
- 《隐晦的托马》（Thomas l’Obscur），提及（拉康研讨班）31
- 思想：殖民主义，终止 12；帝国主义 37；实现 31
- “沉默的墓碑”34
- “总体社会事实”概念（莫斯）2
- 塔沃，露西（Tower, Lucy）71
- 痕迹，抹除 7，35
- 转移：分析者的实行 29 – 30；建立 78；邀请 5；爱，真爱（等同，否定）72；镜子 71；位置，质询 17；向量 77
- 转移的转变 30
- “越界”（词语），等待 16
- 越界，词语（使用）72
- 越界的性行为，越入 17，73
- “创伤”（词语），等待 16 – 17
- 真理，向量 77
- 图达尔，安托万（Tudal, Antoine）46
- 《十二日》（Twelve Days）（德帕东）2

- 双子塔，摧毁 12
- “未经分析的”面向 78
- 去存在。见 去存在（dèsêtre）
- “去存在”（“désêtre”）15
- 无意识：形成物 6；拉康的定义 4
- 未表达的不赞同，行动 7
- 阿姆斯特丹大学 7
- 蒙特利尔大学，犯罪学学院（邀请福柯）6
- “起而反抗”：突发的介入 50；词语，使用 31
- “或”（vel）一词（提及）30 – 31
- 毒物（“poison”），看待 15
- 言语交流，避免 51 – 52
- 维纳蒂耶精神病院（里昂），案件 2
- 违反，词语（使用）72
- 维奥讷（Viorne）（城镇）[注]，谋杀地点 54

[注] 底本索引称 town，故保留“城镇”；第三章0089却说法国没有这个名称的城镇，并把 Viorne / Viosne 联系到瓦兹河的支流。小说城镇与现实地名的指称层次须区别，不能据本索引断言有同名的法国真实城镇，也不据此直接把索引改成河流。

- 瓦格纳，恩斯特（Wagner, Ernst）35，74
- 《约旦河西岸》（West of the Jordan River）（吉泰）（纪录片）18
- 为什么（问题），回答（不能）11
- “野蛮的转移”（拉康）14
- 温克勒，约翰（Winkler, John）12
- 维特根斯坦，路德维希（Wittgenstein, Ludwig）14
- 词语结构，含义 48
- “年轻的同性恋女性”（Niederkommen）60
- 芝诺（Zenon），消化人的尸体 64
- 齐达内，齐内丁（Zidane, Zinédine）6

校勘参照：拉康，1968年3月13日

第十五研讨班《精神分析行动》同日法文转写节选；用于结论引文的版本对读，不是本书法文原版。

Qu'il en soit différemment, de cela même que la psychanalyse nous apprend que le sujet, de par ce qui est l'effet même du signifiant, ne s'institue que comme divisé et d'une façon irréductible, voilà ce qui sollicite de nous l'étude de ce qu'il en est du sujet comme effet de langage, et de savoir comment ceci est accessible et le rôle qu'y joue le psychanalyste, voilà qui est assurément essentiel à fonder.

En effet, si ce qu'il en est du savoir laisse toujours un résidu, un résidu en quelque sorte constituant de son statut, la première question qui se pose n'est-elle pas à propos du partenaire, de celui qui est là, je ne dis pas « aide » mais « instrument » pour que quelque chose s'opère, qui est la tâche psychanalysante ?

Au terme de quoi le sujet - disons - est averti de cette division constitutive, après quoi, pour lui, quelque chose s'ouvre qui ne peut s'appeler autrement ni différemment que « passage à l'acte » : passage à l'acte disons éclairé. C'est justement de ceci : de savoir qu'en tout acte, il y a quelque chose qui comme sujet lui échappe, qui y viendra faire incidence, et qu'au terme de cet acte, la réalisation est pour l'instant pour le moins voilée de ce qu'il a de l'acte à accomplir comme étant sa propre réalisation.

Ceci, qui est le terme de la tâche psychanalysante, laisse complètement à part ce qu'il en est du psychanalyste dans cette tâche ayant été accomplie. Il semblerait, dans une espèce d'interrogation naïve, que nous puissions dire qu'à écarter la pleine et simple réalisation du « pour-soi » dans cette tâche prise comme ascèse, son terme pourrait être conçu comme un savoir qui au moins serait réalisé pour l'autre, à savoir pour celui qui se trouve être le partenaire de l'opération, ceci d'en avoir institué le cadre et autorisé la marche.